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永芳 博士

俄羅斯政治文化與普丁的威權統治

研究生：姜俊廷 撰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三日

## 謝辭

這本論文得以完成，是因為有許多師長親友們的幫助，因此我寫下這篇謝辭，表達我對於師長親友們的感謝之情，亦畫下這段日子求學的句號。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林永芳教授，林老師在學業上的引領、論文寫作過程中費心的指導，從架構的安排以至觀念的陳述，皆惠予我相當大的啟發；感謝口試委員郭武平教授與魏百谷教授，兩位師長平時不厭其煩的指導我，更於口試會場上細心的指出論文中各項瑕疵，使得這本論文得以趨於完整；感謝我就讀研究所期間的所有師長，王定士教授、洪美蘭教授、楊世雄教授、趙竹成教授、林美芬教授、魏艾教授，師長們淵博的學識與嚴謹的治學態度，是我仰慕的榜樣，亦感謝師長們平時在我學業上的諄諄教誨與生活上的關心。

再者，感謝奕超學長和孟融學姐的幫忙，不論是論文格式的指正、寫作技巧的提醒、論文口試的準備或是生活上的鼓勵，皆使得我受益良多；同窗相偉、冠伶、志翔、千惠、家廉、鴻芸、書萍、俊雄、孟真，我們一起在課業上努力，一起出遊踏青，這些過往皆是我難忘的回憶；再次感謝就學期間的學長姐、同學和學弟妹，有你們的陪伴，使我不論在課業上或是生活上都感到相當溫暖。

感謝默默在背後支持我的大哥，從小你就是我的榜樣，走在你的背後我總是有著厚實的安全感，也是因為大哥在生活上的照顧與支持，使得我能夠專心將學業完成並將本論文付梓；最後這本論文我要獻給從小養育我成人的奶奶，有您細心的照顧、辛苦的付出使我能夠順利成長並且完成學業，因此，我將這本書獻給您，我敬愛的奶奶，並願您身體健康，一切平安順利！

姜俊廷 謹誌於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俄羅斯研究所 民國一百年六月

## 摘要

本文研究將政治文化視為一國民主建立與鞏固的關鍵因素，政治文化的適切與否將直接影響民主轉型與鞏固之成敗。藉由回溯俄羅斯的歷史經驗，探討在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具備有利於民主發展的元素。

本文重新檢視在普丁政權的建立與鞏固過程中，強大的國家機器與政治強人實為民意所望，而這樣的民意表徵並不全然來自於短期性的政策改變，而且是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

本文研究發現，現行的俄羅斯民主政體並非真正的民主，甚至可將之歸類為威權政體。尤其在官方思想定調之後，自由競爭與人權大幅倒退，均無損於普丁政權的民意支持。即使俄羅斯的民主招致許多的批辦，但她確實是根據俄國獨特國情所發展而成的。

**關鍵詞：**政治文化、民主鞏固、威權政體、普丁。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 .....</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	9
第四節 文獻回顧 .....	12
<b>第二章 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傳承 .....</b>	<b>26</b>
第一節 威權路徑的建立 .....	28
第二節 威權路徑的強化 .....	36
第三節 威權路徑的繼承 .....	44
第四節 小結 .....	50
<b>第三章 普丁與權力集中 .....</b>	<b>51</b>
第一節 國家強化 .....	52
第二節 中央集權 .....	61
第三節 行政權獨大 .....	66
第四節 小結 .....	79
<b>第四章 評析主權式民主 .....</b>	<b>80</b>
第一節 主權式民主的緣起 .....	82
第二節 主權式民主的意涵 .....	88
第三節 主權式民主的影響 .....	92
第四節 小結 .....	99
<b>第五章 結論 .....</b>	<b>101</b>
<b>參考文獻 .....</b>	<b>105</b>

## 圖表目錄

圖 1-1 俄羅斯的威權路徑 .....	10
圖 3-1 西方與俄國的政黨政治之比較.....	74
表 3-1 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結果， 1993-1999.....	73
表 3-2 政黨與其他機構信任度之比較， 1997-2004.....	74
表 3-3 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結果，2003.....	78
表 4-1 俄羅斯境內種族攻擊傷亡統計表，2004-06.....	9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一、研究動機

2005 年，民主觀察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年度報告中，調降俄羅斯的民主評等，從原本的「部分自由」降為「不自由」。<sup>1</sup>這是俄羅斯獨立以來首次被列入「不自由」國家，同時意味著俄羅斯在民主鞏固路徑上所面臨的一大挫敗。

二戰後英美等國大力推行的「現代化理論」，以德國、日本為例，說明一國若在政治上採取民主政治、經濟上走向開放市場、社會開放多元、文化上鼓吹資本主義價值觀與國際觀，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能快速且持久的發展。因此，第三世界國家只要學習先進國家全面發展現代化的策略，很快就能擠入強國之列。

蘇聯解體後，這股現代化理論的風潮也吹進了前蘇聯國家，雖然這些國家同樣的經歷了轉型初期的激烈震盪，卻產生了不同的民主成效。<sup>2</sup>1997~98 年金融風暴期間，俄羅斯經濟崩潰，許多俄國人指責西方民主制度、資本主義是造成國家困境的禍首。在民主

<sup>1</sup> 2005 年的年度報告中，俄羅斯的政治權利被評分為 6，公民自由被評分為 5。請參見：

「自由之家」網站 <<http://www.freedomhouse.org>>，檢視日期：2010/09/01。

<sup>2</sup> 從 2002 年「自由之家」開始進行民主評比以後，波羅的海三國即是「自由國家」。請參見：

「自由之家」網站 <<http://www.freedomhouse.org>>，檢視日期：2010/09/01。

鞏固的歷程中，經濟的表現確實會影響人民對民選政府的信心，但在俄羅斯的案例中，不僅削弱了民選政府的合法性，也連帶的動搖了民主制度作為政治圈中唯一遊戲規則的地位。換言之，民主的觀念仍未深植在俄國人的價值中，民主制度也並非俄國人心中唯一的選擇。

針對俄羅斯民主倒退的現象，政治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途徑解釋：行政立法失衡、脆弱的政黨體系、公民社會弱化等等。筆者認為這些看法都有其獨特見解，但若缺乏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討論有關俄羅斯的民主不適性之議題，將甚難瞭解俄羅斯發生民主倒退的原因。因此，筆者希望將政治文化視為一個深層的結構條件，探討俄羅斯政治文化的獨特性，並用以說明為何俄羅斯會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期望能夠尋找出日後俄羅斯民主政治可能的發展軌跡。

## 二、研究目的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假設民主化是一直線式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從轉型開始到奠基于大選(Founding Election)這段期間稱為轉型期，從奠基于大選之後到民主真正的根植人心與制度的這段期間稱為鞏固期。俄羅斯(前蘇聯)從 1988 年開始進行民主化，至 1993 年舉行杜馬大選以及通過新的聯邦憲法，原則上已經完成民主轉型，具有選舉式民主的基本要件。然而，這樣的民主在俄國實行十多年，遲遲無法達到歐美自由民主的標準，從各方面文獻來看，甚至有開民主倒車的現象。

本篇論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即是要針對俄羅斯民主倒退現象，提供一項有利的解釋，再檢視民主化的相關研究後，筆者選定政治文化做為解釋的途徑。筆者的第一個假設命題是，現今的俄羅斯仍然不具備民主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甚至具有威權取向。學界有關政治文化的解釋大致分為兩派，一是將政治文化視為個人政治態度的集合，一是

將政治文化當作歷史經驗的延續，也就是集體的產物。筆者採用後者的看法，俄國威權取向的政治文化，勢必與其歷史經驗息息相關，在此部分必須引用大量的歷史研究，也是本論文中第二章的內容。

本篇論文第二個假設命題是，俄國威權取向的政治文化，在其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阻力的角色。再根據此一命題，延伸出三個子題：第一，俄羅斯文化深受東正教思想影響，文化性格比較不具批判性，同時因為俄國村社的集體傳統，使得自由主義在俄國一直無法茁壯，也連帶影響公民社會的發展。第二，俄羅斯的歷史事實上就是一部不斷向外擴張，逐步建立強國的歷史，經過 1990 年代慘痛的經驗，恢復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重新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乃是絕大多數俄國人所追求的信念，在此原則之下，即使犧牲部分的個人利益也在所不惜。第三，在國人引頸期盼恢復強國的期許下，普丁國家重建(State Rebuilding)的措施首重於權力的集中，包括他所推行一系列有違民主原則的措施，都能獲得超強的民意支持，由此觀察俄羅斯發生威權復辟的現象，並不令人意外。目前俄羅斯呈現三種層次的權力集中現象，國家強 - 社會弱、中央強 - 地方弱、行政強 - 立法弱。

本篇論文第三個假設命題是，「主權式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的提出，說明俄國已放棄民主發展的道路，或著是，選擇了適合自己國情的「俄國式民主」。藉由分析主權式民主的起源、內容以及意義，論述俄國未來的民主鞏固前景堪慮。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研究開始之前，筆者必須先就本文的研究範圍與限制作出界定。由於筆者的研究焦點著重於俄羅斯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藉著分析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取向與民意的偏好，探討俄羅斯民主鞏固的進展與威權復辟之現況。

### 一、研究時間範圍

本文研究的時間範圍是以 1991 年蘇聯瓦解至 2008 年普丁(Vladimir Putin)卸任總統為主。然而，考量到文化的銜接性與變動性，本文也必須討論到帝俄、蘇聯時期，對於俄羅斯民族性的養成與對政治文化的形塑有何影響。如同 Richard Rose 所言的「傳統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Tradition)，許多國家都刻意讓舊價值融入新的政治態度中，政治文化的演變是漸進的，而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政治延續性」(Political Continuity)在俄羅斯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 二、研究主題的界定

本文研究的主題是從俄羅斯政治文化的脈絡了解為何俄羅斯會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以及普丁藉此民意建立其「法律專政」(The Dictatorship of Law)、「主權式民主」的專制體制。筆者將民主與威權視為是一條直線上的兩端，民主倒退代表威權主義成長，反之亦然。因此在研究開始之前，必須先對「政治文化」、「民主政治」、「威權政治」做出概念上的釐清。

## (一) 政治文化：心理的政治

Gabriel Almond 對政治文化的定義是：每一個政治體系皆鑲嵌於某種對政治行動取向的特定模式中。<sup>3</sup> Sidney Verba 則認為政治文化是：由經驗性的信仰(Empirical Beliefs)、表達符號(Expressive Symbols)、價值觀(Values)三者所交織而成的一個體系。我們稱政治文化為體系，因為我們假定一個社會中的諸觀念、感情和態度，並不是偶爾或雜亂無章的。<sup>4</sup> 簡言之，政治文化可以被界定為一國人民對於政治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它是政治行動的基礎並賦予政治行動以意義。Almond 與 Verba 的定義是政治學界中最常見的觀點，也是本論文中所引用的觀點。

## (二) 民主概念的界定

「民主」這個概念源遠流長，它以不同的形式與定義存在於歷史中並流傳至今，「民主制度」則是將民主概念付諸於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學界中對於民主有諸多說法；包括：Joseph Schumpeter 所言的「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sup>5</sup> 根據民主政體的缺陷定義出的，「限制式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可控式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保護式民主」(Protected Democracy)、「一黨民主」(One-Party Democracy) 等等。<sup>6</sup> 而本論文所言的民主則是專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亦或學者 Robert Dahl 所定義的多元政體(Polyarchy)。Dahl 在其名著「論民主」(On Democracy) 中主張民主政治是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政府回應公民的偏好，視每個公民為平等的，並提供所有公民同樣多的機會去形成偏好，使他們的偏好在政府行動中被平等對待，不論此偏好的內容為何，也不論來自於誰。為了達成上述目標，Dahl 認為必須滿足「公開

<sup>3</sup> Gabriel A. Almond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8, No. 3 (1956), p.396.

<sup>4</sup> Sidney Verba ,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Lucian W. Pye &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13.

<sup>5</sup> Schumpeter 主張：「民主的方法是一種達成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透過相互競爭人民選票的支持，以取得擔任公職的機會」。請參見：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P.269.

<sup>6</sup> Collier 與 Levitsky 根據的指標包括：民主政體缺乏普遍選舉權、缺乏完全競爭、缺乏保障公民權利、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請參見：

David Collier &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49, No. 3 (1997), pp.430-451.

競爭」(Public contestation)與「包容(成員)」(Inclusiveness)的要求，換言之，任何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體都必須達到「自由化」、「競爭」、「參與」，三項基本條件。此外，Dahl 認為民主政體還必須符合幾個制度上的要件，<sup>7</sup>包括：

1、 主要的政治決策者為民選

任何具有政策制定權力的官員或民意代表，都必須經由選舉產生。

2、 自由公平的選舉

民選官員與代表都是在經常且公平、無脅迫的選舉中產生。

3、 普遍選舉權與參政權

絕大多數的公民都必須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不可以因為種族、性別、宗教和政治理念不同而有所歧視。

4、 言論自由

公民可以自由表達其政治意見，而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壓迫，也不受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的限制。

5、 新聞自由

公民有權力去尋找所需的資訊，不可受到政府不必要的新聞檢查，政府也並不是唯一的資訊提供者。對於新聞自由的限制，只限於對國家利益或他人生命財產有立即危險者。

6、 集會結社自由

公民有權組織自主獨立的社會團體，包括政黨、利益團體等，以保障及擴展其權益。

---

<sup>7</sup> Robert Dahl,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96-104.

### (三) 威權概念的界定

政治學界對於「威權」較為經典的界定是 Juan J. Linz 在《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政體》一文中的定義，Linz 對威權體制的界定是：一種政治體系，具有有限但不向成員負責的政治多元主義；不具有縝密與指導性的意識形態，但具有獨特的威權心態；除非在威權政體發展的某一階段，否則不具有廣泛具嚴密的政治動員。在這種有限動員的環境內，威權領導者或一小撮威權統治集團在一個形式上欠缺明確界限，但實質上又可預測的範疇內運作統治權力。<sup>8</sup>在 Linz 對威權政體的定義中，有限的多元主義、威權心態及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權力行使範圍不確定，這三者正是威權政體的重要特徵。不過考量到目前俄羅斯確實維持著競爭性的多黨體制與選舉制以及政府對人民有限的負責等政治特徵，本論文欲以「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來定義普丁政權：競爭性政體是民主的各種制度被視為是正常存在而且是主要的獲取權力之管道的一種公民政體。不過在位者在政治領域的競技場上會明顯的比反對派更加有利。這些政體是帶有競爭性的，因為反對派政黨會透過民主機制來爭取權力，但這樣的政體卻不是民主的，因為競爭環境被徹底的扭曲且有利於在位者，因此競爭是真的但卻不是公平的。<sup>9</sup>

因此，競爭性威權政體是介於民主典型與威權典型，當權者會藉由國家機器介入自由選舉、干涉公民權利、塑造出不公平的競爭環境。<sup>10</sup>雖然具有競爭性選舉，但是政權還是牢牢掌握在威權統治者手中的制度。在這些國家當中，選舉的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性的意義。競爭性的威權體制以俄羅斯為例，並且在許多前蘇聯共和國中出現。由於有定期的競爭性選舉，因此這些國家並非完全的威權專制，但是又由於執政者掌握了一切資源、並且運用包括控制選舉在內的一切方法來維持執政地位，因此並非真正的自由民主體制。

<sup>8</sup>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i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Pub., 1975), pp.187-252.

<sup>9</sup> Steven Levitsky &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

<sup>10</sup> *Ibid.*, pp.7-12.

### 三、研究限制

首先，本論文研究之重點，在於探討羅斯俄羅斯政治文化發展與民主轉型過程，政治文化是一國人民政治態度的集合，而有關於政治態度之研究的資料來源通常是與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訪談，以及大規模且長期的民意調查所取得的結果，但由於筆者未能親赴俄羅斯進行第一手的訪談研究，第一手訪談資料的缺乏是本研究中最大限制。

再者，考量到民意的變動性，不可能只依賴歷史文獻，還必須參考俄羅斯獨立後各階段的民調資料與選舉結果。但因為筆者的俄文能力有限，直接研讀第一手俄文資料恐有詞不達意之嫌，而國內有關於俄羅斯政治文化的研究又不如預期中來的多，因此有關資料蒐集方面，將以英文與中文為主、俄籍學者所寫之英文資料為輔，力求完整呈現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全貌。

##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 一、研究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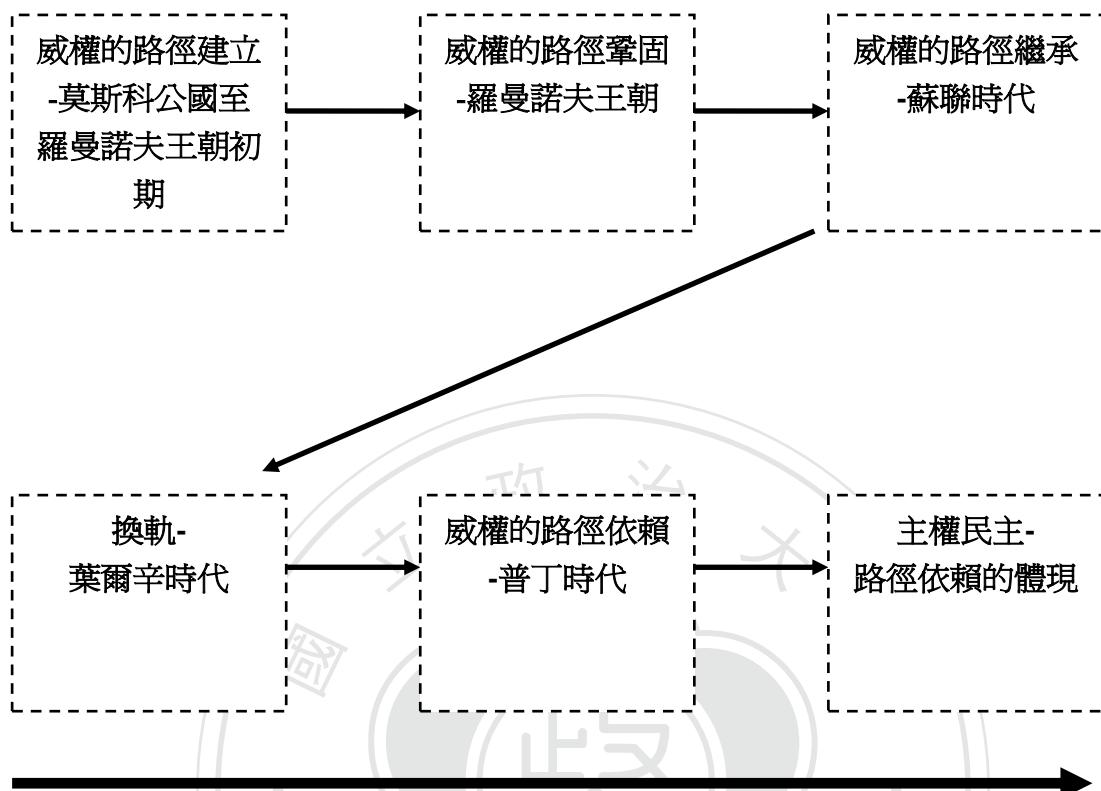
若干學者即認為一個國家歷史上曾經實行過民主制度，對於其民主政治文化的養成，乃至於民主鞏固，都會是正面的助力。<sup>11</sup>由於俄羅斯在共產主義之前，從未有過民主經驗，因此，如何處理帝俄與蘇聯時期所遺留的政治文化遺緒，是俄羅斯在民主鞏固的進程上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有鑑於此，在研究途徑的選用方面，本文採用「政治文化研究途徑」(The Political-Culture Approach)，以及「路徑依賴途徑」(The Path Dependence Approach)。

首先，根據 Almond 的論說，若人民對於政治體系的取向是正面的，則該體系因為有人民認同而穩定發展；反之，則會危害到該體系的發展。政治文化會因為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改變，但這種改變是很緩慢且漸進的。

第二，透過路徑依賴(見圖 1-1)來說明，俄羅斯在威權主義傳統下，民主觀念要紮根在制度、社會與人民思想之中並不容易。路徑依賴原本是經濟學的理論，Douglas North 將其用於解釋制度的演進，會透過「鎖定」(Lock-In)與「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兩種效果，使制度出現慣性不容易變動。爾後政治學者也借用於說明政治制度的固定性，一旦人們在歷史過程中建立並鞏固某種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就甚難被推翻。

<sup>11</sup>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1997), p.36.

圖 1-1 俄羅斯的威權路徑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的選用方面，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歷史分析法」(History Analysis)。

首先，透過蒐集的相關資料、專書、期刊與網路資訊等，分析現今俄羅斯人政治態度之取向，包括對於民主制度與普丁政權的評價。文獻分析法根據葉至誠等所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一書，書中所提對於文獻分析法的概念是，經由文獻資料的搜集研究有助於了解過去、洞悉現在與推測未來。<sup>12</sup>此研究方法方便研究者鑑往知來與研究期間

<sup>12</sup> 葉至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2000），頁 5。

的觀念啟發。

第二，從歷史的角度剖析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形成背景與民族性養成之過程，從而方便了解現今俄羅斯人政治態度所受歷史遺緒影響。根據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一書中，對於歷史分析法的重要性是如此描述：歷史研究法是指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以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sup>13</sup>



---

<sup>13</sup>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理論*（台北：紅葉出版社，1994），頁 244。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 一、政治文化與民主發展

1963 年 Almond 與 Verba 出版了《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一書，被視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經典之作。他們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國人民對於政治標的物之政治活動模式。所謂的政治標的物包括：「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典則」(Regimes)、「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ies)以及政府的具體政策。政治活動模式是指對政治標的物的「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評價」(Evaluation)。就認知而言，是對政治社群、典則以及權威當局的認知、區分與了解。情感則是指對政治標的物存在的依附感或涉入感。至於評價是指對政治標的物給予好壞的評估。

他們分析美國、英國、西德、義大利與墨西哥五個國家民眾的政治態度以及對民主政治穩定的可能影響。依照認知、情感與評價三個面向，以及政治體系、政治輸入(政策的制定過程)、政策輸出(政策執行與結果)以及民眾的自我能力，將政治文化劃分為地方型(Parochial)、臣屬型(Subject)以及參與型(Participant)三種理想型態(Ideal type)。Almond 與 Verba 所提出的「公民文化」其實就是上述三種政治文化的混合體所形成的行為取向，他們認為英國公民的政治態度最接近公民文化。即國家內部有部分人民通曉政治事務、主動積極介入，並以理性而非感性做出政治決定，同時也有部分人民僅願意扮演被動角色。人民願意信任他人，並與他人合作積極參與公眾事務。此外，人民也支持並服從政府政策，對政府具備一定的向心力。更重要的是，人民對於政治典則具有高度共識，能夠容忍不同意見。<sup>14</sup>

<sup>14</sup> 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 張明澍譯, 公民文化 (台北: 五南, 1996), 頁 371-396。

Almond 與 Verba 強調的是政治系統中個人特色的整體分配。此種定義經常的被批評以個人特性之集合來觀察文化整體。<sup>15</sup>Lowell Dittmer 更指出，若是以政治取向來定義政治文化，便無法將政治文化概念與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明確區分。因此，Aaron Wildavsky 提出一個更具簡約性與解釋力的文化理論，他認為文化可以解釋系統成員在不同範疇之偏好，包括「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ferences)。他指出政治偏好乃是根植於文化之中，非外來的，而是內生的，是來自於為了保護或反對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動。當個人做某些重要決定時，這些選擇同時也是文化的選擇。

Robert Putnam 進一步證明政治文化與一國的政治穩定、民主運作，具有重要的關連性。他在 1993 年出版的著作《使民主運作》(Making Democracy Work)中研究義大利地方政府的民主運作後發現，相同制度設計的地方政府在實際表現上卻大不相同。他認為市民具有較高的政治興趣、政治平等、人際信任以及有自發性組織，地方政府的運作較佳。<sup>16</sup>

Ronald Inglehart 在 1997 年所出版的著作《現代化與後現代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中延伸了他之前所做的研究，將分析國家增加為四十三個。他長期的觀察歐美、南美、東歐等民主國家的運作之後發現，民主穩定的國家皆存在三項共同之文化特徵：較高程度的人際關係信任感、生活滿意度較高、反對革命等激進變革。<sup>17</sup>此外，Inglehart 在另一本著作《文化轉變》(Culture Shift)中解釋為何某些國家的政治文化具有民主特質，其他國家則沒有。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在物質富裕之下民眾的價值觀發生轉變，由過去重視安全、經濟生活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轉變成重視尊嚴、自我表達、參與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他提出兩個假設：稀有性假

<sup>15</sup> 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1977), pp.552-583.

<sup>16</sup> Robert Putnam, *Mac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26.

<sup>17</sup>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7-201.

設(Scarcity Hypothesis)與社會化假設(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將這兩個假設結合，解釋價值觀的變遷，肇因於社經環境的改變。因此，環境變化以及世代交替，新的價值會取代舊有價值，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不過這種變遷是很緩慢的，不是一蹴可成的。<sup>18</sup>

## 二、政治文化與民主鞏固

Geoffrey Pridham 與 Tatu Vanhanen 曾對民主轉型提出精確的定義：當威權體制或極權體制開始出現崩解之際，體制的轉變自此開始。其中，新憲法將規範所有遊戲規則、民主結構變得有程序而政治精英亦調整其行為，在自由民主規範下行事。<sup>19</sup>

Linz 對於民主鞏固的定義則是：主要的政治行為者、政黨或組織化的利益團體、勢力或機構，均認為除了民主過程之外，別無其他獲得權力的方法，也沒有任何政治機構或團體，可以否定民選產生的決策者的行動。簡言之，民主必須被視為當地唯一的競賽方式(The Only Game in Town)。<sup>20</sup>

因此不難瞭解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其實是兩回事，民主制度的建立到民主制度的穩固之間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一般而言，學者認為在新興民主政體在奠基性選舉舉行之前是轉型期，之後則是穩固期。針對這樣的政治過程 Dankwart Rustow 的著作《轉型為民主》(Transitions to Democracy)中提出了民主轉型的階段論，George Sorensen 在略為修改 Rustow 的理論後，將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分為四個時期，茲說明如下：<sup>21</sup>

<sup>18</sup> 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22-433.

<sup>19</sup> Geoffrey Pridham & Tatu Vanhan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2.

<sup>20</sup> Juan J. Linz, Seymour Martin Lipset & Larry Diamond,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0), p.158.

<sup>21</sup> George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p.39-45.

## (一) 背景條件

民主化的背景條件，是國家必須先為成統一。因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可以讓未來將處於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會懷疑自己屬於哪個政治共同體。換言之，任何國家想朝民主化前進，首要之務是必須處理國家認同的問題：誰是人民？誰來當家做主？Rustow便指出：讓大多數未來屬於民主政治的公民們，對於他們將歸屬於何種政治共同體不會懷疑或心生保留態度。<sup>22</sup>帝俄及蘇聯是一個由武力所組成的帝國，境內包含許多不同文化、宗教的種族，民族爭端長期以來一直是俄羅斯的隱憂。如同 Michael McFaul 所言：新的俄羅斯是建立在一個已經消失體制的殘餘之上，<sup>23</sup>即俄羅斯是從舊有蘇聯中的民族解放而來，其成員之間對俄羅斯在國家行政、國體、或國家認同上的缺乏，製造出一堆必須在轉型或鞏固完成之前就要解決的額外問題，假使這些爭端無法以民主方式解決，將導致軍事鎮壓或內戰，甚至瓦解民主政治。這個議題在 1994 年與 1999 年的兩次車臣戰爭被徹底突顯，同時也讓俄羅斯的民主鞏固之路佈滿荆棘。

## (二) 準備階段

準備階段通常是一段長期且不確定的鬥爭：一些個人、團體和階級挑戰非民主的統治者。民主可能只是為達成其他目標之下的副產品。根據 G. O'Donnell 與 P. C. Schmitter的研究，民主轉型的開端通常是一段自由化的過程。在這個階段，威權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人民的公民權與參政權。即使仍在威權體制的控制範圍，卻給予反對運動產生的空間。

## (三) 決定階段

決定階段指的是政治領導者決定將民主程序的某些核心要素加以制度化，此一階段與準備階段通常是相重疊的。在此階段，轉型的速度、威權統治遺緒、能否建立政黨、

<sup>22</sup>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1970), p.350.

<sup>23</sup> Michael McFaul, 游清鑫譯,「俄羅斯的民主鞏固」,載於田弘茂等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 1997), 頁 148。

利益團體與社會活動的程度都會影響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於轉型背後主要聯盟的構成。學者 Samuel Huntington 在著作《第三波》(The Third Wave)將主導民主化的菁英分成兩種類型，並詮釋了三種民主轉型的過程：<sup>24</sup>

### 1、置換(Replacement)

由民間反對派力量所領導的民主轉型模式。這種模式並不多見，而且極可能引起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強烈鬥爭，導致國家動盪。

### 2、移轉(Transplacement)

由威權統治者與民間反對派聯手推動的民主轉型模式，也就是所謂的「約定轉型」(Pacted Transitions)。政府與反對派領袖之所以採取聯合行動造成轉型，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雙方都難以取勝，或勝利的代價太大，並開始透過談判來實現轉型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轉型模式，可能會使民主發展受到限制，任何違反保守派利益的改革都可能受到掣肘。東歐的捷克、波蘭等屬於這個類型。

### 3、變革(Transformation)

是由從威權政體內部所發動的民主化。通常是威權體制內出現一群傾向改革的領袖，他們認為朝民主化的方向邁進是可取的，而且會為國家或自己帶來利益，例如：增加國際合法性、獲得經濟援助、保有統治者原本的權力等。自由的改革派往往會把自由化看做是緩和反對力量的一種方式，他們會放鬆鎮壓、恢復某些公民自由、減少新聞檢查、允許對公共問題進行更廣泛的討論等等。蘇聯的民主轉型即是屬於這種類型。

## (四) 肇固階段

針對民主肇固的概念事實上學界仍然沒有明確共識；Andreas Schedler 曾經說明：

<sup>24</sup> Samuel Huntington，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民主化的浪潮》(台北：五南，1994)，頁 139-174。

民主鞏固概念已經變成比較政治中最常使用的概念之一，從 1980 年代開始這個詞被選擇來作拉丁美洲、東歐、東亞與南歐的政治研究。最近這個概念也被學者們使用在西歐的研究上面。因此，民主鞏固概念的重要性在當代思考民主政治上已經不再有爭辯。然而，這個概念受歡迎的背後卻有其代價，尤其是缺乏民主鞏固意涵的明確性與一致共識。<sup>25</sup>

不過，Schedler 針對民主鞏固的概念仍然提出了消極面與積極面的看法：他認為民主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國家在時間序列上，避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進而邁向更穩定之民主制度的過程。因此民主鞏固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目的論的概念，消極面是關心民主穩定，避免倒退；積極面則是關心民主進展並提升品質。<sup>26</sup>此外，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中提出一個測驗鞏固程度的標準：「兩次輪政」(Two-Turnover Test)。他認為如果在轉型初期，威權政體能夠和平移轉政權給在初次選舉中獲勝的政黨，而掌權的政黨也能夠在下次的選舉中和平地轉交權力給獲勝者，這樣的民主政權就可被認為是已經穩固。<sup>27</sup>然而，這種將民主鞏固於否侷限於選舉的觀察，很容易流於所謂「選舉式民主」的弊病，只能算是民主鞏固中的狹義概念或者是必要條件。

因此，不論是 Rustow 或 Sorensen 皆認為，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sup>28</sup>鞏固不是純粹的政治過程，而是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且鞏固的最後階段乃是民主制度實際變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sup>29</sup>。雖然學界對於民主鞏固的意涵缺乏明確共識，但 Linz、Rustow、Sorensen 的看法，的確是較為全面性的觀點。更具體而言，一個鞏固的民主必須使民主價值深入人心、社會與政治制度中，而且成為政治行動者互動的模

<sup>25</sup> 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1998), p.175.

<sup>26</sup> *Ibid.*, p.95.

<sup>27</sup> Samuel Huntington, 第三波：二十世紀民主化的浪潮，前引書，頁 288。

<sup>28</sup> George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op. cit.*, pp.337-363.

<sup>29</sup> Juan J. Linz,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op. cit.*, p.46.

式。換言之，當一國的政治菁英、制度運轉、社會團體、普羅大眾都將民主視為常態並實踐它，使民主成為主流政治文化時，這個國家就具有鞏固的民主政體。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民主轉型的關鍵在於菁英要將制度帶往哪裡，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而民主鞏固與否的重點是人民能否真心誠意的接受民主制度並實踐它。

### 三、俄羅斯政治文化與民主轉型

#### (一) 威權主義的傳統

一個民主政治文化的養成絕對是必須長時間的培養，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同時欲了解一國政治文化除了觀察社經環境以外，歷史因素與政治傳統更是無法屏除的項目。Lucian Pye 即認為：政治文化是由一個政治體系的集體歷史與該體系成員生活史結合而成的產物。<sup>30</sup>

在俄羅斯研究中有不少學者與 Pye 持相同看法，包括 Richard Sakwa、Charles King、Mary McAuley 以及 Richard Rose 等，都傾向於將政治文化視為是：社會集體下的產物，這產物被嵌進制約性的歷史社會經驗，此社會經驗會確保制度或個人的行為不會超出社會集體行動的範疇。<sup>31</sup>從這個觀點看政治文化，著重於歷史遺緒的研究，不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遺緒，都有可能形塑或改變現今的社會制度。因此，研究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學者，大多都會談及俄羅斯威權主義傳統，特別是帝俄時期的影響。

Jeffrey Hahn 在其文《再訪雅羅斯拉夫》(Yaroslavl Revisited: Assess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1990)中就有特別談及，研究俄羅斯政治文化的

<sup>30</sup> Lucian Pye, "Politic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2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p.218.

<sup>31</sup>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05), p.2.

學者都無法忽視傳統因素的影響。俄羅斯威權主義的傳統並未受到蘇維埃統治而改變，政治思想的持續性使俄國人容易接受威權的政治制度。<sup>32</sup>

Stephen White 的 1979 年著作《政治文化與蘇維埃政治》(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是較早期談論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專書。White 在 1984 年的專文《蘇維埃政治文化再評》(Soviet Political Culture)中認為布爾什維克的統治，並未讓俄羅斯遠離革命前獨裁的政治文化，他強調想要了解蘇維埃政治的獨特性，政治學者絕對不可以忽視俄羅斯的歷史因素。<sup>33</sup>

Archie Brown 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Ide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一文中，也提及了俄羅斯歷史在其政治文化中的重量。他認為政治文化會受到歷史制約，悠久的威權特質構成阻礙，限制了俄羅斯往多元化、自由主義與民主發展的改變機會。雖然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推動了改革，但卻未對俄羅斯政治文化產生任何衝擊，相反的政治文化反而構成了改革的阻力。<sup>34</sup>

同樣的觀點可亦見於 Timothy Colton 與 Michael McFaul 的文章《俄國人不民主？》(Are Russians Undemocratic?)，他們認為俄羅斯返回威權統治，最適合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俄國人選擇普丁作為領袖，乃是對於威權偏好的一種展現。<sup>35</sup>

James Gibson 與 Raymond Duch 在其合著的文章《民主價值與蘇聯轉型》(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中指出，蘇聯人民對於民主並不存在忠

<sup>32</sup> Jeffrey Hahn, “Yaroslavl’Revisited: Assess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1990,”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150.

<sup>33</sup> Stephen White,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Resesessed,” in Archie Brown.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62-99.

<sup>34</sup> Archie Brown, “Ide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eweryn Bialer. eds.,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19-30.

<sup>35</sup> Timothy Colton & Michael McFaul, “Are Russians undemocratic?,” *Post-Soviet Affairs*, Vol. 18, No. 2 (2002), pp.91-121.

誠，如果自由的代價是社會分裂，並不是所有的蘇聯人民都願意擁抱自由。此項政治特色反應在現今俄國人的政治容忍上更為明顯，俄國人不太願意與政敵分享政治權力，公民也並未做好準備，使其他公民能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sup>36</sup>

## (二) 以斯拉夫派為首的本位主義

另一個不利於俄羅斯民主發展與鞏固的因素，是俄羅斯傳統思想與西方價值之間的衝突。Huntington 在 1996 年發表的專文《西方：獨特性，非全面性》(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以及著作《文明衝突與塑造世界新秩序》(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引起了全球政治學界的熱烈討論。嚴格來說，「文明衝突論」是一個相當具有爭議性的理論，然而，理論中的某些觀點卻可以說明為何俄羅斯會發生反民主的情況。Huntington 強調西方文明具有其特質性，西方文明中的一些主要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等，是西方文明在發展孕育的過程中漸漸被共同接受的。但某些在西方文明中被奉為圭臬的價值，卻不一定能全面性的與其他文明共同享有，其他文明也並不一定得接受。因此，當西方國家向其他文明圈提出要求，遵守西方國家的人權與民主標準時，當然會引起許多的爭議。<sup>37</sup>

從彼得大帝勵行西化開始，俄羅斯思想界便出現了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分野與爭論。在斯拉夫派的眼中，俄羅斯就像是一位母親，母親具有獨特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和民族傳統。西方派則是將俄羅斯看做小孩，孩子就應當不斷學習，吸取西方一切進步、先進的觀念與制度。<sup>38</sup>蘇聯瓦解初期，俄羅斯也曾經因為治國理念出現路線之爭，當時葉爾辛(Boris Yeltsin)崇尚的路線以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為代表，大西洋主義學派認為俄羅斯應該成為北方工業國家的共同政治體系，並擁有西方的價值觀與態

<sup>36</sup> James Gibson & Raymond Duch,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4 (1992), pp.87-88.

<sup>37</sup> 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6 (1996), pp.28-46.

<sup>38</sup> 周尚文，『「俄羅斯思想」與俄羅斯社會轉型』，《俄羅斯學報》，第二期(2002)，頁 171。

度，應逐漸融入所謂的「歐洲共同家庭」(Common European Home)；然而與之對立的歐亞主義學派(Eurasianism)，則是強調俄羅斯歷史傳統與文化特點，不應該一昧的支持西方的政治觀，而應當保有自我的政治理念。<sup>39</sup>

從第二任期開始，普丁試圖將民主議題與主權概念相結合，由其幕僚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提出「主權式民主」的概念，他認為俄羅斯不能再容忍他國利用民主問題謀求利益或干涉俄國內政，因此，「主權式民主」是一種適應俄羅斯傳統與文化所調整的民主模式。蘇爾科夫在他的文章《國家化未來》(N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中，強調那些對於俄國民主的批判，都是企圖弱化俄國主權與獨立的陰謀，所謂的「主權式民主」是一種政治生活的形態，在其中的政治團體、政治行動都是被國家挑選與形成的，其目的是為了讓這個國家內的所有公民、社會團體都能夠享有良好的物質生活、自由以及正義。蘇爾科夫同時強調：俄國人民可以是自由的，但前提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上也必須是自由的。<sup>40</sup>當國家面臨失去主權，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是可以對公民的民主權利與自由作出某些限制。以目前發展來看，影響俄羅斯的主要社會思潮，是以「主權式民主」思想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思潮成為官方的主流思想，說明了以大西洋主義為首的民主派失去了主導地位，穩定、效率、秩序、社會公正，成為俄國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標。<sup>41</sup>

### (三) 以菁英為主導的俄羅斯民主轉型

Paul Lewis 認為伴隨著蘇聯日益沉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戈巴契夫必須重新修訂蘇聯的區域政策，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反應蘇聯的國家利益不再經由軍事力量與鎮壓來取得，同時也給予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更大的空間發展社會反對運動，最後東歐的政治民主化所造成的「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是蘇聯崩潰的一大原因。<sup>42</sup>此外，戈巴

<sup>39</sup> 鄭羽主編，《普京時代：2000~200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頁 23-24。

<sup>40</sup> Vladislav Surkov,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 *Russ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47, No. 4 (2009), pp.8-21.

<sup>41</sup> 鄭羽，前引書，頁 28。

<sup>42</sup> David Poter, et al. 王謙等譯，《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2000)，頁 477-481。

契夫所推動的改革中放棄了共產主義教條，也為蘇聯本身帶來另一項的合法性危機。如同 Larry Diamond 所言：合法統治權威卑微及效能低落，這兩者的結合或相互震盪，<sup>43</sup>是政權不穩的基本原因，由於缺少合法統治權威，政府在經濟上不可能有效能；由於缺少效能，他們又不能培養出合法統治權威。至此，戈巴契夫的改革由經濟層面轉向政治層面，而且不僅僅是自由化，也必須向民主化邁進。

Linz 與 Alfred Stepan 的著作《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困境》(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描述了俄羅斯在民主轉型歷程中所遭遇的三個難題：追求獨立勝過於追求民主化、追求集體利益勝過於注重個人利益、追求經濟重建勝過於追求國家重建。戈巴契夫以自由化對抗黨內保守派，葉爾欽以獨立對抗戈巴契夫的中央政府，民主化只是副產品，並非他們的主要目標。<sup>44</sup>誠如 Brian Barry 所提出的疑問：「民主化的主因，是對民主價值的肯定，或是政府採行競爭性選舉改革所致？」。換言之，俄羅斯人民在 1991 年蘇聯瓦解之際，是否真心地擁抱民主？或著只是順應時勢？

Alexander Lukin 在《新威權主義與後蘇維埃政治理想》(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一文中指出，戈巴契夫在蘇聯末期所推動的改革方向是錯誤的，Lukin 以俄國人政治理想的角度為出發點，解釋俄羅斯目前所出現的「新威權主義」事實上是其來有自。長久以來，政治學者認為蘇聯崩潰的主因在於人民對共產政權失望，並渴望建立西方式民主與市場經濟，但 Lukin 認為事實上俄羅斯的情況應該更為複雜。他認為人民的不滿早從後史達林時代就開始，對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幻滅，卻不一定代表人民想要西方式民主，他指出俄羅斯人民只是想要生活在一個去史達林的體制下。<sup>45</sup> 戈巴契夫太專注於自由化，不僅不符合俄羅斯國情，且忽略了人民真正重視的議

<sup>43</sup>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 Seymour Lipset,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ilitating and Obstructing Factors,”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87-1988), p.231.

<sup>44</sup>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386-397.

<sup>45</sup> Alexander Lukin,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 *Post-Soviet Affairs*,

題：生活水準的提升。<sup>46</sup>戈巴契夫改革所帶來的混亂情況，促使俄羅斯民眾普遍認為國家正處於「無秩序」、「無權威」、「無政府」的狀況。<sup>47</sup>

根據 Rustow 的觀點，在政權的挑戰者與被挑戰者之間權力分配尚未明朗化的情勢下，最有可能產生向民主的成功過渡，因為透過對抗的方式將使雙方兩敗俱傷，於是他們透過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也就是所謂的「約定轉型」。<sup>48</sup>Adam Przeworski 由這個論點在其著作《民主與市場》(Democracy and Market)中引申出一個假設，即過渡初期權力之間不確定的平衡更容易走向民主制度。他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躲在羅爾斯之幕(Rawlsian Veil)之後，他們對自己在未來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力量知之甚少，他們將會選擇成本最小 - 效果最大的解決方式(Maximin Solution)，建立制衡與擴大少數派政治影響力的制度。<sup>49</sup>換言之，不確定性具有促成民主妥協結果的可能性。

McFaul 在其著作《俄羅斯未竟的革命》(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中，將俄羅斯的轉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戈巴契夫時代(1985-1991 年)、第一共和(1991-1993 年)、第二共和(1993 年至今)。前兩個階段俄羅斯對於民主的嘗試都是失敗的，最終都是導致政變或武力衝突，1993 年俄羅斯聯邦憲法通過後的民主俄羅斯是脆弱的，雖然設計民主制度的第三次嘗試與努力比前兩次持久，但這新體系依然不是一個自由民主。強大的國會、健全的政黨體系與司法獨立並未獲得鞏固。更深層的原因是菁英與整個社會都尚未對民主制度形成義務，無論是菁英或是大眾都依然存在反民主的態度，在民主制度中的自利動機並未轉化成對民主的義務。<sup>50</sup>

---

Vol.25, No. 1 (2009), p.67.

<sup>46</sup> Ibid., p.71.

<sup>47</sup> Ibid., p.72

<sup>48</sup>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op. cit., pp.337-363.

<sup>49</sup>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87.

<sup>50</sup> Michael McFaul, 唐賢興等譯，*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巴契夫到普京的政治變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頁 1-3。

McFaul 反駁權力平衡論者所提倡的平等的權力分配與成功的向民主過渡之間存在著正相關，在俄羅斯的案例中顯示了完全相反的結果，權力間相當平等但不確定的態勢只會製造爭端而非妥協。<sup>51</sup>從 1991 年八月政變至 1993 年十月府會衝突期間，對立的雙方可謂是勢均力敵，符合民主所追求的權力分散。然而，較穩定的秩序卻是出現在府會激烈對抗之後，俄羅斯顯示與其他東歐國家民主化不同的經驗，選舉式民主確實有可能透過較威權的統治形態產生。

葉爾欽在「十月事件」中的勝利說明了俄羅斯三項政治特色：第一，在俄國人的價值中缺乏民主的妥協、讓步，追求全體利益極大化的價值，尤其是在政治領域更是如此，葉爾欽以武力解散政敵盤踞的國會，即使國會具有民意正當性，這種衝突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是很難以想像的。第二，民主制度與民主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民主政治文化有利於民主的產生與鞏固，而民主制度的實行同時也有利於民主政治文化的培養。自稱民主主義者的葉爾欽在十月事件中以武力解決爭端，不僅羞辱了民主，同時也做了一次最糟糕的民主示範，讓人民對於民主失去了信心。第三，葉爾欽利用他的勝利制定了新的超級總統制憲法，隨後在 1993 年十二月的公民投票中獲得批准，他遺留給繼承者普丁的體系，是一個「委託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總統雖是民選產生，卻不受任何的制度限制。同時這意味著俄羅斯人民追求的價值是穩定與秩序，同意民主的形式可以用較威權的方式存在，即使這樣的形態會影響長久的民主鞏固。

正如 Brown 所言：1990 年代的民主經驗，對於在俄羅斯政治文化中穩固對於民主原則的支持，幫助甚少。<sup>52</sup> Hahn 也提到民主在俄羅斯轉型初期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俄國人是經過理性選擇，以工具性(Instrumental)的觀點來看待民主，期望民主制度能

<sup>51</sup> 同前註，頁 13-14。

<sup>52</sup> Archie Brow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tisation: The Russ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etlef Pollack, Jurg Jacobs, Olaf Muller & Gert Pickel. eds., *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m Europe: Attitudes in new Democracies* (Ashgate: Aldershot, 2003), p.24.

帶來更好的經濟生活，而這種工具的民主價值很容易因為短期的政策轉變而消退。<sup>53</sup> 菁英的策略選擇建立了一套民主的遊戲規則，並用這套規則約束其他的菁英與大眾，同時將民主精神深化，使民主制度得以長期鞏固。俄羅斯曾經建立一個有希望的民主政體，然而菁英錯過了這樣的一個機會，糟糕的經濟表現更拖垮了人民對於民主的信心，使俄國人寧願走向回頭路，也為普丁政權帶來威權主義滋長的機會。



---

<sup>53</sup> Jeffrey Hahn, “Yaroslavl’ Revisited: Assess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1990,” *op. cit.*, p.151.

## 第二章 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傳承

民意與政治文化這兩個概念存在著相當的重疊，因為兩者都著重於對政治的態度。不過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民意側重於對特定領袖人物以及政策的觀感，並尋求對當前問題的回應。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的標的，在於尋求對政治及政府的基本和普遍態度，並做為統治正當性的支柱。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民意的變化如流水，快速且短暫，而政治文化則是緩慢地改變，而且較具有延續性。學者 Walter Rosenbaum 曾對政治文化的形成歸納出四點來源：

### 一、政治社會化

文化根源於學習，而對於政治信仰與政治過程的學習，稱之為「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社會化的內容通常是上一代所抱持信念與價值以及執政當局所支持與鼓勵的理念。經由代代相傳，推衍形成一個有銜接性的歷史文化傳統。每個人一生中所接觸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社會化機構是家庭，其次是學校、各種機關團體，包括執政當局運用媒體等制度，直接或間接灌輸政治意味濃厚的信念與價值觀。<sup>54</sup>

### 二、個人的生活經驗

基於每個人特殊的政治經濟背景，所導致對政治標的物導向的差異。也可能因為一般性或偶發事件以及政策改變，所帶來心理上或思想上的蛻變，甚至產生對國家權威當局憎恨反對或較消極的態度，或著支持當局的情況。<sup>55</sup>

<sup>54</sup> Walter A. Rosenbaum,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1975), pp.12-21.

<sup>55</sup> 江炳倫，*政治文化研究導論*（臺北：正中，1983），頁 96-97。

### 三、歷史經驗

除了個人生活經驗以外，國家在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與危機，如戰爭、革命等，經過代代相傳的集體記憶，常是一國政治文化特色的關鍵因素。<sup>56</sup>

### 四、政府的作爲

政府爲了取得在大眾心目中能夠有良好的評價並獲得正當性，必定傾全力控制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媒介，特別是教育制度與教育內容，希望藉由此方式來塑造一個符合統治者利益的大眾政治文化。因此凡是具有歷史傳統的政權皆全力宣揚其政權的合法性，是歷史的必然，並強調追求社會穩定的重要性。

從這四點不難看出 Rosenbaum 所言的政治文化，強調歷史經驗與政府的主動作爲。本章將從此兩個面向，分成三個階段，探討俄羅斯政治文化的本質，從歷史的脈絡建構出現今俄羅斯政治文化的面貌。

---

<sup>56</sup> Sidney Verba,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p.544.

## 第一節 威權路徑的建立

學者對於至今俄羅斯仍然未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而且崇尚威權的特質等現象，各自提出不同的歷史解釋途徑，筆者將之歸納出七點歷史因素：<sup>57</sup>缺乏自治精神、封建制度存在時間太短無法發揮作用、蒙古統治的影響、在政治層面受西方影響甚少、莫斯科與基輔兩個時代之間延續性薄弱、地理環境的影響、缺乏中產階級。若從俄羅斯長久的歷史來看，基輔公國(Kievan Rus)、莫斯科公國(Moscovite Rus)以及羅曼若夫王朝(Romanov Dynasty)初期，是俄羅斯政治文化中崇尚威權、王權至上等舊傳統的建構時期。

### 一、短暫的分權精神

俄羅斯人崇尚威權的特質，特別是在以沙皇為代表的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面前，表現出絕對的服從，俄羅斯人的國家觀念與集權意識是在追求國家統一，驅逐外族統治的過程中所逐步實現的。俄羅斯國家形成可回溯至西元九世紀留裏克王朝(Riurik Dynasty)所建立的基輔公國，是俄羅斯境內的第一個國家。基輔公國是一建立在經濟關係的封建制度，大公手握經濟資源，根據諸侯之效忠度，對其賞賜封邑或允其分享商業通道的利益。<sup>58</sup>

蘇聯歷史學家切立波寧(L. V. Cherepnin)，認為基輔的政體是封建制度，與當時的西歐，基本上並無差別，他說：以基輔為中心的古代俄羅斯國家是封建的…因為它是一個統治與依賴農民的封建地主權力機構。從這點上來看，基輔羅斯與羅馬-日爾曼等地的

<sup>57</sup> 有關俄羅斯威權政治文化的歷史解釋因素，請參見：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dward Keenan, "Muscovite Political Folkways," *Russian Review*, Vol. 45, No.2 (1986).

Robert C. Tucker, "Sovietology and Russian History," *Post-Soviet Affairs*, Vol. 8, No.3 (1992).

<sup>58</sup> 賀允宜，*俄國史*，(臺北：三民，2004)，頁 36。

中古國家並無區別。<sup>59</sup>因此，基輔公國的基本政體，雖然是大一統的局面，也同時是諸侯結合組成的鬆散聯邦，從未實行中央集權，也從未產生官僚體系。

若從民主起源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在基輔公國時期確實有機會如同英國，藉由地方諸侯以及議會的分權，達到限制王權的目的，再藉由王權的可限制性，逐步的形成民主的雛形。基輔時代的國家大事，是由大公與貴族武士階級共同商議治理，由貴族組成的「博亞議會」(Boyarskaia Duma)擁有協助大公立法及締結條約的特權，同時也是最高的上訴法院，對於大公有極高的影響力，重大事件若無議會同意，大公不敢貿然行事。<sup>60</sup>在一般人民方面，尚有自由民所組成的「維其」(Veche)，對於限制大公增稅、作戰、以及繼承權發生爭議時能夠發揮影響力。<sup>61</sup>

不少學者認為基輔時代即是俄羅斯擁有民主精神的證明。Jakob Haury 即寫道，遠在拜占庭時代，拜占庭的歷史學家就認為斯拉夫人的生活方式很民主。<sup>62</sup> Dmitrii Likhachev 也認為君王的權力很明顯的受到群眾參與所限制，即使基輔成為斯拉夫人城邦的權力中心，軍事貴族(Druzhina)依然扮演重要的分權角色。<sup>63</sup>然而，基輔時代的議會終究沒有演變成類似英國的「巴力門」(Parliament)制度，因為貴族們對於王權的約束，大部分建立傳統與慣例之上，與同處於中古世紀的英國貴族不同點在於，英國貴族透過直接的立法行動制定「大憲章」(Magna Carter)，使君權受到法律限制，開啟君主立憲的第一步。

<sup>59</sup> Thomas Riha, eds., *Readings in Russian Civilization*,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83.

<sup>60</sup> 賀允宣，前引書，頁37。

<sup>61</sup> 周雪舫，*俄羅斯史*，(臺北：三民，2003)，頁11。

<sup>62</sup> Jakob Haury, “Procopii Caesariensis de de bellis libri V-VIII,” *Opera omnia*, v.2, vii. 14.22 (1963), pp.70-71.

<sup>63</sup> Dmtrii Likhachev, *Biblioteka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Sankt Peterburg: Nauka, 1997), pp.498-504.

## 二、蒙古統治的遺緒

蒙古對俄羅斯的統治，自西元 1240 年攻陷基輔，至西元 1480 年伊凡三世(Ivan III)停止向金帳汗國(Golden Horde)納貢為止，前後歷時兩百四十年，致使其歷史的發展改變方向，與西方斷絕數百年之久，成為亞洲化(Oriental)的國家，對於俄國的政治、社會、文化都有其深遠的影響。

第一，在政治思想方面，蒙古可汗認為他的統治權力，並非來自於臣民的推舉，而是直接受命於天。因此，可汗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可限制的，換言之，也就是君主專制的思想。蒙古的統治者認為，全國人民，不論財富多寡、地位高低，都應該為國家盡心盡力的提供服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來逃避本身的義務與責任。這種政治思想深深的影響日後莫斯科的統治者，皆將之奉為治國方針。<sup>64</sup>頗類似於近代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所提倡的國家至上論，日後的蘇維埃政權雖為共和國的形式，也繼承了這套專制獨裁的理論，其所實行的民主政治與西方差異極大。雖然近代有部分學者對於蒙古遺緒的影響提出質疑，例如：Valentin A. Riazanovsky，但他們依然無法否認，蒙古統治對於俄羅斯獨裁體制的出現，確實有間接的影響。<sup>65</sup>

第二，在社會思潮方面蒙古的統治使俄羅斯深具東方色彩，並與西方各國的政治發展脫鉤。因此，歐洲從中古世紀末期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降，歷經人文主義、宗教改革等醞育自由主義，更重視人類本身價值的民主思想，俄國在那個時代對這些都知之甚少。除此之外，東西方長期的隔絕，也使得俄國培養出自己獨特的文化思想系統－斯拉夫主義，其與東正教思想相結合，強調俄國本身文化的獨特性與神聖性。當十八世紀

<sup>64</sup> Leo De Hartog,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Principalities and the Golden Horde 1221-1502*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6), pp.5-10.

<sup>65</sup> 轉引自 Alexander Lukin & Pavel Lukin, “Myths about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Russian History,”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p.28-29.

末西歐自由主義開始東傳俄國之時，自然引起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激烈論戰。1836 年查達耶夫(Peter Chaadaev)發表《哲學書簡》(Philosophical Letters)，強調俄國唯有吸取西歐文化，才能夠有光明的前途。<sup>66</sup>他對於俄羅斯本身的文化如此評述：我們從未與其他人一同進步，我們從未屬於任何一個偉大的人類家庭，我們既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我們所擁有的傳統什麼也不是。他對俄國的歷史傳統持否定的態度：我們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是生活再死亡的寧靜之間，我們孤獨的從全人類的進步中脫離出來，什麼都沒有吸收到。他對於西方文明極為讚賞：他們(西方)繼承了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責任、正義、法律與秩序，俄羅斯卻什麼都沒繼承到。我們在世界上相當孤獨，我們不曾給予世界什麼，也不曾教導世界什麼，我們對人類文的進步沒有任何的貢獻。

查達耶夫的觀點一出立刻引來本土派保守力量的抨擊，除了沙皇政府的介入之外，許多知識份子也紛紛表達他們對西歐文明厭惡，他們強調：俄國歷史發展道路與西歐不同，俄國文化遠比西方文化優越，因為俄國東正教一直保有純潔性，而且俄國具有歷史悠久的村社精神，能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和諧。另一方面，西方的政黨政治常導致惡鬥與暴力革命，這並不是俄國人民所期望的，俄國人不關心政治，也不想限制君王的權力。西歐的資本主義更是萬惡淵藪，只重視物質生活，忽略掉精神層次的提升，這與俄國純樸的民族特性背道而馳，因此俄國要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不需要學習西方。<sup>67</sup>

### 三、東正教的影響

基督教信仰雖然在西元十世紀之前就已經進入俄羅斯地區(Rus Lands)，但一直到西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Vladimir)皈依拜占庭的東正教後，東正教才正式的成為基輔公國的國教。在上千年的歷史當中，東正教與俄羅斯與俄羅斯精神文化有著千絲萬縷

<sup>66</sup>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pp.105-106.

<sup>67</sup>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pp.109-114.

的聯繫，對俄羅斯命運的影響更不能忽視。第一，東正教的地位重要，在異族統治之下，東正教扮演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支柱，成為被壓迫者的重要慰藉。莫斯科王公之所以能驅逐蒙古人，建立中央集權的王國，東正教的支持，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此階段，東正教與國家保持著互相利用的關係，國家藉由宗教力量馴服人民，宗教則藉由國家力量擴張教區，基本上保持著拜占庭式政教合一的平衡狀態。

第二，在進入羅曼諾夫王朝之後，教權逐漸向王權傾斜。羅曼諾夫王朝的開國之君米哈伊爾(Mikhail)，是當時東正教的大主教菲拉列特之子，因此王朝開國之初，採用的是二元化政體(Dyarchy)，由大主教及沙皇共同治理俄羅斯。傳位至沙皇阿列克謝(Aleksei)，阿列克謝為了推動教會改革，邀請尼康(Nikita Nikon)出任教長，起初兩者合作無間，順利的引進希臘東正教的教義與教儀，但因為尼康企圖將教權置於王權之上，而遭到罷黜。<sup>68</sup>表面上這是一場君臣之爭，若從政教關係發展的過程來看來看，事實上是突顯了教會在社會中應有何種地位的爭議，換言之，乃是王權與教權孰輕孰重的基本問題，而教權是屈於下風的。日後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更是直接廢除教長的職位，將教會置於政府行政體系的管轄之下，成為王權的輔助工具，沙皇不僅向地方的王公收回了權力，連長期保持獨立地位的教會都必須向世俗的王權屈服。

第三，第三羅馬與彌賽亞思想的形成。Tim McDaniel 曾經在他的著作《俄羅斯人思想上的苦痛》(The Agony of Russian Idea)針對俄國的彌賽亞思想(Messianic Belief)提出一個概念「文化陷阱」(Culture Trap)：即根植於俄國社會中的彌賽亞思想能夠成功的阻擋俄羅斯採取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因為根據俄國人的理想，俄羅斯可以找到一條更好的路徑，建立有別於西方的、只屬於俄國的制度與價值。<sup>69</sup>西元 1453 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依照俄國教會的解釋，這是上帝對於背叛教義附從異

<sup>68</sup> 賀允宜，前引書，頁 158-169。

<sup>69</sup> Tim McDaniel,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14.

端份子的「天譴」，是罪有應得的懲罰。<sup>70</sup>過去俄國人一向將君士坦丁堡視為「第二座羅馬城」，是基督教正統之所在，如今即被異教徒佔領，唯有莫斯科有資格繼承此項傳統，於是自稱莫斯科為「第三座羅馬城」(The Third Rome)。此外，伊凡三世與拜占庭王室的索菲亞(Sophia)聯姻，更大大地提高莫斯科的政治與宗教地位，莫斯科的大主教鄒司馬(Zosima)於 1492 年的詔令中，就特別強調伊凡三世是維護基督教信仰的新保護者，莫斯科是羅馬帝國的新首都。<sup>71</sup>第三羅馬的觀念，在 1547 年伊凡四世(Ivan IV)登基大典上，被徹底的突顯出來，因為伊凡四世是第一位正式採用沙皇此稱謂的莫斯科統治者，乃是繼承政、教兩正統的沙皇。

從今以後，莫斯科的統治者不僅僅是莫斯科王公，同時也是上帝所選的俄羅斯的統治者，更是保護所有基督教信徒的領袖，是重建羅馬帝國與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唯一希望。西方文化是受異教徒污染的、不潔的，唯有俄羅斯能夠拯救基督教文明，第三羅馬的觀念對於俄羅斯的彌賽亞思想以及文化的發展道路有著莫大的影響，俄羅斯東正教在信仰上的優越感，是造成俄羅斯文化特色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古世紀以後天主教世界所發生的一切變革，均與俄國不相關聯，另一方面，十五世紀開始的歐洲，則正是文化發展最有活力的時期，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等運動，摧毀了中古歐洲的壓抑性文化，造就一個以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及重視科學的新歐洲文化，並孕育了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型。俄羅斯仇視西方的結果，使其孤立於歐洲文化之外，雖然日後彼得大帝推行了一系列西化改革政策，但沉重的歷史使命感，使得俄羅斯在文化思想上難以突破。

#### 四、走向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帝國

Stephen White 在著作《政治文化與蘇維埃政治》(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sup>70</sup> 郭小麗，*俄羅斯的彌賽亞意識*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174-180。

<sup>71</sup> 賀允宜，前引書，頁 113。

Politics)中，認為在俄國歷史上領土擴張的過程中所產生附加現象，是邁向統一與中央集權，是因為俄國必須有很強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與軍國主義(Militarism)才能維持廣大的領土。<sup>72</sup>Tibor Szamuely 也認為從俄羅斯帝國統一的過程中，地理環境確實是其形成中央集權政治體系的重要因素，蒙古的統治破壞了基輔原有的政治制度，莫斯科公國崛起之後，中央集權與王權至上的觀點已經取代原有的城邦分權。他在《俄國的傳統》(The Russian Tradition)書中，如此寫道：俄國擁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機器，可以完全控制人民、財產、甚至是臣民的思想。這個國家機器起源於俄國缺乏自然國境，必須不斷的侵略、佔領以及殖民的殘酷循環之中。<sup>73</sup>

這是俄羅斯在莫斯科公國時期，最重要的轉變之一，以武力統一了四分五裂的國家，建立中央集權的政體，同時基輔時代割據各地的世襲性「博亞」貴族放棄了傳統上的獨立自主特權，變成支持中央政權的地主階級，此後地主的封邑不再是世襲，而是沙皇依功績與效忠程度所賜與。

第一，莫斯科公國所採行的特殊封建制度，有利於王權的發展。為了避免重蹈基輔時期「輪番」制所造成的混亂局面，莫斯科公國自伊凡一世開始，就採取所謂「長子繼承制」，每次分封，長子所得的領地與農民，均較其他兄弟為多，所以大公的領地面積越來越大，確保獨尊嫡系，使其控制其他支系的傳統。<sup>74</sup>

第二，莫斯科公國的貴族階級，在組成方面已出現質變。在伊凡三世以前，如遇戰事，大公在召集軍隊之前，必須與各親王商議。伊凡三世將各親王的軍權劃歸己有，又剝奪各親王效忠選擇權，只能效忠莫斯科大公。此外，為抗衡勢力龐大的「博亞」貴族，伊凡三世更創立了「役田」制度(Pomestie)，培養出一批新興的服

<sup>72</sup> 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9), p.5.

<sup>73</sup> Tibor Szamuely, *The Russian Tradition* (London: Martin Secker & Warburg, 1974), p.8.

<sup>74</sup> 李邁先，*俄國史*，上卷，(台北：正中，1969)，頁84-85。

役貴族(Dvoriane)，服役貴族的領地並非來自於世襲，而是來自於為沙皇服役，換言之，只有效忠沙皇者才有資格獲得土地。伊凡四世所創立的「沙皇直轄區」(Oprichnina)，更是慘酷的打壓博亞貴族，隨著直轄區的擴大，境內的直轄軍可以恣意對貴族逮捕、驅除或殺害，遇有不服者即沒收封邑。博亞貴族經此打擊，已經對沙皇不再構成威脅，而擁護沙皇的服役貴族已經成為專制政體的支柱，伊凡四世留給日後統治者一個沙皇絕對獨裁的政體。



## 第二節 威權路徑的強化

經歷混亂時期無政府狀態，新生的羅曼若夫王朝，在治國策略的選擇上，採取了更為保守的政策。雖然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以及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II)的開明專制之下，與西歐的接觸頗多，基本上政權仍然延續著諸多的舊傳統，繼續維持中央集權的政治基調，也大大的影響日後俄羅斯所選擇的政治道路。

### 一、法定正統三信條

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統治帝俄時期，是俄羅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達到頂峰的時代，對內設置「第三部」(The Third Section)審查出版品，從嚴控制臣民的思想，對外積極派兵干預當時在歐陸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使其獲得「歐洲憲兵」(The Gendarme of Europe)之稱號。不僅如此，尼古拉一世有鑑於知識分子不斷的鼓吹革命思想、解放農奴等問題，已經威脅到帝國的根基，必須有可以對抗自由主義，而且保持俄國傳統的一套思想體系，因此，在 1832 年由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尤瓦若夫(S. S. Uvarov)發布《法定正統三信條》(Official Doctrines)的教育方針，包含了：君主專制(Autocracy)、正統東正教(Othodoxy)、民族特性(Nationality)。<sup>75</sup>三信條總結了俄羅斯千年歷史的立國精神以及信仰基礎，並且揭示了日後的俄羅斯人民何謂思想的正確性，在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佔有承先啓後的指導地位。

由瓦若夫的指令中指出：當宗教與各種政府制度在歐洲急速的崩潰，當腐蝕性的邪惡思想在氾濫著，在面對我們四周的罪惡現象時，一定要將祖國建立在一個基

<sup>75</sup> 三信條原本並無正式名稱，「法定正統信條」是 1870 年代的帝俄歷史學家皮平(Alexander Pypin)所賦名。

於人民幸福、力量與生命的堅固基礎上。我們一定要找出形成俄羅斯民族特性，也只屬於俄羅斯人民特殊性格的原則是什麼…俄羅斯人民謙恭地、緊密地依附在他們祖先的教堂，他們自古以來，就信奉教堂是保障家庭與社會幸福的依靠。對自己祖先的信仰不尊敬的話，個人與整個民族都會滅亡。深愛祖國的俄羅斯人民都會同意，沙皇王冠上的一顆珍珠被偷竊的結果，這趕不上我們正統信仰中任何一個信條被破壞的嚴重性。君主專制是俄羅斯在政治上生存的主要條件，沙皇陛下的無數臣民都感受到這項真理，無論地位、教育高低、與政府疏密與否，他們對於只有一個強壯、仁慈與開明精神的君主專制，才能保障俄羅斯人民生命的堅固信念，卻是完全一樣。<sup>76</sup>

三信條頒定以後獲得不少的知識份子支持，紛紛發表肯定性的看法，當時的莫斯科大學教授謝夫瑞夫(S. Shevyrev)在某段談話中即表明：雖然我們在與西方的接觸中，確實拾取一些無法避免的瑕疵。但在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保存了三項基本、純正性的感情。我們保持古老的宗教感情，基督教對我們的生活與教育，都留下深刻的影響。其次，是使得俄羅斯強壯及保障未來的感情，這就是再我們國家歷史演變中一直保持著團結的感情。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我們一樣驕傲的宣稱，我們國家在政治上一直保持和諧。只有在我們的土地中，沙皇與人民共同形成了一個無法被破壞的整體，絕對不允許存在任何導致他們分歧的阻礙。這種緊密的連接是建築在人民對沙皇毫無保留的奉獻之上。我們第三個基本感情，是對於我們民族特性的認知，確信任何開明的思想，只有被我們的民族情感所融化，經由我們自己的思想與語言表達出來，才算是在我們的土地中落地生根。<sup>77</sup>

對於尼古拉一世而言，三信條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東正教的基督信仰，因為東正

<sup>76</sup> 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9), pp.74-75.

<sup>77</sup> *Ibid.*, pp.75-76.

教可以藉由宗教與家庭的結合，使俄國人從孩童時期開始，即接觸到政治社會化的第一步，了解信仰上帝與服從沙皇的重要性。針對東正教與家庭密不可分的關係，謝夫瑞夫如此表示：我們也要在家庭中嚴格建立起基督教氣氛，首先一定要將包括生命意義與外在儀式的基督教教引進家庭。更近一步地，一定要儘可能的使家庭與教堂保持不斷的聯繫，要在家庭舉行宗教儀式…經由外在感受到神聖的宗教真諦，才能滲透到兒童的心靈之中。<sup>78</sup>

至於君主專制，尼古拉一世之所以特別標榜這一點，只不過是延續自莫斯科羅斯以來的立國原則。彼得大帝所制定的軍法中就明文規定：沙皇陛下是獨裁的君主，不必對任何人解釋自己的行為。他以基督徒主宰者的身分，根據上帝意旨與裁判，握有治理土地與國家的力量與權威。俄羅斯的君主專制體系，不只是世俗傳統政體的延續，也是維持東正教信仰的主要精神力量，因為在基督教世紀裡，專制君主擁有最高的力量，他是人與上帝之間的銜接者。即使是長期暗諷沙皇政體的貪官污吏以及不人道的農奴制度的寫實主義小說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也贊同君主專制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為什麼我們之間，必須要有個地位高於其他人，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約束之人？因為法律是刻版的，會使人感受到它只有嚴酷無情與不友善…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至高無上的仁慈者來和緩法律的嚴峻性。在這世上，他唯一呈現的方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沒有絕對威權君主的國家，只會像一個無人操作的機械。<sup>79</sup>

俄羅斯的君主專制政體，在東正教會與學者們賦與宗教色彩的支持下，發展出一套思想體系完整的君權神授理論。將東正教信仰與君主專制結合在一起，以宗教與世俗權力雙重力量維護沙皇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俄羅斯民族特性即是

<sup>78</sup> Ibid., p.94.

<sup>79</sup> Ibid., pp.96-97.

要展現對於上帝以及沙皇的服從，由瓦若夫揉合當時風行的浪漫主義以及俄羅斯古老的信仰，把俄羅斯人描繪成最溫順、最謙恭、最敬畏上帝與沙皇、最吃苦耐勞但決不怨天尤人，更是最堅強的民族，絕對是上帝的選民。當時的歷史學家土契夫(Feodor Tyutchev)強調，俄羅斯人擁有能棄絕自我以及犧牲小我的偉大精神，這些才是陶冶道德行為的基礎：俄羅斯人民肅穆安詳的虔誠，對沙皇毫無保留的奉獻，對權威的服從，堅韌的忍耐性…樂天的脾氣，在最危險的時刻都能保持著勇氣以及對國家的驕傲感等特性…使他們產生一個堅定的信念。這就是沒有另一個能比俄羅斯更好的國家，也沒有任何一位君王能比東正教沙皇更具有權威的原因。<sup>80</sup>

三信條經過尼古拉一世欽定執行的七年後，法國文學家 Marquis De Custine 於旅行俄羅斯的期間，對俄羅斯有許多親身的觀察，是少數能在尼古拉一世時期觀察俄羅斯的外國人，其所寫成的《在俄羅斯旅行所寫的信》(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更是研究十九世紀上半葉俄羅斯社會狀態的重要史料。De Custine 在信中如此描述俄國：俄羅斯是一個以軍事紀律建構社會秩序的國家，社會被國家給完全包圍，是這個國家的正常狀態。<sup>81</sup>他強調：沙皇政府控制一切，不過卻使的一切看來都是死氣沉沉的。<sup>82</sup>De Custine 繼續寫道：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歷任的統治者都必須面臨一個困境，這就是如何將彼得所引進的西化的行政機構，與廣大的、具東方傳統的俄羅斯人民融合在一起。這項困境使得無論是凱薩琳大帝或著是亞歷山大，能做的最多就是延長這些機構的壽命，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sup>83</sup>

在尼古拉之前的一百年間，俄羅斯終於有機會與西方進行頻繁的接觸，彼得大帝與凱薩琳二世對於西方制度與思想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以凱薩琳女皇所發佈的「訓令」

<sup>80</sup> Ibid., p.125.

<sup>81</sup> Marquis De Custine, *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 Robin Buss. e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44.

<sup>82</sup> Ibid., p.225.

<sup>83</sup> Ibid., p.102.

(Nakaz)而言，當中的條文多半採用法國啟蒙主義的精神，當時的貴族亦以能說法語或德語為傲，當時西歐對俄羅斯的影響可見一斑。在拿破崙戰爭(Napoleon wars)期間，跟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進軍法國的軍士官，深受西歐進步的物質文明與自由思想所震撼，其中的有志之士，在二十年後趁著新舊沙皇交接的空窗期，企圖發動政變推翻專制政體，史稱「十二月革命」(Decembrist Revolt)。「十二月革命」或許是尼古拉一世之所以如此痛恨自由主義的個人因素，不過從俄羅斯國家發展路徑的選擇來看，這次與西方價值的激烈對抗所產生的後續效應，將非常的深遠，因為三信條導致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直無法在俄羅斯社會中有效地成長，俄羅斯再次與西方自由主義有所接觸，是下個世紀九零年代的事了。

## 二、鞏固王權的農奴解放

Barrington Moore 在其名著《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行形成時的貴族與農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以四個會改變的權力結構：農民、地主上流階級、都市中產階級、國家，這四者的互動關係與變遷，來解釋民主化為何會發生以及民主的鞏固與否。<sup>84</sup>Moore 認為自由民主發展的歷史路徑是如此：地主階級解放農民，農業朝向商業化發展，農民因而喪失重要政治地位，地主階級與國家保持權力平衡，都市中產階級出現，並開始與地主階級以及國家進行鬥爭，中產階級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因而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因此，平衡的權力結構避免國家過於強勢或地主貴族政治盛行，使得中產階級能有空間成長茁壯，是民主發展的重要條件，Moore 的結論是：一個活力且獨立的城市居民階級，在議會民主的成長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sup>85</sup>

<sup>84</sup>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 Beacon Press, 1966), pp.8-16.

<sup>85</sup> *Ibid.*, p.418.

西歐各國在中古世紀之後，歷經封建制度的崩壞、工業革命時代，大量的農村人口移動城市是從事工商業，因此培育出一批擁有小規模資產的中產階級，馬克斯(Karl Marx)稱之為「布爾喬亞」(Bourgeoisie)。這批中產階級是西歐公民社會中對抗王權的生力軍，更是孕育現代民主政治的先鋒。反觀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出現的非常晚，而且規模小力量薄弱，這種情況與俄國歷史悠久的農奴制度有著極大的關係。俄國的農奴解放令頒佈於西元 1861 年，在歐洲各國中，是解放農奴最晚的國家，法國的農奴制度早在大革命時期即以剷除，奧地利與普魯士的農奴制度，也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完成廢除。俄國的農奴制度之所以歷史悠久，有其獨特的政經背景，而且與俄國追求穩定的政治及社會體系有極大的關係。

農奴制度最早定型於伊凡三世時期，在伊凡三世以前，俄國的農民能夠自由的遷徙，選擇自己要效忠的地主與耕作地，但因為俄國地廣人稀，勞力是重要的資產，伊凡三世為了鞏固服役貴族對政權的支持，便開始限制農民的遷徙自由。1497 年的《訴德部尼克法典》(Sudebnik)明文規定，農民只能在每年的「聖喬治節」(St. George's Day)前後兩個星期得以自由遷居，而且必須履行對地主的各項義務，得到地主許可後才能離開。<sup>86</sup>伊凡四世為了控制服役貴族的效忠性，更是訂定了「禁止年」(Prohibited Year)，將箝制農民遷徙的傳統予以制度化，永久化。至羅曼若夫王朝時期，農奴的地位與待遇更加的悲慘，任何逃離居住地的可能性，皆被另一項政策的建立所阻止，即「追討年限」有效時限的解除。1649 年所頒佈的《烏羅貞尼法典》(Ulozhenie)正式規定，私有農莊中的農民從今以後不再享受「追討年限」的保護，一旦逃離，則一輩子都在追捕的名單之中，而且不單單是農民個人，追補名單上包括眷屬，甚至世世代代的子孫都必須不斷的逃亡。<sup>87</sup>

<sup>86</sup> 賀允宜，前引書，頁 123。

<sup>87</sup> 賀允宜，前引書，頁 154-156。

農奴制度的建立，是羅曼若夫王朝需要服役貴族支援其中央集權，所給予的報酬，而且僅限於此一階級。另一方面，服役貴族為了享有農奴制度此項特權，也必須世代向沙皇效忠，為其服兵役，成為世襲性的軍事奴隸。其結果是俄羅斯變成一個沙皇支配教會、統治貴族，教會精神束縛人民，貴族統治農奴，階級嚴明不容許些許變動的社會。沙皇高高在上，集政、教權力於一身，成為名符其實的獨裁者。

不人道的農奴制度雖然於 1861 年獲得了解放，但事實上俄國解放農奴的原因，並不是受人權思想與自由主義的影響，更深層的原因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已經清楚的認知到農奴制度已經威脅了帝國的根基。他廢除農奴制度的動機相當複雜，參雜著經濟、政治與軍事各方面的考量。首先，隨著經濟制度的改變，大地主們開始感到原始的奴隸，已經無法與追求利潤的市場機制競爭。小地主們在大環境的改變之下，自己本身已經是自顧不暇，更遑論照顧農奴，對他們而言，農奴已不再是生產上的工具，而是經濟上的累贅，希望能將之擺脫。第二，農民經年累月的叛亂，已經擾亂了農村的秩序，使農耕無法正常，農產量銳減。根據統計，十九世紀開始至農奴解放之前，農民革命總共發生 1467 次，單單是在亞歷山大二世執政的前六年，農變就高達 474 件，可見這個問題越演越烈。<sup>88</sup>

因此，農奴的解放是為了帝國專制政體的穩定而解放，並不是為了廣大的黎民百姓所制定。解放詔令中處處可見對於貴族地主的偏頗，諸如：農民必須分四九年分期繳納一定補償金給地主後，始能獲得土地、仍然必須為地主執行勞役服務、地主繼續掌握管理農民的警察權等等。<sup>89</sup>這樣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是，農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放，因為他們在解放後，所分配的耕地比原來耕地面積小，根本無法負擔耕作成本之外的任何費用，而且還要等四九年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對於農

<sup>88</sup> 賀允宜，前引書，頁 376-377。

<sup>89</sup> 周雪舫，前引書，頁 115。

奴而言，解放令不但未能解決他們的困境，反而增加許多困擾。

處處偏袒政權與地主階級的改革方案，自然無法令知識份子感到滿意，他們在表達失望之餘，在思想上也漸漸出現轉變，轉向更為激進的民粹主義(Populism)與恐怖行動。1870 年代知識份子紛紛響應赫爾森(Alexander Herzen)的下鄉運動，他們堅信唯有俄羅斯農民的純樸性格與傳統的公社制度，才能拯救俄羅斯。然而，這群來自於城市的學生，並無法取得農民的信任，農民們懷疑貴族不懷好意，認為這群人舉止怪異，是故意來擾亂農村秩序，破壞農村團結，因此，主動報官逮捕這些可疑份子。絕大部分的俄羅斯農民就如同三信條中的「民族特性」所強調的服從與堅忍，對於沙皇是非常的敬愛與信仰，如同亞歷山大一世的大臣斯波倫斯基(Michael Speransky)所說：貴族的利益是將農奴屈服於他們無限的勢力之下，對農民來說，貴族應該像他們一樣，屈服於君主之下。貴族因為在政治上毫無保障，他們必須將自己的生活建築在土地以及土地的收益之上，結果就是必須要奴役農民。農民生活在壓榨他們為奴的情況下，只能仰望沙皇，把它當作是唯一可以制衡地主權威的力量。<sup>90</sup>對於俄國人來說，沙皇是真正且唯一能夠保護他們利益的守護者，也因為俄國特殊的政教合一制與彌賽亞思想，俄國人相信沙皇是上帝派在世上的真理體現者，<sup>91</sup>一直到 1905 年發生「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這樣的慘案之前，他們依然願意相信沙皇。<sup>92</sup>對照下鄉運動時農民的反應，當社會出現不穩定因素時，他們會選擇站在沙皇這一邊，打擊不穩定份子。由此可見對於社會穩定的要求，是俄羅斯平民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這也是帝俄能夠在農奴解放後，繼續存活五十多年的重要原因。

<sup>90</sup>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03.

<sup>91</sup> 郭小麗，前引書，頁 247。

<sup>92</sup> 在「血腥星期日」之前，俄羅斯人民普遍認為，沙皇是因為貪官污吏的包圍，才會受到矇蔽看不到人民的需求，甚至以「小叔叔」(Little Father)暱稱尼古拉二世。

### 第三節 威權路徑的繼承

農奴制度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最終拖垮了羅曼若夫王朝以及沙皇體制，新成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以及其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雖然是一個以工農無產階級為名的專政政權，它也確實使用了許多鐵一樣的手段來維持政權的生存，但它是否真是一個以無產階級利益為依歸的政權，則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換言之，它是一個以廣大人民為基礎的政權，或是延續著帝俄寡頭統治的傳統。

許多學者指出，蘇維埃時期的俄羅斯與之前的帝俄時期相比，在講求權力集中與忽視個人權益等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是歷史發展路徑上所無法避免的。根據這樣的邏輯，「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事實上是俄國傳統的繼承者(Russian Traditionalist)，而非國際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 Internationalist)。<sup>93</sup> Zbigniew Brzezinski 的著作《蘇維埃政政治：從未來到過去》(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如此描述蘇聯：列寧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模式與組織型態，在延續舊傳統的部份是超過其所終結的部份。史達林更是進一步將寡頭統治的傳統突顯出來，但是以一種新的型態。在政治領域中，布爾什維克緊緊抓牢權力，表現出俄國歷史傳統因素的創新與擴張，而非結束，這是(蘇維埃)制度與程序的合法性能夠持續到今天的原因。<sup>94</sup> 蘇維埃當局在政治上的威權作風，以及強調中央集權、獨裁、階層化的組織型態，可以解釋為何共產主義美夢逐漸在俄國人心中幻滅的同時，共產黨仍然能夠繼續執政，因為它與俄羅斯的傳統與政治文化相結合，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sup>93</sup> Alexander Lukin & Pavel Lukin, "Myths about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Russian History," *op. cit.*, pp.34-35.

<sup>94</sup> Zbigniew Bezezinski,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in Paul Cocks, Robert V. Daniels & Nancy Whittier Heer.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70-71.

學界中用政治文化的理論來理解共產政權演變主要包含兩個觀點：一個官方意識型態的破產；一個是本國政治文化的復興。第一個觀點是，共黨的意識型態最初的確有若干賦予政權合法性的功能，此時共產黨人會將統治視為理所當然。一般人民雖然不願意接受共黨的統治，但只要政治菁英相信自己的統治有正當性，體系就能夠繼續延續，這就是所謂的「由上到下的合法化」(Legitimation from the Top)。<sup>95</sup>不過當共黨菁英本身也開始懷疑官方的意識型態，或是共黨領袖開始對意識形態做出重大修改，導致共黨壟斷政權的合法性不再存在，他們就不再有意志強制鎮壓反對力量，共黨統治基礎也將隨之崩潰。這樣的現象在 1980 年代末期的中東歐非常普遍，俄羅斯同樣的面對如此困境，不過在共黨崩潰後的民主之路卻呈現不同的風貌。

與共產意識形態相呼應的是本國政治文化的興起，在此議題中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第一個是在傳統政治文化中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份量，第二個是傳統政治文化與共產政權的相容度。文化論對於後共國家在民主發展上所呈現的不一致，有很大的解釋力。從歷史上來看，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興起於西歐，然後才逐漸向東歐與南歐擴張，因此越靠近西歐的國家，例如波羅的海三國、匈牙利等，在文化上先天就排斥共產制度，這就是 Brzezinski 所言的「有機排斥」。更近一步說，自由主義成分越高的國家如捷克，民主轉型起步遲，速度快，程度徹底，過程又如此平順，若不是大眾早有實行民主的心理準備，政治文化已經成熟到可以發展民主政治，焉能如此。如此看來，如果一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共產政權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動搖。另一方面，如國一國的政治文化能夠與共產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做出結合，則共黨政權的存續能力將大幅增強，即使遇到民主化的浪潮襲來，共黨統治仍有可能屹立不搖。<sup>96</sup>

<sup>95</sup>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1995)，頁 18。

<sup>96</sup> 同前註，頁 21。

1949 年在慕尼黑，由社會心理學家 Alex Inkeles 與 Raymond Bauer 所主持的《哈佛計畫》(Harvard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是冷戰期間美國為瞭解鐵幕之後的蘇聯人民的政治行為與政治思想，所推動的長期、大規模的調查行動。Inkeles 與 Bauer 針對 1950 年至 1953 年數千名逃離蘇聯的難民，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大多蘇聯移民在遷居民主國家的多年後，竟然對蘇聯體制產生肯定的態度。另一方面，問卷顯示他們對於國家所領導的自由化下的自由社會並不喜好，尤其當國家無法確保社會安全與退休安全時，換言之，當國家無法扮演好「家父長」(Paternalistic State)的角色時，更增加他們對自由社會的厭惡。<sup>97</sup>居住在美國的移民者十分懷念蘇聯的社會福利，而且不喜歡毫無節制的言論自由。雖然他們不喜歡蘇聯全面支配農業與輕工業，但在國家主控的教育、醫療照護、國有製造業、重工業以及維持社會平等等各方面，受訪者大多表示肯定。顯示出蘇聯人民對蘇聯體制所提供的照護以及評估蘇聯政府的表現是不成正比的。這項調查並不代表，這些移民者喜歡共產黨的統治，只是意味著他們對強力的政府有某種偏好，他們雖然並不是直接支持威權，但卻認為威權是正常且理所當然的，這樣的態度取向絕對是威權體制成長的沃土。<sup>98</sup>

1987 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推動另一個調查計畫《蘇聯人訪談計畫》(Soviet Interview Project)，受訪者大多為城市居民，而且教育程度較高。此計劃的研究結果帶給西方政治學者相當大的震撼，研究者原本預期經過三十年的蘇聯統治，受訪者對蘇聯的評價應該更為負面，但受訪者所表現的政治態度卻與「哈佛計畫」差異不大。前蘇聯的公民表示，他們支持廣泛的人身自由與個人政治權利，但絕對不是毫無節制的。對於史達林以及布里茲涅夫的反感，並不代表渴

<sup>97</sup> Alex Inkeles & Raymond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246-247.

<sup>98</sup> *Ibid.*, p.301.

望引進西方制度。<sup>99</sup>相反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其實是希望督促政府去實現蘇聯人民的政治理想之下的產品。

Alexander Lukin 在《新威權主義與後蘇維埃政治理想》(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一文中指出，蘇聯人民在戈巴契夫進行改革之前，就已經形成一套對政府應有的理想型態之思想，而且完全不同於西方：<sup>100</sup>

一、應該由一個強大的國家來擔負更多的政治與經濟責任，而且國家必須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

二、強大的國家最重要的目標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國家公有制在主要的工業部門應該繼續保持，包括國防、能源、機械以及冶金等部門。

四、農業、貿易等部門應該盡量進行財產私有化，私有化制度也應該引進至輕工業，例如食品加工與紡織業。

五、國家福利制度(醫療、教育、退撫)不僅要繼續維持，更應該有顯著的改善，政府應該要更加注意這方面的服務，並提供更多資源。

六、應該賦予人民某些公民自由，包括遷徙自由(國內與國外)、財產私有權、言論表達權以及宗教自由。其他部分的自由與權利不應該比上述各項更重要。

<sup>99</sup> James R. Millar, eds., *Politics, 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11-114.

<sup>100</sup> Alexander Lukin,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 *op. cit.*, pp.69-70.

七、政府應該停止對人民的私生活與道德生活進行意識型態的干預，政府對於人民道德層面的控制應該完全停止。

八、外交政策應該要更為平和，排除任何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的可能，俄國應該要採取實用主義與其他國家進行多方面的合作。

九、俄國應該繼續維持其在世界佔有影響力的地位，並繼續運用這些影響力維持世界和平與繁榮。

總結上述各項研究，可歸納出俄國人所重視的三個面向：社會穩定、經濟生活、強國意識。這三面向是俄羅斯各個時期，特別是當社會面臨巨大政治、經濟轉變時的重要準則。根據 1989 年全蘇維埃(俄羅斯)公民意見調查中心(All-Soviet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VTsIom)所做的調查顯示，約有 56.8% 的公民認為自己真正缺乏的是物質上的滿足，只有 14.4% 的人認為急迫需要政治權利。同份民調也顯示俄國人民最重視的三個議題：一、保護人民的身家財產。二、建立一個沒有特權，能維持正義的體系。三、活化農村經濟。而建立自由、民主社會僅排第四個目標。<sup>101</sup>因此葉爾辛統治中期，俄羅斯社會出現「威權懷舊」(Nostalgia)的現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人民痛恨民主所帶來的災難，懷念過去蘇維埃體制下「從搖籃到墳墓」的經濟保障。

1997 年由愛荷華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Iowa)Arthur Miller 與 William Reisinger 所作的調查顯示，人民對於哪種政治制度適合俄羅斯，竟有 59.1% 的受訪者選擇「新思維」(Perestroika)之前的蘇聯體制，西方式民主只有 26.9% 的支持，葉爾辛體制更

<sup>101</sup> Yu. A. Levada, eds., *Sovetskiy prostoy chelovek. Opyt sotsial'nogo portreta na rubezhe 90-kh godov*, The Soviet man-on-the-street: An attempt at a social portrait in the early 1990s (Moscow: Mirovoy Okean, 1993), p.46.

只有 13.9% 的受訪者選擇。<sup>102</sup>

2000 年總統大選前兩個月，VTsIom 針對俄羅斯公民的政治態度進行民調，其中 75% 的民眾認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超過民主制度，而且國家應該要維持秩序，即使運用的手段危害到民主程序或個人自由都在所不惜。<sup>103</sup>即使歷經了十年的民主經驗，俄國人在政治體制方面依然傾向於一個較威權的政府，所以 Archie Brown 在《政治文化與民主化：比較觀點下的俄羅斯》(The Russ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專文中，才會特別強調在俄羅斯的例子中，民主經驗與培養民主政治文化之間，沒有顯著的關連性。民眾對於各項民主原則與機制的支持度出現明顯衰退。與之呼應的是 Edward Keenan 的研究《莫斯科公國式的政治習慣》(Muscovite Political Folkways)，Keenan 認為在彼得大帝之後，任何的改革，要改變莫斯科政治文化的舉動都是徒勞無功的，俄國的政治文化雖然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呈現，但事實上依然是舊的延續，約莫在 1930 年代末期就已經定型。<sup>104</sup>即便在今日，Keenan 的觀點依然很有參考價值。

<sup>102</sup> 轉引自 Thomas Remington,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 Pearson-Longman, 2006), p.117.

<sup>103</sup> Timothy Colton & Michael McFaul, “Are Russians undemocratic?,” *Post-Soviet Affairs*, Vol. 18, No. 2 (2002), p.91.

<sup>104</sup> Edward L. Keenan, “Muscovite Political Folkways”, *op. cit.*, pp.164-172.

## 第四節 小結

在本章中，筆者藉由介紹威權的建立、鞏固以及繼承此一路徑的沿革，粗略的呈現了俄羅斯政治文化的風貌。在建國的荆棘路上，俄羅斯歷任的統治者以強調中央集權、王權置上或獨裁來回應各種問題，構成菁英的政治文化，進而形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威權體制。另一方面，一般人民在面對如此威權體制時，採取的是較為服從甚至同化於體制內的作法，因此，可以見得俄羅斯平民政治文化所重視的是，追求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以及強國意識，也就是 Ronald Inglehart 所說的「物質文明」(Materialism)，在新興民主國家中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這也是為何諸多學者不斷的強調俄羅斯無論是政治菁英或公民社會，尚未準備好實行民主政治的主要因素。

強調集權的菁英政治文化與順從的平民政治文化(順從的前提是政經局勢穩定)，構成一個有利於威權政治的環境，只要一個具有領袖魅力的政治強人登上舞台，出現威權復辟的現象就不令人感到訝異。事實上俄羅斯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屬於兩極端的政治文化，在政局穩定的情況下，權力將定為一尊，反之若領導人給人不可靠的印象，俄羅斯的政局也將陷入混亂。戈巴契夫、葉爾辛都不是強勢型的政治領袖，他們無法給予民眾任何的保障，同時也無法穩定自己的政權。普丁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例子，在他的強勢政治風格領導之下，俄羅斯走出混亂與衰退的窘境，他了解民眾的需求，順著民意的執行他的國家重建政策，但是他利用民意打擊一切反對他的力量，倒退了俄羅斯的民主。與其說，是普丁的個人魅力使然，不如說是俄羅斯歷史的必然，目前的政治體制只不過是回歸到俄國人所期望與習慣的傳統型態，是「路徑依賴」的一種體現。

### 第三章 普丁與權力集中

2004 年普丁與西方政治學者及媒體會面時，作了以下談話：這(民主)在俄國不會那麼快實現，英國或美國的自由價值都根植於歷史之中，我們的國家及其機構、制度總是在人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俄國人來說，一個強大國家的概念不容易輕易被拋棄。相反的，俄國人將強大國家視為秩序的保證、改革的動力。<sup>105</sup> 普丁瞭解民意，他的治國策略，就是針對葉爾辛時期進行快速民主化與市場經濟所遺留下的後遺症：國家弱化與社會失序的現象。他透過「管理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的概念，強調民主必須與秩序結合，並以「總統權力垂直貫徹」強化中央集權，以「法律專政」的方式依法宰制異己、打擊反對力量。對於普丁這樣的政治精英而言，沙皇與蘇聯領導人的權力都沒受任何限制，當然也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受到任何節制，從俄羅斯的政治菁英身上甚難找到「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與「法治」(Rule of Law)精神的蹤跡。「管理式民主」有民主之名，卻無民主之實，反倒成為普丁從社會、地方、立法部門收回權力，遂行威權統治的工具。

「管理式民主」是一個複雜且階層化的體制，其基本特徵包括：(1) 一個強而有力的總統制，伴隨著其他制度機構的弱化-國會兩院、司法部門、私部門以及地方菁英。(2) 國家宰制媒體用以傳播訊息甚至形塑輿論。(3) 藉由操弄選舉體制改變民主程序的意義，由社會控制政府轉變成替精英的決策合法化與背書的工具。普丁打造了一個能使國家權威避開社會控制，但又能維持民主偽裝的一個體系。簡言之「他摧毀了所有政治權力的獨立來源」，使自己成為俄羅斯政治領域中唯一的合法存在。<sup>106</sup>

<sup>105</sup> 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57.

<sup>106</sup> Michael McFaul, "Putin's Strong Hand Is Failing Russia,"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4/09/b186693.html>>. (September 14, 2004) 檢視日期：

## 第一節 國家強化

探討俄羅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筆者欲從「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c)開始。Eric A. Nordlinger 在《論民主國家的自治》(The Autonomy of Democratic State)一書中，說明國家中心論的主旨是，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框架中，國家在政策領域的自主性極高，國家習慣依其偏好來行動，即使它的偏好與公民社會的需求有所悖離，國家依然自主的以自己的偏好行事。<sup>107</sup>國家中心論強調國家在政策制定與執行上的自主性以及對社會團體或個人的宰制，國家與公民社會互動中，能夠抵抗來自下層的壓力，獨立自主。國家中心論最足以解釋俄羅斯傳統的、由上而下式的國家統馭社會的強勢作風。

### 一、限縮媒體自由

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獨立媒體對於民主政治運作具有相當的重要性。Harlod D. Lasswell 在《社會的傳播結構與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專文中，指出媒體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第四權」，具有監視環境、協調關係、傳承文化三大功能。透過媒體揭發政府的不當措施，以促使其改進，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sup>108</sup>除此之外，媒體還肩負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重要角色，對於公共資源分配、政府官員以及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的公開討論，是國家與社會資訊交流的平台。<sup>109</sup>雖然普丁在上任後首次「國情咨文」(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曾矢言要捍衛媒體的獨立性，但是他同時強調，要

---

2011/02/20。

<sup>107</sup> Eric A. Nordlinger,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7.

<sup>108</sup> Harlod D. Lasswel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yman Bryson eds.,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228.

<sup>109</sup> Robert E. Denton, Jr., & Gary C. Woodwar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London: Praeger, 1998), p.11.

確保謀體不會偏頗報導，與國家對抗。<sup>110</sup>

第一，普丁利用司法手段以查帳為名來打擊那些他視為不合作對象的電視謀體，例如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的團隊，讓經營者陷入官司纏訟的痛苦中，再以經營不善為由吊銷電視台執照，或是由「國營天然氣公司」(Gasprom)出面接掌該電視頻道。2002年俄國有六個主要的新聞頻道：(1) Channel One，表面上是私人經營的電視台，但實際上由國家所掌控。(2) Channel Two，屬於國有並直接由國家運作的電視台。(3) Center Television，國有電視台，由莫斯科市政府負責運作。(4) NTV，最大的商業電視台。(5) TV-6，商業電視台，較少受到國家力量的干擾。(6) REN TV，尚未受國家滲透的獨立電視台。<sup>111</sup>2001年克里姆林宮決定壓制長期發表反對政府言論的NTV，由其最大股東國營天然氣公司強制接管NTV。別列佐夫斯基所領導的經營團隊轉移至TV-6，繼續發表不滿政府的言論，因而遭到關閉。幾個月後TV-6電視台以TVS的名稱重新復播，但因為節目策略錯誤，導致收視率大幅下滑，TVS在2003年6月同樣遭逢關台的命運。從此只剩下三家聽命於克里姆林宮的電視台Channel One、Channel Two、NTV能夠留在國家電視網，形成一種媒體國家化的狀態。<sup>112</sup>

出版業方面則是更早受到國家掌控。蘇聯時期報紙在俄國人日常生活中，曾經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蘇聯瓦解之後，報業在缺乏補助下逐漸蕭條，使得報紙變得昂貴，影響俄國人的閱報意願。因此，某些領導地位的報紙例如「莫斯科時報」(Moscow Times)、「消息報」(Izvestia)、「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都必須仰賴政府資源的挹注才能生存，它們的立場自然偏向克里姆林宮。大型報社尚且如此，小型報紙除了倒

<sup>110</sup> 「克林姆林宮」網站，「2000年國情咨文」，<[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0/07/08/0000\\_type70029type82912\\_70658.shtml](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0/07/08/0000_type70029type82912_70658.shtml)>，檢視日期：2010/01/28。

<sup>111</sup> Ellen Mickiewicz, *Television, Power, and the Public in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9.

<sup>112</sup> *Ibid.*, p.30.

向政府之外別無他法，大約有九成的俄國報紙受國家結構所支配或是由親政府的人士所經營。出版業被視為是擔任政府傳聲筒的政治資源。<sup>113</sup>

第二，普丁運用立法手段，嚴控新聞自由。2001年八月，國家杜馬通過「大眾媒體新聞法」修正案，規定收購或建立傳播媒體時，外資所佔比例不得超過 50%，<sup>114</sup>以阻止外國公司收購有重要影響力的電視台，避免其被西方利用。雖然聯邦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在法律上有關言論自由的定義卻是一改再改，使普丁得以法律來約束媒體的報導自由，而媒體的獨立性卻缺乏法律的保護。善變的法律文化(Law Culture)使法治無法在媒體圈中落實，媒體無法依法律或政府規範來行事，進而衍生出諸如廣播執照的換發、記者獲得資訊的管道，甚至是記者生命安全等問題。1994年11月，「莫斯科共青團報」(Moskovski Komsomolets)記者赫拉多夫(Dmitry Kholodov)因為報導軍方收受黑手黨(Mafia)賄賂，而遭到手提箱炸彈暗殺，<sup>115</sup>以及因報導車臣戰爭而聞名的女記者波利科夫斯卡亞(Anna Politkovskaya)被人發現陳屍在自家公寓。諸如此類的記者遇害事件頻頻發生，造成媒體的寒蟬效應以及選擇性報導。<sup>116</sup>

國家不僅在資金與法律面控制媒體，其對記者人身安全的漠視，更迫使記者對於報導政府負面消息的意願大幅降低，俄羅斯媒體業的公正性與獨立性因而大打折扣。反對派失去了發聲的舞台，媒體喪失了監督國家的功能，普羅大眾失去得知真相的權利，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就像失去雙眼，與國家之間處在一種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下，很難與國家抗衡。

<sup>113</sup> Ibid., pp.27-28.

<sup>114</sup>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 (台北：五南，2002)，頁 524。

<sup>115</sup> 「保護記者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網站，"Journalists Kills," <<http://cpj.org/killed/1994/dmitry-kholodov.php>>，檢視日期：2011/01/25。

<sup>116</sup> 單就普丁的兩任總統任期而言，俄羅斯就發生了十三起記者遭到謀殺的事件，而且都沒有破案。

## 二、打擊金融寡頭

葉爾辛所推動的「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快速的將俄國從缺乏效率的中央計劃經濟帶往市場經濟制度。現在約有百分之七十的經濟活動是由私人公司所推動，國家對於大部份的商品價格已不再出手干預。對外貿易占國民 GDP 比例從 1990 年的 17% 上升至 2004 年的 48%。<sup>117</sup>歐盟於 2002 年更是正式承認俄國經濟體制屬於市場機制，俄羅斯成功的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成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成功融入世界貿易體系。

然而，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激烈震盪後所付出的代價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1991 年俄國人民最高收入與高低收入之間差距不到 4.5 倍，至 1995 年快速增加到 14 倍。<sup>118</sup>大部分的國家資源都在激進的經濟轉型之下被暱稱為「新俄羅斯人」的金融工業集團所竊取。這些原屬於黨、政、軍、共青團系統的官員與國營企業的負責人，在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中，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權力與人際網絡，將原來的國有資產轉為私人所有，從而成為「金融寡頭」(Oligarchy)。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調查，90 年代的俄羅斯有三分之一的工業、16% 的就業機會以及 17% 的銀行總資產掌握在這些寡頭手裡。<sup>119</sup>在鼎盛時期，寡頭控制了俄羅斯的石油、電力、冶金和金融業等經濟命脈，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呼風喚雨，影響政府的決策。

貧富差距的問題大大的撼動了俄國的傳統價值，就是傳統「村社」所追求的平等(Equal)精神，即「不患寡患不均」，削弱俄羅斯政府的合法性，普羅大眾對於葉爾辛時期寡頭把持政府的現象感到失望。Thomas F. Remington 就指出貧富不均的現象是俄羅斯民主無法鞏固的重要原因，因為這個問題是伴隨著民主制的引進以及金融寡頭的出現，

<sup>117</sup> Peter Rutland, "The Oligarch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ephen K. Wegren & Dale R. Herspring Book. eds., *After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160.

<sup>118</sup> 范建中，*當代俄羅斯：政治發展過程與對外戰略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頁 193。

<sup>119</sup> 轉引自鄭羽，*普京時代：2000~2008*，前引書，頁 43。

產生了所謂的「寡頭民主」(Oligarchic Democracy)，人民對於民主焉能會有好感。<sup>120</sup>因此，普丁上台後，主張政企分流，強調政權應該與金融寡頭保持距離，企圖杜絕寡頭干政的機會。普丁在 2000 年的國情咨文就揭示了：**權力真空導致私人公司和機構攫取國家職能。他們控制著自己的影子集團、勢力集團以及透過非法手段獲取訊息的非法安全機構。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國家職能與國家機構之所以有別於商業機構，是因為國家職能與國家權力機構，不能被收買或出賣，不能私有化或轉型。**<sup>121</sup>

俄羅斯的大資本家以「橋媒體集團公司」(Most)的總裁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i)、「尤科斯」(Yokos)的總裁霍多爾柯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以及傳媒大亨別列佐夫斯基為首所組成的七人小組，在 1996 年協助民調低迷幾乎無望當選的葉爾辛打敗共產黨的朱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從此他們所構成的「影子集團」，在俄羅斯政壇呼風喚雨，堪稱金權政治的最佳代表。<sup>122</sup>普丁在上台後，曾經召集二十多位具有影響力的寡頭，警告他們儘管做生意，但不可以再干政，既往可以不咎，但絕對不可再犯，此即所謂的「君子協定」。不過這些寡頭們依然故我，不肯放棄既得利益，企圖延續他們的政治影響力。

古辛斯基成為第一個被整頓的對象，2000 年 5 月旗下的「橋集團」遭到強制搜查，俄國總檢察院指控他侵吞國家資產而逮捕他，之後古辛斯基潛逃至國外，俄羅斯向國際刑警組織請求發布國際通緝。<sup>123</sup>別列佐夫斯基則是因不斷自誇輔佐普丁上位，他在與普丁決裂後，公開鼓吹反普丁言論，除了前述的導致電視台被迫關閉外，他還被俄國檢察

<sup>120</sup> Thomas F. Remington,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Regions,” for *Conference on New Fronti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New Economic School* (2008), p.30.

<sup>121</sup> 「克林姆林宮」網站，「2000 年國情咨文」，<[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0/07/08/0000\\_type70029type82912\\_70658.shtml](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0/07/08/0000_type70029type82912_70658.shtml)>，檢視日期：2011/01/28。

<sup>122</sup> Peter Rutland, “The Oligarch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p. cit.*, pp.162-164.

<sup>123</sup> 鄭羽，*普京時代：2000~2008*，前引書，頁 51。

院指控洗錢與詐騙等經濟犯罪被通緝，只好一直流亡海外。<sup>124</sup>普丁整肅寡頭最激烈的一幕當屬霍多爾柯夫斯基案，當時霍多爾柯夫斯基案名列俄國首富，他在私有化過程中利用制度的不健全快速的累積財富，同時贊助俄共、右派力量、雅博洛克等反對黨，企圖擴大政治發言權。最致命的是他企圖將旗下企業國際化引進外資，擴大自己的財富，此舉無疑挑戰克里姆林宮的極限，為求樹立權威，普丁毫不猶豫的選擇出擊。2003年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指控詐欺、侵佔和逃稅罪遭到逮捕，2005年被判處九年徒刑，「尤科斯」被法院宣佈破產，旗下產業必需進行清算，<sup>125</sup>霍多爾科夫斯基二十年來所累積的資產猶如南柯一夢，重新被政權奪回。

普丁打擊寡頭干政的現象，雖然符合俄國人的深刻期待：不允許一個特權階級的存在。但是他操弄司法作為整肅異己的手段並不可取，任何的民主政府若想運作得宜，「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精神絕對不能缺少。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在《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當中就特別強調：若司法權未能獨立於立法權及行政權之外，人民並無法獲得自由。因為司法權若與立法權結合，則司法官同時就是立法者，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將被武斷的法律所蹂躪。司法權若是與行政權結合，則司法官同時就是行政官，更容易利用暴力壓迫人民，要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兼握三種權力，不論握有此權利的人出身於貴族或平民，自由都將蕩然無存。但衡諸實際，今日的立法權與行政權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特別在政黨政治發達的國家，立法權與行政權經常融為而一。在俄羅斯情況更為特殊，行政權可說是已經支配了立法權，就必須更加仰賴獨立的司法機關給予人民人權的保障。寡頭們用非法的手段佔據了國家資源，普丁則用司法完成了他的政治目標，不論兩者孰勝孰敗，說穿了都是對司法與法治精神的不夠尊重，也突顯出俄羅斯政治菁英獨特的行事風格。

<sup>124</sup> 鄭羽，*普京時代：2000~2008*，前引書，頁52。

<sup>125</sup> Marshall I. Goldman, “The Yukos Affai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5 (2004), p.322.

### 三、公眾院

蘇聯末期在戈巴契夫的開放下，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展現出無比的活力，誕生了許多新興的社會團體。許多西方較為樂觀的觀察家甚至認為那些社團已經驅散了俄羅斯公民順從的政治性格，公民社會即將進入盛開的階段。然而，我們回頭看 90 年代的俄羅斯，可以發現公民社會依舊是欲振乏力，非政府組織(NGOs)與社會團體在政治與社會領域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脆弱的公民社會有諸多的成因：第一，人民參與社團的意願降低，在歷經了轉型期間的激烈震盪後，俄羅斯的貧窮人口很明顯的增多，<sup>126</sup>俄羅斯的公民每天忙於為生活奮鬥，根本無暇顧及社會生活，更遑論參加社團。<sup>127</sup>第二，蘇聯末期活絡的公民社會，已伴隨著蘇聯的瓦解而消失，政治菁英竭力於將公民社會「去動員化」，葉爾辛為順利推動改革，免於社會壓力，公民社會就必須去動員化。<sup>128</sup>1991 年至 1993 年葉爾辛延遲了奠基性大選的舉行，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連性變的薄弱。等到 1993 年第一屆「國家杜馬」(State Duma)大選過後，公民社會似乎已對政治領域起不了作用。<sup>129</sup>第三，在「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影響之下，國家與社會關係長久以來，社會發展一直被視為是次要的，社會應全力配合國家追求政治利益。這種國家蓬勃發展、社會發展萎縮的國家-社會體系，Yuri Pivovarov 與 Andrey I. Firsov 將之稱為「權力中心單極化體系」(Monocentric System of Power)。<sup>130</sup>因此在普丁管理式民主之下，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發展走向一直是學者所關心的議題。

<sup>126</sup> 根據學者 Cook 的計算，俄羅斯貧窮人口從 1991 年的 11.7%一路上升至 2000 年的 29%。請參見：Linda J. Cook,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Reform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4.

<sup>127</sup> Alfred B. Evans, Jr., “Vladimir Putin’s Design for Civil Society,” in Alfred B. Evans, Jr., Laura A. Henry & Lisa McIntosh Sundstrom. eds., *Russian Civil Socie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New York: M.E.Sharpe, 2006), p.147.

<sup>128</sup> Michael McFaul & Elina Treyger, “Civil Society,” in Michael McFaul, Nikolai Petrov & Andrei Ryabov. eds.,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149.

<sup>129</sup> Michael McFaul, 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巴契夫到普京的政治變遷，前引書，頁 345。

<sup>130</sup> 轉引自 Richard Sakwa, “Partial Adaption and Plitical Culture,”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p.47-48.

普丁出任總統後除了一面整頓政治反對力量之外，同時亦進一步形塑俄羅斯公民社會。2001 年宣佈召開「公民論壇」(Civil Forum)，企圖將俄羅斯境內的社會團體整合成一個具有官方諮詢身分的半官方團體。2004 年「貝斯蘭事件」(Beslan Terrorist Attack) 過後不久，普丁發佈三項強化聯邦中央政府權力的政策，其中一項即是創設「公眾院」(Public Chamber)，由 126 名社會賢達來代表俄國的公民社會。根據普丁的說法，「公眾院」能夠創造一個政府與民間廣泛對話的平台，並能使政府的重要決策經過民意的審查，普丁特別強調這代表民間力量能夠控制國家體制。<sup>131</sup>「公眾院」的 126 名成員，分成三個階段選出，第一階段由總統任命 42 名成員，第二階段由已任命的 42 名成員就全國性社團中投票選出另 42 名成員，第三階段再由先前選出的 84 名成員再從七大聯邦區的地方型社團挑選出 42 名成員。<sup>132</sup>這 126 名成員由各領域極具聲望或有專業影響力的人士擔任，而且必須超黨派，不得參與任何政黨活動。

表面上「公眾院」是一個代表公民權利，為民喉舌，監督政府的民間機構，但實際上卻淪為被政府綁架、為克里姆林宮服務的傀儡組織，重傷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對於克里姆林宮來說，「公眾院」設立的意義在於：(一) 滿足民間意見領袖對利益的追求，但同時也可以利用它們監視地方官僚與企業家的忠誠度。(二) 可以當作政府在官僚體制外社會服務的補助機構，以及作為政府宣導政令的平台。(三) 可以繞過國家杜馬繁複的立法審查過程，具有代表民意背書的功能。(四) 「公眾院」形成一個模範作用，它標示著公民團體若想要參與政治，就必須規規矩矩的。<sup>133</sup>也就是必須獲得克里姆林宮的認可，與國家的利益一致，加入「公眾院」。任何反對政府的公民團體都將被視為是「激進者」，以及是不愛國的表現。這種對於獨立公民團體的排擠效應，甚至影響到立法行動。國家

<sup>131</sup> 「克林姆林宮」網站，”Speech at the Enlarged Government Meeting wih the Government and Heads of the Regions,” <[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4/09/13/0000\\_type82912type82913\\_7667.shtml](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4/09/13/0000_type82912type82913_7667.shtml)>，檢視日期：2011/02/01。

<sup>132</sup> Alfred B. Evans, Jr., “Vladimir Putin’s Design for Civil Society,” *op. cit.*, p.151.

<sup>133</sup> James Richter, “Putin and the Public Chamber,”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5, No. 1, (2009) pp.41-43.

杜馬在 2002 年所通過的「極端主義法」(Russian Extremism Law)，以及該法在 2006 年的修正案，大幅的擴張了聯邦政府在面對所謂「罪犯」或「暴力威脅」時的權限，任何對於聯邦政府採取「必要行動」的錯誤指控都必須受到制裁。<sup>134</sup>

Richard Sakwa 在《部分適應與政治文化》(Partial Adaption and Plitical Culture)專文中指出普丁意識到今日的俄羅斯不可能再採取過去蘇聯時代落伍的作法，同時也必須要能融入全球化並處理西方的輿論壓力，他探討普丁的治國策略，實際上就是不斷的找尋民主與傳統之間的平衡點。<sup>135</sup> Peter Rutland 也強調，普丁需要公民社會的幫助，來協助國家進行現代化等政治目標，不可能像蘇聯一樣完全毀滅社會領域。<sup>136</sup> 從這個觀點來看，「公眾院」或許可以當作是某種適應俄國國情的折衷辦法。但是它的成員遴選方式如此封閉，而且毫無究責(accountability)的能力，嚴格來說只能算是一個錦上添花的裝飾單位，營造俄羅斯政府重視公民社會的形象。俄羅斯公民社會走向畸形發展令許多西方觀察家大感失望。Gordon Hahn 在「歐洲自由電台」(Radio Free Europe)所做的一系列評論，就強調普丁的一連串措施旨在追求俄羅斯政治領域中的獨霸地位，而非單純的權力集中，他更抨擊普丁政權的管理式民主根本就是「偷偷摸摸的威權主義」(Stealth Authoritarianism)。<sup>137</sup>

<sup>134</sup> Article 19, "Russian Extremism law," <<http://www.article19.org/pdfs/press/russia-extremism-law.pdf>>. 檢視日期：2011/01/18。

<sup>135</sup> Richard Sakwa, "Partial Adaption and Plitical Culture," *op. cit.*, pp.43-63.

<sup>136</sup> Peter Rutland, "Is Putin Out to Destroy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1, Issue. 21, (May 31, 2004).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26588&tx\\_ttnews%5BbackPid%5D=175&no\\_cache=1](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26588&tx_ttnews%5BbackPid%5D=175&no_cache=1)>. 檢視日期：2011/01/29。

<sup>137</sup> Gordon Hahn, "Putin's Stealth Authoritarianism," *Radio Free Europe*,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344299.html>> (April 15, 22 & 29, 2004). 檢視日期：2011/01/22。

## 第二節 中央集權

「分權」(Separation of Power)概念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有兩種權力分配的方式，一是水平式的「三權分立」，一是垂直式的「地方分權」(Decentralisation)。地方分權對於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有幾個理由：(1) 在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度方面，地方政府會比中央政府有效率多了，因為公民對於自身居住環境的事務參與會較感興趣，更有機會培養良好的民主政治公民。(2) 地方政府在回應公民偏好方面較為貼近人民，對於公民的需求也更為敏感。這有助於加強政府的民主責任性，以確保政府能回應社會的重要利益，進而提升政府統治的正當性。(3) 權力集中易使在位者腐化，以暴虐手段威脅個人自由。地方分權透過分散中央政府的權力來保護個人自由。<sup>138</sup>

前蘇聯與俄羅斯雖然名義上是聯邦國家，不過長期的一黨專政，地方事務皆由共黨所把持，地方自治精神從未落實，聯邦制度的建構也並不完整。<sup>139</sup>蘇聯瓦解前夕，波羅的海三國率先通過國家主權宣言，其餘加盟共和國處於觀望態勢，葉爾辛為了與戈巴契夫爭權，向地方勢力示好，也宣佈通過主權宣言。在蘇維埃加盟主義共和國中他喊出了「你能拿多少主權就拿多少」(take as much sovereignty as you can swallow)的口號，<sup>140</sup>更燃起了俄羅斯聯邦境內主體獨立的欲望。制度上的缺憾加上領導人之間鬥爭所留下的後遺症是俄羅斯獨立初期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的一項頭痛難題。「聯邦主義」未能在俄羅斯落實，反倒是「分離主義」方興未艾。聯邦政府為安撫地方獨立情緒，同意給予更大的權利與更多的聯邦補助款。1998年金融風暴之後，各聯邦主體竭力於確保本身的經濟安全，遂有向中央抗稅，組成聯盟向中央爭取補貼與優惠待遇，甚至是區域間關稅壁壘的

<sup>138</sup> Andrew Heywood, *op. cit.*, pp.213-214.

<sup>139</sup> Darrell Slider, "Politics in the Regions,"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69.

<sup>140</sup> Gordon Hahn, "Reforming the Federation,"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52.

情事發生。各種國家弱化的徵兆出現，在聯邦中小王國林立，俄羅斯如同「專制王國的聯邦」(Federation of Tyrannies)。<sup>141</sup>在1995至96年間44000件地方法案中有超過半數違反聯邦憲法以及聯邦法律，葉爾辛留給普丁的聯邦制度中，憲法聯邦主義已經被契約聯邦主義(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維繫是以談判的方式維繫)所取代。<sup>142</sup>這種國家趨向分離的狀態，促使普丁在上任之後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革聯邦制度。

## 一、聯邦區的設立

2000年普丁將國家劃分成七個「聯邦區」(Super-Districts)，每個聯邦區下轄十數個聯邦主體，由「總統全權代表」(Plenipotentiary)作為領導。這七位欽差大臣位高權重，除了是「國安會」(Russian Security Council)成員外，還可以參加聯邦政府會議。他們的主要任務包括：(一) 監視聯邦主體是否服從聯邦憲法、法律以及總統命令。(二) 管理聯邦政府在地方分支的官僚挑選與流動。(三) 保護聯邦在地方的國家安全利益。(四) 建立與協調跨聯邦區的經濟計畫。(五) 兼管與控制能迫使地方領袖讓步的消息之管道(Kompromat, Blackmail)。

## 二、聯邦院傀儡化

「聯邦院」(Council of Federation)在93憲法之前原本只是地區領導人所組成的協商諮詢機構，但在十月事件之後聯邦院成為常設的上議院，代表聯邦主體的利益，是地區政權在聯邦的代表、國家權力結構的重要穩定組織。理論上「聯邦院」象徵在聯邦制度之下，各聯邦主體之間以及地區與中央之間的對等關係，總統不能夠解散「聯邦院」。「聯

<sup>141</sup> Nikolai Petrov, "From Managed Democracy to Sovereign Democracy-Putin's Regime Evolution in 2005," PONARS, Policy Memo, No. 396 (2005), p.183.

<sup>142</sup> Cameron Ross, "Refroming the Federation,"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161.

邦院」的組成，係由89個聯邦主體，每一個各派兩個代表，聯邦主體的行政長官與議會議長成為自動成為聯邦院議員。<sup>143</sup>2000年普丁總統批准了一項法案「聯邦院組成程序法」(On Procedure of Forming of the Council of Federation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修改了「聯邦院」的組成規則。<sup>144</sup>該法剝奪了地方行政首長與議會議長兼任「聯邦院」成員的當然權利，規定自2002年起「聯邦院」一名議員由地方首長提名，其立法機關三分之二同意，另一名由地方議長提名，如果聯邦主體實行兩院制，則由兩院議長輪流提名或三分之一以上議員連署成為候選人。修法之後聯邦主體在推舉「聯邦院」議員時，傾向於邀請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企業家或政客出任，而非從本地人士挑選。<sup>145</sup>從2005年開始，普丁甚至可以直接介入「聯邦院」議員的遴選過程，更加衝擊「聯邦院」的獨立性。改革之後所呈現出的是一個順從的上議院，其成員大多來自俄國兩大城市，代表的是中央的利益並不是地方，如此發展軌跡同時也削弱了聯邦主義的重要原則：聯邦主體在聯邦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直接代表性。另一方面，普丁運用政黨體系的弱點所操作成立的「權力黨」(Party of Power)，也在「聯邦院」中應運而生。表面上「正義俄羅斯黨」(Fair Russia)將與杜馬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形成兩黨政治彼此制衡，不過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兩者會共享政治資源，作為普丁控制國會兩院的媒介。

### 三、其它傀儡機構

「聯邦院組成程序法」的副產品是普丁決定成立兩個諮詢機構：「國家參議院」(State Council)、「立法者會議」(Council of Legislators)。這兩個機構表面上是地方首長與議會被剝奪參與聯邦事務的權利之補償，實際上是普丁建立垂直管理地方政治人物的工具性

<sup>143</sup> 俄羅斯聯邦歷經多次聯邦主體劃分，根據俄羅斯憲法第 65 條規定，目前俄羅斯聯邦主體為 83 個，所以聯邦院的成員人數略有調整。

<sup>144</sup> 「聯邦院」網站，「聯邦院的歷史沿革」，<<http://www.council.gov.ru/eng/about/history/index.html>>，檢視日期：2011/02/10。

<sup>145</sup> Cameron Ross, “Refroming the Federation,” *op. cit.*, p.162.

機構，由克里姆林宮直轄。<sup>146</sup>「國家參議院」由總統擔任主席，七位聯邦區全權代表組成主席團，成員包含所有的地方首長，每三個月集會一次，主席團則每個月一次向總統報告地方近況。「立法者會議」的性質類似於論壇，因為地方議會有立法提案權，此機構能提供地方議員們彼此交流與統整建議的空間，協調地方法律能夠與聯邦法律達成一致。「國家參議院」與「立法者會議」實際上毫無任何法律制定以及決策權，除了發表意見以外什麼都不能做，最多只能算是地方政治菁英向總統進言與紓發下層壓力的管道。

#### 四、官派地方首長

2004年12月國家杜馬通過「俄羅斯聯邦主體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組成原則修改法案」(On Amending the Federal Law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Organisation of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普丁在此之前已經取得了有條件地辭任地方民選首長以及解散民選議會的權力，此修正案更是極大化總統對地方人事調整的職權。雖然地方首長並不是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過若是地方議會兩次否決總統的提名，總統可直接解散地方議會，並指派代理人管理地方政府至地方議會重新選舉出來，行政首長的產生方式已經與官派並無二異。<sup>147</sup>取消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所產生的結果是：地方首長宛如一個小獨裁者，因為他們已經不必經由民主程序向人民負責，而是向總統負責。普丁對於服從者的報酬是繼續留任，執政超過十年的地方首長大有人在。<sup>148</sup>

雖然普丁在2007年的國情咨文中宣稱：目前的俄羅斯在國家分權的層度上，是任何

<sup>146</sup> 「克里姆林宮」網站，”Institutions”, <<http://archive.kremlin.ru/eng/articles/council.shtml>>，檢視日期：2011/02/12。

<sup>147</sup> Cameron Ross, “Refroming the Federation,” *op. cit.*, p.163.

<sup>148</sup> Darrell Slider, “Politics in the Regions,” *op. cit.*, pp.175-176.

一個歷史階段都沒達到的高標準。<sup>149</sup>不過種種的跡象顯示普丁事實上追求的是中央權力的極大化。前國家杜馬議員里則科夫(Vladimir Ryzhkov)即說明了普丁針對地方所制定的聯邦法律明顯地違反了三項憲法原則：第一，違反民主原則，剝奪公民選擇自己居住地行政首長的權利；第二，違反聯邦原則，由上往下的任命方式建構中央與地方的主從關係，根本與聯邦主義沒有相關。第三，違反國家法治原則，自從總統提議要我們大家都應忽略憲法、法律以及憲法法院所做的決策。普丁的改革是將蘇聯時代的階層原則重新制度化，把所有的權力集中於莫斯科，俄羅斯好比是「帶著聯邦制假面具的單一制國家」。<sup>150</sup>



<sup>149</sup> 「克里姆林宮」網站，「2007 年國情咨文」，<[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7/04/26/1209\\_type70029type82912\\_125670.shtml](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7/04/26/1209_type70029type82912_125670.shtml)>，檢視日期：2011/02/13。

<sup>150</sup> Cameron Ross, "Refroming the Federation," *op. cit.*, p.170.

### 第三節 行政權獨大

在民主國家中，行政與立法關係原本就是一個需要謹慎處理的議題，尤其在總統制國家(Presidential Government)，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因政策看法或主掌的政黨不同而陷入僵局(Dead Lock)的情況並不少見。Juan J. Linz 在專書《總統制或內閣制民主：兩者有何差別？》(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中表示，總統與國會同具民選的合法性，彼此共享權力又分立制衡，很容易造成雙重合法性危機。再者，總統全民選出，易造成輕視國會、政黨的現象，將自己視為全民利益的唯一代言人，可能導致民粹式領袖甚至淪為獨裁政治的危險。<sup>151</sup>

俄羅斯獨立初期，它也面臨了上述的僵局，以葉爾辛為首的行政部門與共產黨為主的民選國會彼此爭執不休，最終釀成了讓民主蒙羞的「十月事件」。葉爾辛所遺留給普丁的政治體制雖然是類似於法國「半總統制」(Semi- Presidentialism)，但事實上只是徒具虛名，制度設計可以說是一面倒向總統，猶如 John Willerton 所謂的「霸權式總統制」(Hegemonic Presidentialism)，總統擁有極大的權力。<sup>152</sup>另一方面，國會缺乏制度上的有效武器可以牽制總統，脆弱的政黨體系，使得國會一直無法形成一個穩定多數，各政黨各做各的又泡沫化快速，使普丁有機會將政治勢力伸進國會，培養對其效忠的「權力黨」，從體制內外全面支配國會。俄羅斯的國會政治之發展如此歧嶇，可說是先天設計不良、後天又失調的結果。

<sup>151</sup> Juan J.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Juan J. Linz &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6-19.

<sup>152</sup> John Willerton, “Putin and the Hegemonic Presidency,”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3-25.

## 一、超級總統制

1993 年制定的「俄羅斯聯邦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所規定的政治架構雖屬三權分立，但檢視聯邦憲法，可以發現憲法賦予總統許多的主動權與防護機制，俄羅斯總統實質為權力架構中的核心職位。

### (一) 總統的地位

根據聯邦憲法第八十條規定：俄羅斯總統是俄羅斯憲法、公民權利與自由之保證人，按照俄羅斯連邦憲法規定之程序，它採取措施維持俄羅斯聯邦之主權、獨立與國家完整，確保國家國家權力機關之協同功能與相互關係。… 俄羅斯聯邦總統依照俄羅斯連邦憲法與聯邦法律決定國家內部與對外政策之基本方針。<sup>153</sup>此條文語意模糊，可以闡釋的空間甚大，端視總統的個人性格如何。換句話說，總統可從三權分立的框架中分離出來，成為國家的「仲裁者」，當憲法、人民權益受到侵害之時，可以根據他的個人判斷，採取「必要措施」。

### (二) 總統的人事任免權

根據聯邦憲法第八十三條規定，總統在人事方面的權限包括：1、經國家杜馬同意，任命俄羅斯聯邦政府的主席。2、依俄羅斯聯邦政府主席之建議，任命或免除聯邦政府之副主席與部長。3、採取關於俄羅斯聯邦政府辭職之決定。4、向聯邦院提出任命聯邦憲法法院法官、聯邦最高仲裁法院法官以及聯邦總檢察長之建議。5、組成直屬於總統的行政機關。6、組成並領導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sup>154</sup>關於總統人事權的重要意義在於，總統可以自由任免總理(政府主席)。憲法一百一十一條雖然規定，國家杜馬對於總統所提交之總理人選有同意權，但是也對國會此項權限作出限制，即杜

<sup>153</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俄羅斯聯邦總統」，第八十條。

<sup>154</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俄羅斯聯邦總統」，第八十三條。

馬三次否決總理候選人後，總統有權解散國會。<sup>155</sup>此項規定無疑切斷了總理與國會的關連，國會在否定總統所提之總理人選的同時也必須承擔被解散的政治風險，國會議員必須考量自己的政治生命。另一方面，總理的辭任也完全屬於總統的權力，國會無權置喙。總統可依自己的喜好或黨派利益自由的任免總理，而不需考慮國會政治生態，總理在缺乏國會多數奧援之下，其地位猶如總統的「幕僚長」。

### (三) 總統的國會解散權

總統藉由自由任免聯邦政府，將行政權置於其支配之下。國會若對總統所領導的行政部門不滿，只有透過倒閣。憲法一百一十七條規定，國家杜馬可以對聯邦政府表示不信任，或由總理向國家杜瑪提出信任案，國會若以簡單多數表示對聯邦政府的不信任，聯邦政府必須總辭。但法條中也同時規定，國會行使倒閣權後，三個月內不得再提不信任案，否則總統可以依法解散國會。國會在事前同意與事後罷免兩部份，都會遭到總統的解散國會權所牽制，如此但書使國會的倒閣權如同虛設。

### (四) 總統的立法權

在總統制國家，在立法方面本來行政部門就佔有較強勢地位。根據 Herman Valentine 的研究，由總統及行政部門創議擬定的「政府法案」(Administration Bills)，委由同黨議員代為提出，並在總統強制推動下通過者，比例甚高。<sup>156</sup>俄羅斯總統的權力猶勝美國總統，根據憲法八十四條所賦予的權力，俄羅斯總統可向國家杜馬提出法律草案，等於說總統可以直接介入立法行動。即使遇到反對黨杯葛政府法案，俄羅斯總統可另外根據憲法九十條規定，總統有權頒布命令與指令，其所頒布之命令與指令，只要在不違反聯邦憲法與法律的情況下，在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必須執行，並不

<sup>155</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六章「俄羅斯聯邦政府」，第一百一十一條。

<sup>156</sup> Herman Valentine, "What Government Say and What Government Do: An Analysis of Postwar Queen's Speech,"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28 (1975), p.29.

需經過立法審查，而仍具備法律效力。<sup>157</sup>另一方面，假使國會透過立法行動限制總統命令的效力，總統針對他不喜歡的法律，可以根據憲法一百零七條所賦予的否決權，推翻國會的立法。此一否決權一經運用，立法部門必須由國家杜馬成員與聯邦院代表總人數至少三分之二同意，才能使總統簽署公布原法案。<sup>158</sup>此外根據憲法八十四條規定，總統有提交公民投票權，遇有爭議法案時，總統可將法案交由公民複決，而且可以無限次使用，其法律效力等同憲法。<sup>159</sup>

### (五) 罷免總統方面

俄羅斯在罷免總統方面的憲政設計，程序繁複，且有諸多限制，實際執行困難重重。憲法九十三條規定：聯邦院僅可依據國家杜馬對總統犯下的叛國罪與重大犯罪之指控，且經過聯邦最高法院確定犯行，以及聯邦憲法法院確定該指控符合程序，方可做出罷免總統之決議。而且罷免總統必須經由國家杜馬至少三分之一成員提出動議，該動議必須經由兩院總代表人數至少三分之二同意始能決議。罷免總統之決議必須在國家杜馬對總統提出指控的三個月內通過，否則視同否決。<sup>160</sup>

Stephen Holmes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權力的過分擴大，而提出了「超級總統制」(Super-Presidentialism)，定義為總統擁有否決權、解散議會權、立法提案權、漠視國會、不與國會妥協之性質。因總統命令可取代立法權之故，造成立法與行政權混淆。<sup>161</sup>不過以上都還只是憲法所賦予總統的正式權力，總統大權的行使主要是看在位者，行使權力時有其無可置疑的彈性空間，完全要看總統個人權力意志的大小與技巧而定。

<sup>157</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俄羅斯聯邦總統」，第九十條。

<sup>158</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五章「俄羅斯聯邦議會」，第一百零七條。

<sup>159</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俄羅斯聯邦總統」，第八十四條。

<sup>160</sup>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俄羅斯聯邦總統」，第九十三條。

<sup>161</sup> Stephen Holmes, "Superpresidentialism and Its Problem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Vol. 2-3 (Fall 1993/Winter 1994), pp.123-126.

## 二、浮動的杜馬

造成俄羅斯國會權能不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俄羅斯脆弱的政黨體系。檢視俄羅斯的政黨運作會發現與西方政黨政治相去甚遠，西方政黨所追求與賴以維生的功能：政治甄補、提供政府治理選項、連結公民與政治過程、匯集社會利益等各方面，在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中幾乎不存在。Richard Rose稱如此的政黨體系為「浮動的政黨體系」(Floating Party System)，亦即政黨沒有根植於政治以及社會生活之中。<sup>162</sup>

回顧俄羅斯的政黨發展，起源較晚，一直到帝俄末期才出現兩個具有影響力的政黨：自由派「立憲民主黨」(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Kadets)、共產黨前身「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不過此時期的政黨組織較為單純，組織成員多半圍繞著個別政治領導人，個人與此一組織關係比較不具明文化。換言之，政黨是以知識份子或菁英為主幹，一般大眾與政黨的關連性薄弱，屬於「菁英黨」(Cadre Party)，這時政黨也不是以服務民眾為膺，目的是為奪取政權。進入蘇聯時代，雖然共產黨明確的主導了政治生活，但因為蘇維埃體制奉行「黨國一體」(Party-State System)，共產黨與國家之間界限模糊，政黨的運作不似西方，功能也並不突顯。

1990年共產黨宣誓放棄在政治領域的壟斷地位後，俄羅斯的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但這些政黨大多缺乏社會基礎，有政黨領袖卻無黨員，因此政黨沒有集結社會利益的功能，常提不出明確的政策方案，甚至只是為了選舉才登記成為政黨。這些幹部黨在政治光譜(Party Spectrum)上，所主張的訴求截然不同，左翼是自由、主張民主意識型態的團體，右翼是保守的社會主義及民族主義政黨。在1993年至2003年歷次國家杜馬大選中，總共有八十個政黨或派系至少參加過一次選舉，但只有三個政黨全程參與四次大

<sup>162</sup> Richard Rose, "How Floating Parties Frustrate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 Supply-Side View of Russia's Elections," in Archie Brown. eds.,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1-222.

選：共產黨、「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雅博洛克」(Yabloko)；其中只有共產黨與自由民主黨能在四次大選中皆能獲得政黨名單席次(Party-List Seats)；而能夠在單一選區(Single-Mumber)方面表現如同在政黨名單，就只有共產黨(見表3-1與3-3)。<sup>163</sup>

如此破碎的政黨體系，對國會運作造成三個不良的影響：第一，政黨的擴散使政治生態一片混亂，一般公民很難瞭解政黨的政治立場與主張。政黨數目太多，各政黨為爭取選票，使競爭方向往極翼地帶移動，因為唯有如此才有機會增加政黨的知名度，從而增加當選的機會。這個現象可以說明為何1995年，極端政黨可以獲得勝利。然而，政黨發展趨向極翼，連帶的影響了國會權能運作。歷次的大選皆沒能使國會出現一個過半數的反對黨，甚至因為政黨的極端傾向，國會連一個穩定的多數聯盟都不存在。葉爾辛時期的府會關係雖然糟糕，但國會最多只能說是對葉爾辛個人的杯葛，談不上制衡行政部門。

第二，政黨擴散，票源自然分散，造成廢票太多。以1995年的選舉為例，在比例代表制部份未超過5%政黨門檻的政黨或派系所獲得的選票比例高達45.8%，但它們卻連一個席次都沒獲得。在此如此高廢票比例下所組成的國會，其民意代表性自然備受質疑，民眾普遍認為政黨代表部分特定利益，而非全民利益，國會也不足以信任。換言之，破碎的政黨制為俄國帶來的是一個合法性不足的國會(見表3-2)。

最後，缺乏社會基礎的政黨，只能倚靠少數的政治名星出面號召，例如，自由民主黨就被稱呼為季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黨。政黨政治幾乎完全變成只限於中央地區的一種遊戲。政黨不只無法有效的深入地方，也無法為地區性政治人物提供一個循序漸進的甄補過程。相反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能侷限於出身地區，而政黨也因而失

<sup>163</sup> Stephen White, “The Political Party,”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9.

去拓展其基層群眾基礎的機會。<sup>164</sup>在缺乏社會支持的情況下，這種強調個別領導人對政黨或派系的組成之重要性，會使得政黨內部隨著效忠對象或利益考量而分裂，造成政黨制度離解，進一步弱化國會。以1995年選舉結束至新國會開議期間為例，一共有一百名議員改變他們所屬的政黨，組成兩個根本是新的政團，而造成一個「浮動的杜馬」(Floting Duma)。<sup>165</sup>政黨居於弱勢地位，使國會缺乏一個整合性政黨，做為立法部門的重要支柱。當破碎的政黨及議員們，都極需仰賴國家行政資源才能生存並做為第一要務時，普丁便將政治勢力伸進國會(可見圖3-1)。



<sup>164</sup> Peter Ordeshook, "Russia's Party System: Is Russian Federalism Viable?" *Post-soviet Affairs*, Vol. 12, No. 3 (1996), p.202.

<sup>165</sup> Stephen White, Richard Rose & Lan McAllister, *How Russia Vote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97), pp.237-238.

表 3-1 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結果， 1993-1999

政黨名稱	比例代表制下的政黨得票率(%)			政黨名單所獲席次		單一選區		總席次	
	1993	1995	1999	1995	1999	1995	1999	1995	1999
俄羅斯共產黨(CPRF)	12.4	22.7	24.3	99	67	58	56	157	123
統一黨 (Unity)			23.3		64		8		72
全俄羅斯祖國(FAR)			13.3		37		30		67
右派力量聯合(SPS)			8.5		24		5		29
自由民主黨(LDP)	22.9	11.4	6.0	50	17	1	1	51	18
雅博洛克(Yabloko)	7.9	7.0	5.9	31	16	14	4	45	20
俄羅斯婦女(WR)	8.1	4.7	2.0	0	0	3	0	3	0
俄羅斯家園(NDR)		10.3	1.2	45	0	10	9	55	9
俄羅斯的選擇(RC)	15.5	3.9		0		9		9	
農民黨(AP)	8.0	3.8		0		20		20	
其他	20.9	33.4	12.2	0	0	32	10	32	10
獨立人士								78	101
反對所有候選人	4.3	2.8	3.3						
總共	100.0	100.0	100.0	225	225	147	123	450	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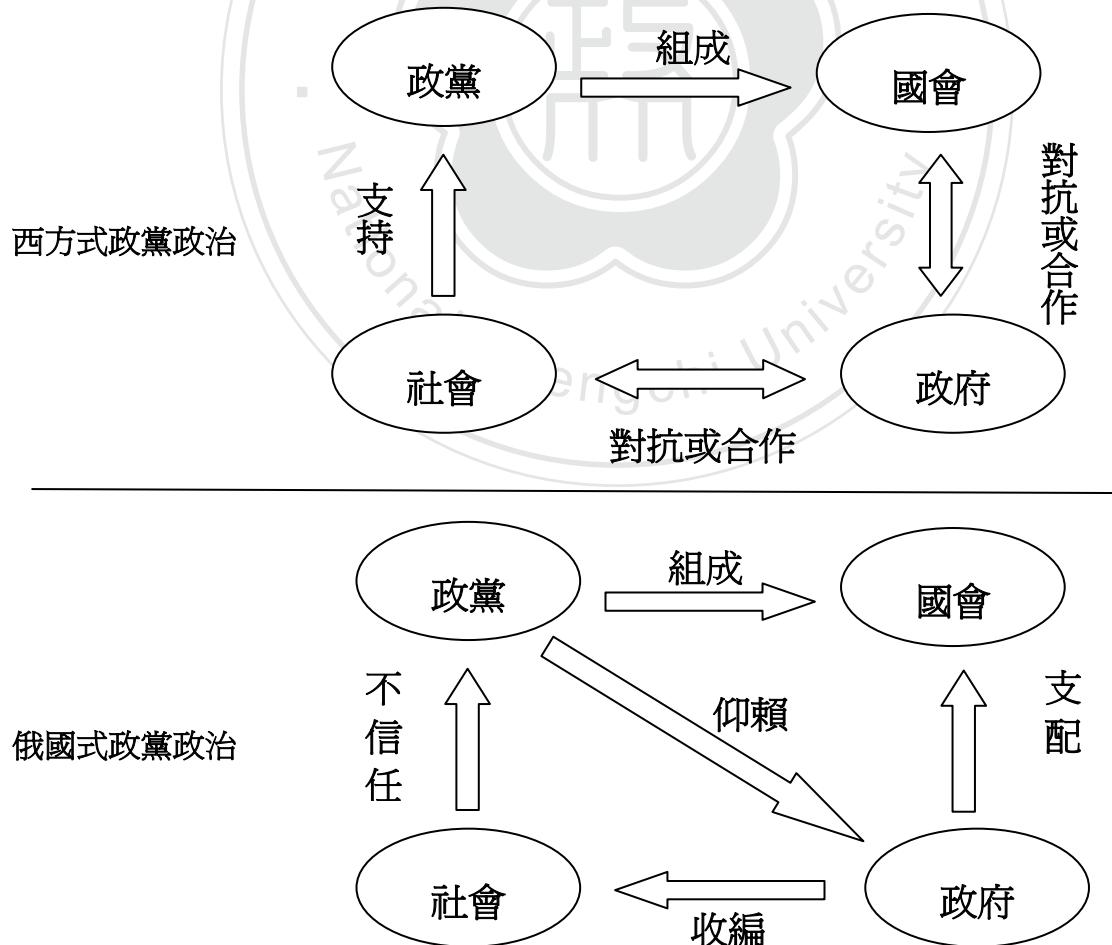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Matthew Wyman, “Elections and Votes,” in Stephen Whit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Du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8.

表 3-2 政黨與其他機構信任度之比較， 1997-2004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總統	13	2	2	45	54	61	59	62
行政部門	10	4	8	20	22	24	16	12
法院	10	4	8	20	22	24	16	12
國會	7	7	4	10	11	11	9	9
政黨	4	4	4	7	6	7	5	5

筆者自行繪製。參考 Stephen White, "The Political Party,"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0.

圖 3-1 西方與俄國的政黨政治之比較



### 三、權力黨

Scott P Mainwaring 在《重新思考第三波民主化下的政黨體系：巴西的例子》(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提出了若干檢視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指標：(1)選舉變動性。(2)政黨的社會根基程度。(3)政黨具正當性與否。(4)政黨組織完備與否。<sup>166</sup>政黨制度化高的國家，在歷次大選中政黨的得票率變動幅度不大，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的機率不高，顯示出政黨的穩定性與政黨競爭的規律性。選民對於政黨較有凝聚力，不易出現分裂投票的情況，威脅政黨生存。另一方面，選民對於競爭性政黨體系視為理所當然，政黨有正當性為不同傾向的選民發聲，將政黨基礎向社會扎根，鼓勵選民加入政黨，壯大政黨規模，進而完善其內部的組織章程與作業程序等等。反之，政黨體系制度化低的國家，國家與菁英有機會對政黨政治的發展進行重塑，對民主進程產生重大的影響。俄羅斯不穩定的政黨體系，因而造就了「權力黨」的出現。

執政者為了選舉、鞏固政權，急就章成立的權力黨在俄羅斯的「民主十年」中並不少見，諸如：「俄羅斯的選擇」、「俄羅斯家園黨」等。不過這些政黨缺乏社會基礎，也非代表社會利益，只算是政治變遷下的副產品。探討權力黨的實際運作不得不談「統一黨」(Unity)，它在普丁的指示下成立，目的是為了協助普丁問鼎2000年總統寶座，而非要贏得國會大選。「統一黨」在1999年大選的優異表現，確實使得其他競爭者紛紛打消競選總統的念頭，其中同受行政資源奧援的「全俄羅斯祖國」更在2001年與「統一黨」合併為「統一俄羅斯黨」。「統一俄羅斯黨」再與其它友黨進行整合，如「自由民主黨」、「人民代表」(People's Deputy)、「俄羅斯地區」(Russia's Regions)，在國會中已形成一個支持普丁政權的穩定多數。而且隨著普丁的民意支持度不斷向上，「統一俄羅斯黨」的

<sup>166</sup> Scott P.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39.

聲勢也跟著水漲船高，在2003年的大選中囊括了近三成八的政黨民單選票，與半數的兩百二十五席議員，儼然已具備執政黨的態勢(可見表3-3)。在2007年的杜馬大選中，「統一俄羅斯黨」的聲勢更為驚人，在純粹比例代表的選制中，一舉拿下六成四的選票與國會三分之二的三百一十五席。<sup>167</sup>

分析「統一俄羅斯黨」的模式之所以如此成功，最主要是因為其符合俄羅斯的政治文化與民眾期待。第一，從帝俄、蘇聯專制統治以來，俄國人對於政黨政治原本就陌生，進入民主體制很難適應這種「暢所欲言」的政治生活所帶來的混亂情況，俄國獨特的國情與臣屬政治文化的傳承，更加不利於由下而上、自發性的政治參與。<sup>168</sup>浮動的小黨得不到社會養份的灌溉，自然趨向解離，要不消失，要不向行政部門屈服，難以挑戰「統一俄羅斯黨」的國會主導地位。第二，政黨政治等於民主政治，俄國人對於民主失望之情，自然轉移成對政黨的不信任。但與之對比的「統一俄羅斯黨」挾著行政資源的優勢，例如普丁協助解決造成民怨的養老給付與薪資拖欠等問題，以及來自國營企業的豐沛選舉資金，並在媒體上大幅報導正面形象。<sup>169</sup>這些資源都是其他小黨所遠遠不能及的。第三，「統一俄羅斯黨」所塑造出的形象不同於其他政黨，例如在車臣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就是以恢復俄羅斯「偉大傳統」作為訴求，雖然沒有明確的政綱或意識形態，但是強力支持總統施政的特徵，以及圍繞普丁此中心點強調中央集權的思考邏輯，在黨旨上開宗明義表示是一個「為總統服務」的政黨，都大大的受到俄羅斯人民的支持。除此之外，其在俄羅斯聯邦中選會所註冊的政黨全名「全俄羅斯的政黨-統一俄羅斯」(All-Russian Political Party “United Russia”)，便是企圖打破過去俄國人對於政黨是代表特

<sup>167</sup> 有關2007年國家杜馬選舉結果，請參見：

「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ikrf.ru/eng/elect\\_duma/leg/index.jsp](http://www.cikrf.ru/eng/elect_duma/leg/index.jsp)>。

<sup>168</sup> 從黨員人數來看，俄羅斯政黨獲得社會支持的比例極低，請參見：

M. Steven Fish, “The Impact of the 1999-2000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Vicki L. Hesli & William M. Reisinger eds., *The 1999-2000 Elections in Russia: Their Impact and Leg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89-190.

<sup>169</sup> 林永芳，「俄羅斯政黨體系與民主化」，《俄羅斯學報》，第五期（2006），頁40。

定利益的刻版印象，以全國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sup>170</sup>第四，「統一俄羅斯黨」獲得國家在法律上的支持，普丁頒布了選舉制度以及政黨的法規。2001年通過的「政黨法」(On Political Party)規定了一系列的政黨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與禁止條款：只允許建立全國性範圍的政黨，不承認地區性政黨，政黨黨員至少必須有一萬名，政黨在五年內若沒有推舉自己的候選人或政黨名單，將取消其在中選會的註冊資格。<sup>171</sup>2002年底普丁簽署公佈「國家杜馬議員選舉法」(On the Election of Deputies of the State Duma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該法規定只有符合政黨法所定義之政黨才有資格參與杜馬大選，且將選制改回純粹比例代表制。<sup>172</sup>

政黨法與選舉法的制定確實有助於政黨的整合與制度化，但較為爭議的是提出的時機點以及普丁真正的目的為何。從第三屆至第四屆國家這段時間，「統一俄羅斯黨」逐漸取得國會主導地位，國會的政黨數量已然降低。根據選舉法，參選政黨必須繳交高額的選舉保證金，得票率低於4%的政黨保證金會被沒收，低於3%的政黨還必須補償國家當初提供的免費競選文宣，第五屆的國家杜馬大選更是將選舉門檻提高至7%。在黨員人數門檻，從一萬人提高到五萬人。<sup>173</sup>一系列的改革似乎矯枉過正，皆不利於小黨的生存，更有利於統一俄羅斯黨在國會的霸權地位。目前多黨選舉雖然照常舉行，但隨著權力黨日漸鞏固，選舉結果不確定的競爭本質，已逐漸轉變成可操控的選舉結果。在此選舉型態下，俄羅斯的多黨體系已經從葉爾辛時期分離式，轉變成Stephen White所謂的「侍從政黨體系」(Client System)，政黨必須依附行政資源，唯政府馬首是瞻。<sup>174</sup>這樣的政黨所組成的國家杜馬與蘇聯時代的「行政支配性國會」已然相去不遠。行政權獨大的現象在短時間內甚難改變，民主政治所強調的「分權」、「制衡」在俄羅斯仍是條漫漫長路。

<sup>170</sup> 有關俄羅斯各政黨的註冊名稱，請參見：

「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ikrf.ru/eng/politparty/>>。

<sup>171</sup> 許青芸，「俄羅斯國會之發展剖析」，《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三期（2010），頁144。

<sup>172</sup> 同前註。

<sup>173</sup> 林永芳，前引文，頁35-37。

<sup>174</sup> Stephen White, "The Political Party," *op. cit.*, p.81.

表 3-3 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結果，2003

政黨	比例代表制下的 政黨得票率(%)	政黨名單所獲席 次	單一選區	總席次
統一俄羅斯 (UR)	37.6	120	105	225
俄羅斯共產黨 (CPRF)	12.6	40	12	52
俄羅斯自由民主 黨(LDPR)	11.5	36	0	36
祖國愛國聯盟 (Rodina)	9.0	29	8	37
雅博洛克 (Yabloko)	4.3	0	4	4
右派力量聯合 (SPS)	4.0	0	3	3
其他	17.2	0	33	33
反對所有候選人	4.7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 Michael McFaul,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9.

## 第四節 小結

1956 年時任哈佛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的 Clyde Kluchhohn，曾針對俄羅斯政治文化中保守主義的重要性做出以下評論：我最近專注於研究在俄國近代史上的守舊傳統…這個議題在我心中佔有重要份量，是因為我在研究俄國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中發現，為何俄國至今仍然保持獨裁的政府體制，即使這個體制已經徹底的被歐洲各國所拋棄。<sup>175</sup> Kluchhohn 做出此評論時，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已經結束，蘇聯進入所謂的「解凍」(The Thaw)時期，雖然社會上的恐怖氣氛略為紓緩，但在政治上仍然維持著「三頭馬車」的威權體制。民主在蘇聯或著是俄羅斯依然是遙遙無期，即使在蘇聯崩潰前夕的 1980 年代，政治學者也大多不敢期望包含蘇聯在內的整個東歐地區能出現民主體制。因此，當東歐的民主化浪潮在 1980 年代末期吹起之時，確實振奮了民主價值的支持者，若干學者甚至認為民主制度戰勝了共產制度，民主之風吹倒了「鐵幕」。

例如 Francis Fukuyama 在 1992 年出版之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大膽的主張，從共產世界的瓦解，可以看出人類在歷史上的制度演進，將以立基於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與市場機制作為終結，自由民主的制度與生活方式是人類歷史的必然歸結，而且這種歷史發展的方向是不可以逆轉的。<sup>176</sup> 然而，在短短十數年間，這種歷史終結的大膽預言，即被俄羅斯等例子給推翻，民主制度會發生變化，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可以逆轉的，若將俄羅斯民主倒退的現象視為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角力的結果，自由主義無疑是失敗的，同時也呼應了 Kluchhohn 所強調的保守主義在俄羅斯歷史與政治制度發展上的重要性。

<sup>175</sup>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Introduction.

<sup>176</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 1993), p.12.

## 第四章 評析主權式民主

吳玉山在「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一文中，針對俄羅斯的民主倒退現象提出了三個議題：第一，如果民主倒退是事實，是由什麼因素所導致；第二，俄羅斯人民是否感覺到這樣的民主倒退，也就是民眾主觀的瞭解與客觀的事實是否相吻合；第三，俄羅斯的人民是不是在意這樣的民主倒退，還是他們更關心其他的議題，甚至不認為民主與人權是至高無上的。<sup>177</sup>關於第一及第三個問題，筆者在前面兩章已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釋，俄國人民確實不習慣從下而上的政治參與模式，樂於接受集體主義式的政治意識形態，重視秩序、穩定等集體目標。而且從三個層面檢視俄國現今的政治制度，以西方的標準而言，只能算是半調子的民主，或著是諸多學者所謂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東歐「競爭式威權主義」的典型，一種維持了規律與競爭性的選舉，但是在實質上大量限制了人民的選擇，因而保障在位者可以持續掌權的半民主、半威權體制。<sup>178</sup>

至於第二個議題，Stephen Whitefield 的研究或許可提供較為全面的觀點。Whitefield 的民意調查顯示，從 1993 年到 2007 年之間，俄國人對於本國的民主政治普遍評價不高，他們也不認為周遭的民主處於倒退的階段。人民既不認為葉爾辛時期的民主符合自由主義的精神，也不認為普丁摧毀了俄羅斯的民主。<sup>179</sup>此項研究帶來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俄羅斯的民主表現出現了一般俄國民眾的主觀評價和西方學術機構的客觀評價之間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人民對於普丁政權的評價極高，這代表了在價值排序中，俄羅斯人民認為自由主義民主的序列不及於其他政權表現。進一步說，人民對於自由主義此一

<sup>177</sup> 吳玉山，「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台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一期(2009)，頁 199-205。

<sup>178</sup>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2, (2005) pp.5-19.

<sup>179</sup> Stephen Whitefield, "Russian Citizens and Russian Democracy: Perception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c Practice, 1993-2007,"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5, No. 2 (2009), pp.93-117.

外生的民主形式，是以工具性的角度來看待，政權最終仍必須要能達到人民對於強國的期望。因此以蘇爾科夫為首的克里姆林宮理論家，便希望建立起俄羅斯內生的民主形式，擺脫西方的壓力，以俄羅斯本身的國情，搭建出「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也就是「主權式民主」。這種看似民主的民主模式，或許可以回應上述的問題，俄國人選擇了適合自己政治文化的政治制度，即使它不是真正的民主。以 Almond 與 Verba 的理論來說，政權的穩定性取決於與政治文化的相容度，普丁政權能順利的運作絕對是有跡可循的。



## 第一節 主權式民主的緣起

主權式民主概念的浮現，事實上牽涉了俄羅斯獨立以來複雜的外交政策以及治國策略的選擇，甚至和社會思潮的演變有關。除了西化派與斯拉夫派長期爭論的歷史淵源之外，俄羅斯獨立初期再次面臨該學習西方或重視自我意識兩者淑輕孰重的問題。儘管考量的因素很多，葉爾辛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毅然採取「向西方一面倒」的政策：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在外交政策上更是唯歐美國家馬首是瞻，任命了親西方派大西洋主義的科濟列夫(Andrey Kozyrev)出任外長。這樣全面倒向昔日敵人的政策，無疑否定了斯拉夫派的本位主義，甚至傷害了眾多俄國人的大國自尊。不過糟糕的民主表現伴隨而來的經濟災難以及社會失序等問題，幫助了共產黨在 95 年的國家杜馬大選取勝，迫使葉爾辛必須改變一面倒的政策，順應國會生態批准科濟列夫的辭呈，改由斯拉夫派歐亞主義的普利馬可夫(Yevgenii Primakov)出任外長。

對於斯拉夫派而言，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不應一味盲從西方，而應培養自己的觀點，強調「全方位外交」的對外政策，建立俄國與中、印、回教世界的交往模式。<sup>180</sup>另一方面，美國在二戰後在新興國家強力推銷民主，再以民主與人權問題干涉這些新興國家的內政，而有侵害它國主權的爭議。這樣的疑慮一直是斯拉夫派議論的焦點，他們認為俄羅斯在 90 年代的衰敗是西方強制灌輸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結果，特別是在 1999 年「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北約以人權問題對同為斯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進行轟炸，更加強了他們的觀點：西方要求俄國進行徹底的自由主義式民主化，目的是要弱化俄國的主權。<sup>181</sup>

<sup>180</sup> 王定士，「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羅斯學報》，第一期（2001），頁 77-80。

<sup>181</sup> Viatcheslav Morozov, "Modernizing Sovereign Democracy-Russia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t,"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130 (2010), pp.1-2.

2004年年底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院長佐里金(Valery Zorkin)在「俄羅斯人報」(Rossiskaya Gazeta)發表了若干的論點，為普丁政權在民主制度上的缺憾提供法律觀點的辯護。<sup>182</sup>他的觀點是以「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為出發點，強調主權國家的重要性。<sup>183</sup>他認為在全球化的環境下主權國家的利益正在受到侵害，因為零零種種的國際法條與國際政府組織限制了國家主權的行使。他更強調人權與民族自決權觀念的興盛，使國家不能達到有效管理並確保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目標。這位親克里姆林宮的憲法法院院長所提出的觀點可以說是為主權式民主開了理論的先河，<sup>184</sup>更是普丁在面對國際與國內雙重政治壓力下的反動。

### 一、貝斯蘭事件的影響

2004年9月1日車臣恐怖份子闖入位於北奧賽提亞貝斯蘭市的當地小學，挾持了該小學的學生以及教職員。人質危機在9月3日俄羅斯特種部隊的強勢攻擊之下落幕，總共造成338名人員死亡，其中有半數是兒童。<sup>185</sup>9月7日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在官方與國營電視台的鼓勵之下，聚集紅場參加哀悼儀式，他們高舉「只有懦夫才會襲擊兒童」、「敵人會被打敗」、「俄羅斯永遠不會讓步」等憤怒標語，要求政府必須嚴懲那些地方分離主義份子。<sup>186</sup>貝斯蘭的悲劇可視為是兩次車臣戰爭以及兩年前莫斯科歌劇院事件的延

<sup>182</sup> 轉引自范建中、徐宜鵬，「俄羅斯的“主權民主”：由來、爭議及前景」，《俄羅斯研究》，第一百四十六期，頁5-6。

<sup>183</sup> 「西伐利亞體系」是指西歐各國在「三十年戰爭」後所簽訂的「西伐利亞條約」中確立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體系，強調國家主權不受其他權威宰制、對內主權的施行不受干涉、國家擁有對外行為的最大自由並可運用所有手段保障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sup>184</sup> 佐里金一向被視為是與普丁親近的人物，「歐洲自由電台」甚至評論他是「極權統治的捍衛者」。請參見：[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s\\_Top\\_Judge\\_Defends\\_Authoritarian\\_Rule/1605799.html](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s_Top_Judge_Defends_Authoritarian_Rule/1605799.html)，檢視日期：2011/02/13。

<sup>185</sup> BBC中文網，「別斯蘭為人質事件死者舉行首批葬禮」，<[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20000/newsid\\_3629500/3629512.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20000/newsid_3629500/3629512.stm)>，檢視日期：2011/02/18。

<sup>186</sup> BBC中文網，「數萬俄國人群聚紅場參與反恐集會」，<[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30000/newsid\\_3635200/3635234.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30000/newsid_3635200/3635234.stm)>，檢視日期：2011/02/18。

伸，是種族與文化的衝突所導致，更與俄羅斯及車臣的民族主義復興息息相關。

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如同「法定正統三信條」所揭示的，是其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件，而且是國家建立過程及國家認同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其核心議題是：「何謂俄國人？」、「誰是俄國人？」，<sup>187</sup>這兩個議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俄羅斯民族自認是上帝的選民，有其民族優越性。雖然列寧曾經嘗試將俄國人的政治文化轉化成「無產階級文化」(Proletarian Culture)，企圖以階級概念取代民族主義。然而種族上的區分在蘇聯時期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造就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出現。蘇聯時代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主要觀點有三：(一) 俄羅斯民族一肩挑起蘇聯發展的責任，而少數民族卻只顧著享受發展的果實。(二) 少數民族對於俄羅斯人的指控是不公平的。(三) 在加盟共和國中的居於少數的俄羅斯人正遭受法律上、文化上的不公平待遇，蘇聯為了經濟、軍事、社會制度的重塑正在犧牲俄羅斯民族的利益。<sup>188</sup>但是另一方面，俄羅斯民族對於其境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卻也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史達林在二次大戰期間就曾經遷徙了大批所謂「不忠誠的」車臣人、伏爾加日耳曼人(Volga Germans)、克里米亞韃靼人(Crimean Tatars)至西伯利亞蠻荒之地。

俄羅斯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存在著認知上的齟齬，尤其 1989 年俄羅斯民族在蘇聯總人口中佔比已快跌破一半(50.8%)，俄羅斯的生活水平甚至低於某些其他加盟共和國，<sup>189</sup>如同其它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所產生的效果，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復興也加速了蘇聯的崩潰。即使是俄羅斯獨立之後，「何謂俄國人？」、「誰是俄國人？」這樣的議題依然存在於俄羅斯社會的爭論之中。根據 Richard Sakwa 的研究，俄羅斯獨立初期出現兩種

<sup>187</sup> Thomas Remington, *Politics in Russia*, op. cit., p.108.

<sup>188</sup> Darrell P. Hammer,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Soviet Politics*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198.

<sup>189</sup> 1980 年代俄羅斯的醫療、教育、公共建設等指標明顯落後於某些加盟共和國，醫療方面有 65%的城市醫院沒有熱水；在高等教育的人口數方面失去了龍頭地位；莫斯科在文化與社會公共建設方面在全蘇聯城市中僅排 70 名。請參見：Nicolai N. Petro, *The Re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An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99-100.

型態的民族主義者：<sup>190</sup>一種是「國家建造者」(State-Builders)，他們想要將俄羅斯打造成複合民族國家，建立符合現代意義的民族認同；另一種是「復興者」(Revivalists)，他們強調俄國應該屬於傳統定義上的俄羅斯人所有，而且應該立基於東正教文化與道德價值觀之上，俄羅斯公民與俄羅斯人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不論是哪一派民族主義者的論點都無法滿足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對於自主權以及自我族群認同的追求。另一方面，伴隨著 90 年代的種族衝突以及經濟的敗壞，俄羅斯民族主義趨向激進，少數民族的生存權逐漸受到壓縮。姑且不論民族主義的是與非，貝斯蘭事件後憤怒的俄羅斯人民給予普丁極大的授權，要求他務必解決紛紛擾擾的北高加索問題，普丁在民意可用的情況下，更加強化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基調，也為主權式民主的提出埋下了伏筆。

## 二、橙色革命的影響

2004 年 11 月烏克蘭總統大選因有選舉舞弊嫌疑，而引發了震驚國際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反對派領袖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指控總統庫奇馬(Leonid Kuchma)以及總理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在第二輪投票中操弄選舉，憤而集結支持者抗議選舉不公，要求重新舉行大選。抗議活動越演越烈，促使烏克蘭最高法院於 12 月 4 日作出裁定，宣布選舉無效。12 月 26 日重新舉行大選後，尤申科當選總統，推翻親俄且已經執政超過十年的威權政府。

烏克蘭橙色革命發生的原因與影響甚多，其中更涉及了美國、歐盟、俄羅斯三大勢力在前蘇聯國家的戰略競逐以及地緣政治的角力，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不是本論文所能涵蓋的範圍，因此筆者只專注於民主化之上。從二十世紀開始十幾年當中，國際政

<sup>190</sup>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8), pp.213-216.

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東歐以及蘇聯的所有共產政權在短短三年內一個接著一個瓦解。由於他們的瓦解太快而且太戲劇性，所以有些人將這場變化統稱為「蘇東波」，也就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些新興民主國家有的民主轉型順利，有的步履蹣跚，俄羅斯與烏克蘭同屬於後者。因此當烏克蘭接續著前一年喬治亞「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的民主運動時，對於俄羅斯的意義在於喬、烏兩國會不會是「第四波民主化」(Fourth Wave)的「領頭羊」，<sup>191</sup>重演十幾年前中東歐的骨牌效應，威脅到普丁政權的穩定性。

克里姆林宮有所疑慮不是沒有道理，美國以民主為題在俄羅斯周遭國家佈局已久，大力的輸出自由主義價值觀，並金援了近千個非政府組織，其中不乏有重要影響力的例如：「自由之家」、「民主基金會」(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國際共和學院」(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索羅斯基金會」(the George Soros-Found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Diplomatic Mission)等。<sup>192</sup> Anders Aslund 等學者合編的「橙色革命：烏克蘭民主突破的根源」(Revolution in Orange: The Origins of Ukraine's Democratic Breakthrough)一書描述俄羅斯在面對這場變革時，沒有一位俄羅斯的政治菁英會願意放棄烏克蘭，畢竟兩國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對於普丁而言必須考量到政權穩定以及意識型態的相似性，更想要保住同為舊體制出身的庫奇馬集團。俄國本有許多的管道可以介入這場紛爭，從戰略態勢、經貿關係、天然氣供應、政經人脈乃至 KGB 特工，無奈舊體制的這群人醜聞弊端太多，所引發的民怨太深，使普丁不得不鬆手。<sup>193</sup> 俄國的鬆手遂成爲壓垮庫奇馬集團的最後一根稻草。庫奇馬的垮台，象徵自由主義風潮將再度的吹進俄羅斯，國內反對派可能藉機如法泡製，同時普丁也要回應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在民主問題

<sup>191</sup> 關於中東歐「第四波民主化」的討論可以參考：

Valerie Bunce, Michael McFaul &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up>192</sup> Graeme P. Herd, “Colorful Revolutions and the CIS,” *Problem of Post-Communism*, vol. 52, No. 2 (2005), pp.3-18.

<sup>193</sup> Anders Aslund & Michael McFaul eds., *Revolution in Orange: The Origins of Ukraine's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pp.157-160.

上大做文章，必須在管理式民主的威權軀殼之中注入靈魂，建構一套思想體系，就如同當年尼古拉一世的作爲。



## 第二節 主權式民主的意涵

Nikolai Petrov 在專文「從管理式民主到主權式民主：2005 年普丁政權的進化」(From Managed Democracy to Sovereign Democracy)指出主權式民主對於俄羅斯政治制度的選擇有兩大意義：第一，宣示主權的排列序位是高於民主的；第二，俄羅斯的民主制度及民主發展軌跡可以走不同於西方的道路。<sup>194</sup> 普丁政權針對來自國內外的挑戰作出了一系列的回應，進而統整出主權式民主這樣的官方意識形態。

首先，2005 年 4 月普丁在國情咨文中宣示了自己的民主價值觀：討論民主自由的同時必須顧及俄羅斯的歷史發展，應從我國的地緣政治和國情出發。…民主原則和民主標準不應導致國家解體、讓人民受苦，而應使國家更加安定團結，人民生活水準近一步提高。…有關應該建設何種民主制度的問題上，俄羅斯遵循的不是外國夥伴的態度，而是我國的現行法律。<sup>195</sup> 普丁雖然沒有直接講明主權式民主，但他在開頭就直接了當的表示：這次國情咨文涉及俄羅斯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一系列的原則問題。在俄羅斯當前的政治發展階段，釐清這些問題是非常重要的。<sup>196</sup> 總結這篇咨文最主要的是向世界表明，俄國並沒有放棄民主，而是要建立適合俄國國情的民主制度，因為俄國是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民主國家，運作民主同時更要維護主權。2005 年 5 月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蘇爾科夫在直屬企業家委員會的會議中更是抨擊自由派的西方式民主理論，他強調「有民主，但更要主權」的思想，將普丁對於民主的理解定義為主權式民主。2006 年 2 月，蘇爾科夫在統一俄羅斯黨的幹部培訓課程中，對主權式民主作了較有系統的闡釋：第一，上個

<sup>194</sup> Nikolai Petrov, "From Managed Democracy to Sovereign Democracy-Putin's Regime Evolution in 2005," *op. cit.*, pp.181-182.

<sup>195</sup> 「克里姆林宮」網站，「2005 年國情咨文」，<[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5/04/25/2031\\_type70029type82912\\_87086.shtml](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5/04/25/2031_type70029type82912_87086.shtml)>，檢視日期：2011/02/20。

<sup>196</sup> 同前註。

世紀 80 年代後期開始的民主化運動，是對西方民主的盲目追求，因此 90 年代的俄羅斯出現了被扭曲的民主。同時俄羅斯也面臨了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被破壞的威脅；第二，普丁上任後規範了俄羅斯的政治過程，矯正了對於民主的扭曲，從而出現了一個穩定、具有規範的民主體制；第三，為了使俄羅斯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必須要有民主與主權來保障它的長期穩定發展，因此俄羅斯將成為一個主權與民主並重的國家；第四，民主是俄羅斯現代化過程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因為一個具競爭性的社會才能產生一個有效率的領導階層；第五；「全球化時代下主權概念已經落伍」這樣的觀點是不對的。為了讓俄羅斯有能力在全球化競爭中生存，俄羅斯必須擁有不容干涉的、完整的主權來維護其邊境及領土。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俄羅斯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sup>197</sup>但如果按照佐里金的理論，民主與主權兩者之間存在可能衝突的關係，但蘇爾科夫認為只要兩者能夠與俄國國情揉合，就能取得和諧的關係，因此在他的文章《國家化未來》特別就適合俄國國情的「主權」、「民主」、「主權與民主的關係」進行概念上的釐清：

### 一、關於主權

第一，因為俄羅斯處於複雜國際政治環境，俄羅斯的民主體制必須服從於維護和加強主權的要求。因此，主權式民主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制度，在此制度下民主的程序與原則應服從於國家作為一個大國的目標之下，也就是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二，俄羅斯是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那些非政府組織對於俄國整合主權的作法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們是很愚蠢的。對於今日的俄國而言，若是犧牲國家自由去追逐時髦的東西(仿效歐盟國家)就好像去追逐馬克斯的幽魂一樣。第三，主權的穩固與否關係到俄國的國際競爭力，十年前的俄國不能算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才會讓他國予取予求。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恢復主權獨立性一直是俄國的核心利益，俄國該採取何

<sup>197</sup> 「統一俄羅斯黨」網站，<<http://er.ru/index.shtml>>，檢視日期：2011/02/22。

種制度，是由俄國其及其人民決定，不需要他國來說三道四。<sup>198</sup>

## 二、關於民主

第一，民主價值已經根植於俄國，俄國絕對不會走回頭路。問題是該選擇何種民主制度？何種政黨體系？要有多少政黨？媒體自由化程度該如何？。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必須考量到民主制度與原則必須與俄國的歷史與傳統相契合，並適應目前的發展階段。換言之，俄國必須走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不能全盤移植西方的模式，也不能只仰賴別國的經驗；第二，民主模式必須由各國自己決定。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它是由歷史經驗及文化獨特性所形塑出來的。讓人民在沒有暴力脅迫下自由選擇正是民主的主要價值，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民主的理解與應用也會有所不同，民主制度要想獲得鞏固就必須是內生的而非外力輸入的；第三，民主原則與表現形式不應強求一致。俄國會繼續遵循普世的民主價值，但每個國家因為國情不同，所展現出的民主風貌也會不同。第四，民主鞏固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俄國正朝著此目標邁進，因此不應該過分指責俄國目前的民主現況。俄國只能實行溫和、漸進的民主改革，不能再進行過去的激進改革；第五，民主政治應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民主原則的貫徹不應該以國家解體或人民貧窮為代價，而是要能夠讓國家更為安定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sup>199</sup>

## 三、主權與民主的關係

第一，主權式民主不同於 90 年代那種有悖於俄羅斯國家利益的虛偽民主。當國家面臨失去主權或國家重要利益之時，可以採取某些必要行動限制公民權利，例如言論自

<sup>198</sup> Vladislav Surkov,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 *op. cit.*, pp.12-13.

<sup>199</sup> Vladislav Surkov,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 *op. cit.*, pp.13-15.

由應當受到適當的控制。以媒體來說，當一家媒體不能妥善的經營之時，那它的言論自由就有問題，因此政府會盡量讓各個媒體在財政上獨立，不受他人控制，如此一來人民才能享受真正的言論自由，政治反對派也可以自由發表觀點；第二，俄國不能再容忍他國利用民主議題謀求利益。意識形態的簡單化使某國(美國)不容易換位思考，也很難瞭解其他國家的複雜國情。某國長期以自由世界捍衛者自居，不過今後俄國將明確表示不能以所謂民主問題來干涉主權；第三，俄國不能再容忍超強獨霸的國際秩序。一個超級強國將本身的政治、經濟遊戲規則強制輸出給他國，這根本與民主原則是相違背的，而且也威脅到他國的主權；第四，主權式民主的概念來自於「一個正義的世界秩序應該立基於每個國家都能充分的享受自由、主權，並以此及理性的法律為基礎進行合作競爭」。俄羅斯與西方針對主權式民主進行思想上的爭論，代表西方對於俄羅斯認識不深。西方將主權式民主看作是民主倒退的現象，這根本是錯誤的解讀。<sup>200</sup>



<sup>200</sup> Vladislav Surkov,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 *op. cit.*, pp.15-17.

## 第三節 主權式民主的影響

### 一、官方思想定調

主權式民主的提出引起俄羅斯政壇的廣泛討論，迅速成為俄羅斯政壇的主流思想。

第一，時任第一副總理的伊凡諾夫(Sergei Ivanov)就強調俄羅斯國家價值觀的新三大要素：主權式民主、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sup>201</sup>主權式民主是俄羅斯政治制度的精髓，公民有權自己決定本國的政策，包括運用武力在內的任何方式來維護這項權利，使之不受外來的壓力。

第二，統一俄羅斯黨在 2006 年 12 月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明確的將主權式民主定義成黨的意識形態基礎。而且該黨在第五屆杜馬大選大獲全勝顯示出，俄羅斯民眾認可這一主流的政治價值觀。<sup>202</sup>

第三，普丁因為總統的職務不宜將主權式民主欽定為官方思想，但是他在 2007 年的「教科書風波」中表態抨擊了原本沒有載入主權式民主的教師手冊，他認為現今俄羅斯的大部分教材都沒能夠清楚的顯現出俄羅斯的現況，等於變相的認可了主權式民主的官方思想地位。<sup>203</sup>

第四，伊凡諾夫的接任者，也是日後普丁總統職務接班人梅德維傑夫(Dmitri

<sup>201</sup> Stephen White, “Classifying Russia’s Politics,”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80.

<sup>202</sup> 鄭羽、龐大彭主編，《普京八年：俄羅斯的復興之路(2000~2008)》，政治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98。

<sup>203</sup> 同前註，頁 104。

Medvedev) 在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後接受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集團總裁斯凡尼惹(Nikolai Svanidze)的專訪，他強調應該將俄國的民主稱之為「真民主」(Genuine Democracy)，因為他認為俄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體現了民主價值，其他對於俄國民主的定義都只是多餘的新名詞：現今，就像你所知道的，很多法律不規範的術語都不斷的被反覆使用，比如主權式民主、可控式民主。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贅詞。在我看來，如果按照民主真正的涵義來理解，其本身就已經包括可控性的涵義，如果排除這個涵意，那民主也可被倒退地理解為貴族政治或暴民統治。隨便怎麼解釋都可以。<sup>204</sup>他雖然不認同主權式民主的形式，但是他認可主權式民主的政治內涵：只有在擁有自己的憲法，對內具有最高權威、對外具有獨立外交政策的主權國家，民主才有可能存在。<sup>205</sup>

雖然俄羅斯憲法明定國家承認各種意識型態，國家包容社會意見的多元性，這是俄羅斯在後共時代最重要的民主成就之一。普丁政權選擇右傾，擁抱保守主義，重新讓政權意識形態化，等於是將管理民主更加進化，政權不僅實際限制了人民的選擇機會，任何對政權的批評，不論來自國內外，都將視為是對俄羅斯的敵視。俄羅斯的多元主義猶如走進死胡同，再度成為一言堂。

## 二、國家民族主義興起

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治勢力在後共俄羅斯一直能佔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的現代民族主義有很多的論述，但共同的特徵是皆深受斯拉夫派的影響，強調尊重與維持俄國的傳統，<sup>206</sup>共識是國家必須與宗教和解，讓東正教重回俄國人的日常生活。<sup>207</sup>雖然普丁在上

<sup>204</sup> Nikolai Svanidze 著，外交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譯，*大國思維：梅德維杰夫總統訪談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 11。

<sup>205</sup> 同前註。

<sup>206</sup> Nicolai N. Petro, *The Re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An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op. cit.*, pp.91-92.

<sup>207</sup> 國家與東正教正式和解於 2000 年，東正教首牧阿列克謝二世出席並祝福葉爾辛與普丁的交接儀式。

台後曾經大力打擊激進民族主義，例如在 2003 年吊銷公然宣揚種族主義的俄羅斯民族國家黨的政黨資格，推崇激進民族主義的俄共與自由民族黨也逐漸被邊緣化。但並不代表普丁放棄宣揚民族主義，只是不允許其他政治勢力插手，改由官方來主導的國家民族主義，特別是在顏色革命的威脅之下，民族主義對於政權穩定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2005 年 4 月由克里姆林宮扶植的青年軍「我們的」(Nashi)成立，其創立目的主要是在接受國家資源的挹注下，防範顏色革命在俄羅斯 07-08 年選舉週期間的任何爆發的可能性。在 07-08 年選舉週期間 Nashi 越來越壯大，鼎盛時期成員超過三十萬人，在普丁的刻意扶持下儼然成為保皇黨。如同它的前任領袖雅可緬科(Vasilii Yakemenko)所言：大家都知道克里姆林宮支持 Nashi，所以企業家都願意給予 Nashi 財政上的奧援。拒絕我們在財政上的要求，就像是選擇站在不愛國者那邊。<sup>208</sup> 普丁刻意扶植一支親政權青年軍主要目的有二：<sup>209</sup> 第一，「扎根威權主義」(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普丁企圖運用 Nashi 消除國內異議聲浪。從這個角度來看，普丁只是在利用在顏色革命後被激起的年輕人的熱情來完成他的國內政治目標。在愛國、團結的口號下，Nashi 成員可以恣意對抗那些對政權有潛在威脅的團體或行動者。<sup>210</sup> 07-08 年選舉期間，Nashi 就不斷的騷擾那些被它們視為「不愛國」的團體，例如在和平抗議的活動中，刻意的激怒或煽動對方造成秩序的混亂，從而破壞活動。第二，「保衛俄羅斯」(Defending Russia)，Nashi 代表的是俄羅斯在面對顏色革命威脅時所採取的防衛策略。從 Nashi 的組織宣言來看，它的目標並不只是單純針對反對黨，而是針對那些接受國外資助的團體，對於 Nashi 而言，西方企圖透過散播顏色革命來推倒現在的政府，使俄羅斯重新由無能又軟弱的政府來主政，進而方便於西方勢力的控制。<sup>211</sup> 這種仇外、仇視西方的傾向帶動了俄羅斯極右力量的興起。

<sup>208</sup> 轉引自 Maya Atwal, “Evaluating Nashi’s Sustainability: Autonomy, Agency and Activ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5 (2009), pp.743-744.

<sup>209</sup> *Ibid.*, pp.745-747.

<sup>210</sup> Nashi 成立的國內背景是，2005 年初俄羅斯政府企圖以少量的現金補助取代長期以來對弱勢團體的實物補助，發生了多起社會團體的抗議活動，引起克里姆林宮的高度注意。

<sup>211</sup> *Nashi*, “Manifest”, <<http://www.Nashi.su/ideology>>. 檢視日期：2011/03/01。

2007 年 4 月，俄羅斯與愛沙尼亞的關係陷入緊張，因為愛沙尼亞遷移了位於該國首都塔林(Tallinn)的蘇聯戰士紀念碑以及紅軍公墓。這個事件勾起了俄、愛兩國複雜的民族情感，最終導致了 5 月 Nashi 成員包圍並攻擊了愛沙尼亞駐俄大使館的事件。<sup>212</sup>另一件 Nashi 成員所刻意製造的事件是 2006 年 6 月英國駐俄大使布蘭頓(Anthony Brenton)遭到撤換，因為它所發表的言論被 Nashi 視為是反俄的，同時英俄兩國之間爆發了所謂的間諜案，因此遭到 Nashi 成員長達四個月的跟蹤與騷擾，最後因不堪其擾只能黯然歸國。<sup>213</sup>

事實上激進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政府的刻意扶植和因循苟且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Mihai Varga 就從政治機會的觀點來解釋極右派的壯大，包括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sup>214</sup>

(一) 政府法律執行不力。權威當局對於暴力犯罪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2005 年與 2006 年政府分別逮捕了 55 名與 90 名參與種族攻擊事件的光頭黨(Skinhead)成員，其中大多數只獲得有條件的起訴。執行法律的警察機關甚至會同情與放縱光頭黨。2005 年沃羅涅日(Voronezh)發生一起祕魯學生遭攻擊死亡的案件，當地警方在處理此事件時宣稱，他們從沒有料想到光頭黨會參與類似的攻擊事件，因為在他們眼中光頭黨是一群支持國家、團結對抗毒品的年輕人。政府對於暴力犯罪鬆懈的態度，使得種族攻擊事件的煽動者更加的有恃無恐。

(二) 政府組織公然與光頭黨合作。2005 年 Nashi 的領袖雅可緬科宣佈與光頭黨攜手合作，對他的組織進行再教育的工作。事實上早在這項宣布之前，Nashi 已經與極右派的足球流氓合作進行多起攻擊左派人士的事件。政府組織與光頭的合作顯現出政府在面

<sup>212</sup> BBC 中文網，「愛沙尼亞駐莫斯科使館暫停領事業務」，<[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610000/newsid\\_6617200/6617271.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610000/newsid_6617200/6617271.stm)>，檢視日期：2011/03/02。

<sup>213</sup> BBC NEWS, “Russian youths 'hound UK envoy'”，<<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162033.stm>>，檢視日期：2011/03/02。

<sup>214</sup> Mihai Varga, “How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 the Far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Rise in Far-Right Militancy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4 (2008), pp.571-575.

對暴力犯罪時的心態是根本不當一回事。

(三) 政府本身的民族優越感。2006 年俄羅斯將國家團結日(Unity Day)從 11 月 7 日紀念布爾什維克黨奪權改為 11 月 4 日慶祝俄羅斯於 1613 年脫離波蘭統治。政府與右派團體雖然沒有直接關聯，但是卻間接的幫忙了光頭黨招募新成員。在團結日更改之前，光頭黨在 2006 年 5 月的集會中，只有 200 名成員參加，在一般俄羅斯民中眼裡根本還不成氣候。但在團結日的當天，參與光頭黨的人數卻暴增至 3000 人，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

### 三、人權倒退

主權式民主揉合民族主義，將俄羅斯塑造成民主化的受害者，以維護俄國傳統為由，將政府的權力無限上綱甚至超越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政府治理所應有的權力以及公民保障自我安全的權利之間如何拿捏，原本就是政治體制的一大難題，但基本上的共識是，政府權力的過度膨脹，絕對是對人權的戕害。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其主要宗旨是要防止種族歧視事件，並支持政治自由，避免人民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它也表達了對俄國人權未來的憂慮，因為他從普丁的第二任期開始就發現很多的民主問題，特別是在梅德維傑夫的總統選舉過程中，他們發現俄國的法治精神與公民社會生存的環境根本沒有改善，政府持續的摧毀獨立的社團與政治行動者，因為政府在「激進主義法」的掩護下，可以隨意的定義出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罪犯。<sup>215</sup>

<sup>215</sup> 「人權觀察」網站，*World Report(2008)*，<<http://www.hrw.org/legacy/englishwr2k8/docs/2008/01/31/russia17710.htm>>，檢視日期：2011/03/03。

另一個長期關注世界各國人民和平抗議權利的組織「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從 2007 年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俄羅斯的人權議題，因為他們發現俄國的政治領域裡越來越不能容忍批判，任何對於政府的反對聲浪都是「不愛國行為」。以 2007 年的杜馬大選為例，在政府已經牢控媒體的情況下，反對意見以集會、抗議等方式輸出，但抗議人士卻遭到警方拘提、留置甚至是毆打。<sup>216</sup>另一方面，種族歧視與攻擊事件越演越烈，各種種族欺凌事件不斷的發生在車臣等少數民族地區。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即對俄羅斯提出控訴，認為政府至少必須為十五起失蹤、拷打等事件負起責任。<sup>217</sup>事實上受到政府右傾的影響，不僅在高加索地區，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種族攻擊事件越來越多。根據統計，2003 年全俄羅斯死於種族攻擊的人數有 20 人，但是在 03 年之後因為極右派人士襲擊而受傷或死亡人數節節高升(可見表 4-1)；04 年死亡 49 名，受傷 215 名；05 年死亡 47 名，受傷 414 名；06 年死亡 54 名，受傷 539 名。

表 4-1 俄羅斯境內種族攻擊傷亡統計表，2004-06

年度/地 區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死亡	受傷	死亡	受傷	死亡	受傷
莫斯科	17	62	16	178	36	181
聖彼得堡	9	32	4	45	5	42
全國	49	215	47	414	54	539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 Mihai Varga, “How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 the Far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Rise in Far-Right Militancy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4 (2008), pp.561-562.

<sup>216</sup> 被逮捕的名單中包括民主異議組織「另一個俄羅斯」(The Other Russia)領袖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他遭到警方留置五天。另一起案例是著名的人權運動者巴巴勒夫(Farid Babaev)參加此次大選，卻在投票日之前遭到不明人士殺害。

<sup>217</sup> 「國際特赦」網站，*Russian Federatio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08*, <<http://www.amnesty.org/en/region/russia/report-2008>>，檢視日期：2011/03/03。

「自由之家」在 2008 年的年度報告中，顯示了它對俄羅斯的民主前景更加的憂慮。從 2005 年開始俄羅斯的民主評等一直都是「不自由」國家(可見表 4-2)，但根據「自由之家」對於 2007 年杜馬大選的觀察，克里姆林宮在此次選舉過程中的操弄程度是歷屆杜馬大選中最低的。原因不是威權統治者的心態轉為民主，而是克里姆林宮已經完全掌握了整個遊戲規則裡最有利的位置，社會氛圍已經完全倒向支持統一俄羅斯黨與普丁政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甚至宣佈放棄觀察該次國會大選，因為他們在無法自由運作的情況下觀察是毫無意義的。<sup>218</sup> 普丁已經成功的塑造出一個完全不公平的政治競爭環境，反對普丁與反對俄羅斯已經劃上等號。<sup>219</sup>

表 4-2 年俄羅斯的民主評等，1999-2008

年份/評分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政治權利	4	5	5	5	5	5	6	6	6	6
公民自由	5	5	5	5	5	5	5	5	5	5
狀態	部分 自由	部分 自由	部分 自由	部分 自由	部分 自由	部分 自由	不自 由	不自 由	不自 由	不自 由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自由之家」網站，評分以 1 為最高；7 為最低。

<sup>218</sup> 俄羅斯政府甚至不願意核發簽證給觀察員，阻止他們前來監督第五屆國家杜馬大選。

<sup>219</sup> 「自由之家」網站，Russia(2008),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63&year=2007>>，檢視日期：2011/03/04。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探討了主權式民主的源起、內涵、影響的議題，如果以它是所謂「有俄國特色的民主」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它不單單只是一種民主的形式。第一，主權式民主乃是俄羅斯在面對國際壓力、人權、民族自決等問題下的反動，普丁政權建立了一套能夠回應自由主義挑戰的意識形態。第二，主權式民主貫徹了普丁的治國理念，以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為號召，達成中央集權、國家強化等政治目標，卻又不用去動搖基本的民主程序。第三，主權式民主充分的回應了俄羅斯政治文化中對於強國的要求，國家強盛的信念一直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政治傳統，當今的俄羅斯在經濟上已經逐漸走出受人擺佈的陰霾，在政治上更不希望西方以民主問題來對俄國指指點點甚至是干預內政。

不過若是西方標準檢視主權式民主，很容易就發現「要民主，但更要主權」這種說法可說是不攻自破，因為它基本上已經脫離了民主的核心價值-多元與平等精神。第一，當政府無法平等的對待國境內所有的國民，也就是平等的反映每個公民的偏好，不論這個偏好來自於誰、是什麼種族，而是有選擇性的以俄羅斯族裔的傳統偉大訴求為依歸，甚至政府本身就帶有種族優越感的排外性格。第二，當非俄羅斯族裔的俄羅斯公民透過民主程序所選出的政府無法充分的反應出他們的偏好，甚至無法保障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這樣的政體即使擁有民主的形式，卻不是真正的民主。主權式民主充其量只能算是普丁政權的意識形態裝飾，是「威權統治的遮羞布」，用來抗拒國際與國內要求俄羅斯實行真正民主的壓力，並且作為普丁選舉動員的工具。

然而，值得真正注意的問題是，多數的俄國人願意為了政權的實體表現，而不惜讓俄國的民主受到諸多限制，事實上接受主權式民主的合理性。我們必須了解對大多數的

俄國人而言，國富民強的目標根深蒂固存在於政治文化中，民主反而不是終極目的，反倒像是手段，因此是可以為了強國目的而修正。在俄羅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如果民主與葉爾辛時期的民生凋敝、貪腐失能畫上等號，俄羅斯人民排斥西方自由民主，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 第五章 結論

### 研究發現

俄羅斯的民主化在第三波國家之中屬於情況特殊，民主轉型的起緣來自於國家政治菁英的權力鬥爭，而非國家與社會合作，民間呼籲民主的力量並不強。另一方面，民眾對於民主的普遍看法是將之視為改善生活的輔助工具，並非當作生活的一部份。從根本上來看會發現西方式與俄國式的民主觀有明顯的差異。

西方式的民主準則以「人權宣言」為基礎，包括法律平等、遷徙、思想、集會以及言論等自由。而這一切的人民權利是建構在「政府會因為定期、競爭性的選舉而更換」這項可能性之上。然而，這些民主準則對於「俄國式民主」而言似乎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從蘇聯時代開始，民主對於俄國人民的意義在於，政府必須保障人民工作權、維持社會安全、提升生活水準以及健康醫療。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權利的捍衛者是個人」，這樣的觀念在俄羅斯的政治文化當中很難被找到，而且也並不普遍存在於政治菁英的思想當中，他們的邏輯反而是「民主就是由政府出面保障公民權利」，從來不是政府鼓勵人民草根性的、自動自發的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西方與俄羅斯存在明顯的思想差異，除了本文中描述過俄羅斯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之外，俄羅斯對於羅馬法(保障私有財產)、封建制度下的權利義務關係(法治精神)都很陌生。所以 Huntington 在劃分文明區塊時，才會特別將東正教文明特別劃分出來，以有別於基督教文明。而大多數的老牌民主國家皆屬於基督教文明，當他們向外輸出自有的民主觀時，在其他文明圈都遭受過反抗。當然這並非意味著俄羅斯的民主完全沒有希望，

只是必須更慢、更不規則地發展，或著是必須具有「俄羅斯特色」，要反映出俄國的獨特價值觀與傳統。

有著獨特國情的俄羅斯的民主發展軌跡，從葉爾辛時代的「委託式民主」一直到普丁的「管理式民主」乃至於「主權式民主」，為適應不同時空環境而在民主形式上多所變化，基本上都是偏向威權，但以治國策略的選擇來看確實達到振衰起敝的效果，普丁的政治生涯與聲望也達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就在第二任總統任期屆滿前夕，普丁擊敗群雄獲得美國「時代」(Time)雜誌評選為 2007 年度風雲人物，普丁獲選的原因在於他這位政治強人將混亂的俄羅斯帶向穩定，讓俄羅斯重返強國之林。雜誌執行主編 Richard Stengel 甚至表示：即使只憑個人之力也能改變歷史，而普丁證明了這點。他是俄羅斯的新沙皇，就其不關心民主自由而言，他是個危險人物。他不關心言論自由，他關心的是國內穩定。但是，國內穩定正是俄羅斯所需要的。那就是俄羅斯民眾熱愛他的原因。但以西方的民主標準而言，俄羅斯顯露出民主敗象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普丁的作為不僅僅是「改變歷史」而且是「重回歷史」。姑且不論俄羅斯未來的民意動向為何，政治菁英順應民意會將俄羅斯帶往何種政治體制，可以確定的是如何維持有效的經濟成長與大國地位絕對是普丁在 2012 年若想重返總統職位之前的第一要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民眾的民主價值之相關研究中，開始出現較為不同的觀點，研究顯示俄羅斯人民對於抽象的民主原則的支持度出現若干的成長，但若是將民主原則套用到現實生活之中就會拉低民眾對於民主的支持度。俄羅斯民族與文化原本就充滿著矛盾性，因此能從俄羅斯文化中找到民主精神的成份原本就不是一件難事，但以現階段來講它的份量對於俄羅斯的民主鞏固而言顯然是不夠的。俄羅斯在民主上的倒退似乎也印證了 Huntington 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所描述的，在一個變動的時代裡，人們對於穩定秩序的追求，將是一個社會亘古不變的鐵律，而這個鐵律在俄羅斯政治文化當中所佔的比重更多於其他的價值觀。

如果說自由主義民主對反民主的挑戰比選舉式民主更具有免疫力的話，俄羅斯的民主體制比之西方國家肯定較為不穩定，雖然目前的俄羅斯的民主已經比 1993 年「十月事件」時期進步的許多，但不可諱言的是它缺乏許多民主鞏固的特質。由於制度與非制度的缺陷，俄羅斯的民主比起自由主義民主更容易發生倒退，反對威權復辟的屏障，諸如繁榮和獨立的媒體、發達的政黨制度、強大的立法部門以及生氣蓬勃的公民社會，在俄羅斯並不存在。同時，常態的保衛民主反對專制的信仰與行為並未深入到菁英或整個社會之中，假使普丁更加大膽的推翻民主程序成為名副其實其實的獨裁者，他所遭受的阻力將微乎其微。



## 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本論文是從歷史經驗的傳承來建構俄羅斯政治文化之內涵，較少談及政治社會化對現今俄國民眾政治人格養成之影響，也因為第一手民調與訪談資料的缺乏，在政治文化的現代性方面著墨甚少，對於現今俄國人的政治態度只能略窺一二。因此，在後續研究建議方面，筆者認為可從政治社會化著手，探討俄羅斯如何透過家庭、學校、宗教、政黨等途徑，將威權的政治文化代代相傳延續下去，以彌補本研究不足之處。

再者，前蘇聯的瓦解，在政治文化的研究方面也帶來了許多的啓示，前蘇聯的主文化並未成功的整合各加盟共和國。如今的俄羅斯也面臨相同的困境，各聯邦主體仍存在者許多的次級政治文化，由於篇幅有限，本論文無法逐一探討。從後續研究的建議角度，若是想探討俄羅斯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問題，各地區的次級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課題，從此面向切入應會有更多的研究發現。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份

#### (一) 專書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理論*，台北：紅葉出版社，1994。

王謙等譯，David Potter 等著，*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2000。

田弘茂等編，*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業強，1997。

田弘茂等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1997。

外交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譯，Nikolai Svanidze 著，*大國思維：梅德維杰夫總統訪談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江炳倫，*政治文化導論*，台北：韋伯文化，2002。

李邁先，*俄國史*，上卷，台北：正中，1969。

周雪舫，*俄羅斯史*，台北：三民，2003。

周繼祥，*政治學：21世紀的觀點*，台北：威仕曼文化，2005。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1995。

黃裕美譯，Samuel Huntington 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

唐賢興等譯，Michael McFaul 著，*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巴契夫到普丁的政治變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

范建中，*當代俄羅斯：政治發展過程與對外戰略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郭小麗，*俄羅斯的彌賽亞意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葉至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2000。

盛杏湲 主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圖書，2000。

張明澍 譯，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 著，*公民文化*，台北：五南，1996。

陳義彥 主編，*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2006。

賀允宣，*俄國史*，台北：三民，2004。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2002。

劉軍寧 譯，Samuel Huntington 著，*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圖書，1994。

鄭羽 主編，*普京時代：2000~200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鄭羽、龐大彭 主編，*普京八年：俄羅斯的復興之路(2000~2008)*，政治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二) 期刊、論文

王定士，「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羅斯學報*，第一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1。頁 77-80。

林永芳，「俄羅斯政黨體系與民主化」，*俄羅斯學報*，第五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6。頁 35-40。

周尚文，「俄羅斯思想與俄羅斯社會轉型」，*俄羅斯學報*，第二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2。頁 165-180。

吳玉山，「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台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一期，台北：台灣民主基金會，2009。頁 199-205。

范建中、徐宜鵬，「俄羅斯的“主權民主”：由來、爭議及前景」，*俄羅斯研究*，第一百四十六期，上海：俄羅斯研究編輯部，2007。頁 5-6。

許青芸，「俄羅斯國會之發展剖析」，《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三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2010。頁 119-157。

## 二、英文部分

### (一) 專書(Books)

Aslund, Anders & Michael McFaul eds., *Revolution in Orange: The Origins of Ukraine's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Brown, Archie,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1984.

Bialer, Seweryn,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Westview: BoulderCo, 1989.

Bunce, Valerie, Michael McFaul &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New York,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ook, Linda J.,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Reform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hl, Robert,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 Hartog, Leo,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Principalities and the Golden Horde 1221-1502*,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6.

De Custine, Marquis, *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 Robin Buss. e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Denton, Jr., Robert E. & Gary C.Woodwar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London: Praeger, 1998.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 1993.

Hammer, Darrell P.,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Soviet Politics*,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Inglehart, Ronald,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keles, Alex & Raymond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Lasswell, Harold 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yman Bryson eds.,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Levada, Yu. A. eds., *Sovetskiy prostoy chelovek. Opty sotsial'nogo portreta na rubezhe 90-kh godov*, The Soviet man-on-the-street: An attempt at a social portrait in the early 1990s Moscow: Mirovoy Okean, 1993.

Levitsky, Steven &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Linz, Juan J. &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Likhachev, Dmtrii, *Biblioteka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Sankt Peterburg: Nauka, 1997.

Linz, Juan J. & Seymour M. Lipset & Larry Diamond,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0.

McDaniel, Tim,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 Beacon Press, 1966.

Millar, James R. eds., *Politics, 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ickiewicz, Ellen, *Television, Power, and the Public in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inwaring, Scott P., *Rethinking Party System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ordlinger, Eric A.,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Donnell, Guillermo & Philippe C. Schmitter &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ipes, Richard,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ye, Lucian W. &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ridham, Geoffrey & Tatu Vanhan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utnam, Robert,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ollack, Detlef, & Jurg Jacobs & Olaf Muller & Gert Pickel eds., *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m Europe: Attitudes in new Democracies*, Ashgate: Aldershot, 2003.

Petro, Nicolai N., *The Re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An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senbaum, Walter A.,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1975.

Riha, Thomas, eds., *Readings in Russian Civilization*,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Riasanovsky, Nicholas,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9.

Remington, Thomas,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 Pearson-Longman, 2006.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Sorensen, Georg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Szamuely, Tibor, *The Russian Tradition*, London: Martin Secker & Warburg, 1974.

Seton-Watson, Hugh,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Sakwa, Richard, *Putin: Russia's Choi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Sakwa, Richard,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8.

Whitefield, Stephen,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05.

White, Steph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 London : Macmillan, 1979.

White, Stephen & Richard Rose & Ian McAllister, *How Russia Vote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97.

## (二) 論文、期刊 (Articles)

Atwal, Maya, “Evaluating Nashi’s Sustainability: Autonomy, Agency and Activ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5, 2009, pp.743-747.

Almond, Gabriel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8, No. 3, 1956, pp.391-409.

Brown, Archie,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tisation: The Russ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etlef Pollack, Jurg Jacobs, Olaf Muller & Gert Pickel. eds., *Political Culture in Post-Communism Europe: Attitudes in new Democracies*, Ashgate: Aldershot, 2003, pp.17-26.

Brown, Archi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eweryn Bialer. eds.,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19-30.

Bezezinski, Zbigniew,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in Paul Cocks, Robert V. Daniels & Nancy Whittier Heer.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70-71.

Colton, Timothy & Michael McFaul, “Are Russians undemocratic?,” *Post-Soviet Affairs*, Vol. 18, No. 2, 2002, pp.91-121.

Collier, David &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pp.430-451.

Dittmer, Lowell,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1977, pp.552-583.

Diamond, Larry & Juan J. Linz & Seymour Lipset,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ilitating and Obstructing Factors,”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87-1988, pp.229-258.

Evans, Jr., Alfred B., “Vladimir Putin’s Design for Civil Society,” in Alfred B. Evans, Jr., Laura A. Henry & Lisa McIntosh Sundstrom. eds., *Russian Civil Socie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New York: M.E.Sharpe, 2006, pp.147-151.

Fish, M. Steven, “The Impact of the 1999-2000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Vicki L. Hesli & William M. Reisinger eds., *The 1999-2000 Elections in Russia: Their Impact and Leg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89-190.

Goldman, Marshall I., “The Yukos Affai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5, 2004, p.319-323.

Gibson, James & Raymond Duch,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4, 1992, pp.87-88.

Hahn, Jeffrey, "Yaroslavl' Revisited: Assess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1990,"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p.150-151

Hahn, Gordon, "Reforming the Federation,"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8-167.

Huntington, Samuel,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6, 1996, pp.28-46.

Holmes, Stephen, "Superpresidentialism and Its Problem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Vol. 2-3, Fall 1993/Winter 1994, pp.123-126.

Haury, Jakob, "Procopii Caesariensis de de bellis libri V-VIII," *Opera omnia*, v.2, vii. 14.22, 1963, pp.70-71.

Herd, Graeme P., "Colorful Revolutions and the CIS," *Problem of Post-Communism*, vol. 52, No. 2, 2005, pp.3-18.

Keenan, Edward, "Muscovite Political Folkways," *Russian Review*, Vol. 45, No.2, 1986, pp.164-172.

Lukin, Alexander,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 *Post-Soviet Affairs*, Vol.25, No. 1, 2009, pp.67-71.

Lukin, Alexander & Pavel Lukin, "Myths about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Russian History,"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p.28-35.

Linz, Juan J.,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Juan J. Linz &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6-19.

Linz, Juan J.,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i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Pub., 1975, pp.187-252.

Morozov, Viatcheslav, "Modernizing Sovereign Democracy-Russia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t,"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130, 2010, pp.1-2.

McFaul, Michael & Elina Treyger, "Civil Society," in Michael McFaul, Nikolai Petrov & Andrei Ryabov. eds.,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135-173.

McFaul, Michael,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1-79.

McFaul, Michae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2, 2005, pp.5-19.

Ordeshook, Peter, "Russia's Party System: Is Russian Federalism Viable?" *Post-soviet Affairs*, Vol. 12, No. 3, 1996, pp.195-217.

Petrov, Nikolai, "From Managed Democracy to Sovereign Democracy-Putin's Regime Evolution in 2005," *PONARS*, Policy Memo, No. 396, 2005, pp.181-183.

Pye, Lucian, "Politic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2, 1968, pp.218-225.

Rustow, Dankwar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1970, pp.337-363.

Richter, James, "Putin and the Public Chamber,"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5, No. 1, 2009, pp.41-43.

Rutland, Peter, "The Oligarch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ephen K. Wegren & Dale R. Herspring Book. eds., *After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p.160-164.

Remington, Thomas F.,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Regions," for *Conference on New Fronti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New Economic School*, 2008, pp.1-54.

Ross, Cameron, "Refroming the Federation,"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61-170.

Rose, Richard, "How Floating Parties Frustate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 Supply-Side View of Russia's Elections," in Archie Brown. eds.,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1-222.

Sakwa, Richard, "Partial Adapation and Plitical Culture,"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2005, pp.43-63.

Schedler, Andreas,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1998, pp.95-175.

Slider, Darrell, "Politics in the Regions,"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9-176.

Surkov, Vladislav,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 *Russ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47, No. 4, 2009, pp.8-21.

Tucker, Robert C., "Sovietology and Russian History," *Post-Soviet Affairs*, Vol. 8, No.3, 1992, pp.175-196.

Verba, Sidney,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Lucian W. Pye &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513-544.

Valentine, Herman, "What Government Say and What Government Do: An Analysis of Postwar Queen's Speech,"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28, 1975, pp.22-30.

Varga, Mihai, "How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 the Far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Rise in Far-Right Militancy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4, 2008, pp.561-575.

White, Stephe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Ressessed," in Archie Brown.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62-99.

White, Stephen, "The Political Party,"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1-90.

White, Stephen, "Classifying Russia's Politics,"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263-280.

Whitefield, Stephen, "Russian Citizens and Russian Democracy: Perception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c Practice, 1993-2007," *Post-Soviet Affairs*, Vol. 25, No. 2 2009, pp.93-117.

Willerton, John, "Putin and the Hegemonic Presidency,"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3-25

Wyman, Matthew, "Elections and Votes," in Stephen Whit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Du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68.

### 三、網路資源

#### (一) 網站

「人權觀察」：<http://www.hrw.org/>

「自由之家」：<http://www.freedomhouse.org>

「保護記者協會」：<http://cpj.org/>

「俄羅斯聯邦總統」：<http://eng.kremlin.ru/>

「俄羅斯聯邦院」：<http://www.council.gov.ru/eng/index.html>

「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www.cikrf.ru/eng/elect\\_duma/leg/index.jsp](http://www.cikrf.ru/eng/elect_duma/leg/index.jsp)

「國際特赦」：<http://www.amnesty.org>

「統一俄羅斯黨」：[<http://er.ru/index.shtml>](http://er.ru/index.shtml)

「歐洲自由電台」：[<http://www.rferl.org/section/Russia/161.html>](http://www.rferl.org/section/Russia/161.html)

## (二) 新聞

BBC 中文網，「別斯蘭為人質事件死者舉行首批葬禮」，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20000/newsid\\_3629500/3629512.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20000/newsid_3629500/3629512.stm)>  
，檢視日期：2011/02/18。

BBC 中文網，「數萬俄國人群聚紅場參與反恐集會」，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30000/newsid\\_3635200/3635234.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30000/newsid_3635200/3635234.stm)>  
，檢視日期：2011/02/18。

BBC 中文網，「愛沙尼亞駐莫斯科使館暫停領事業務」，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610000/newsid\\_6617200/6617271.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610000/newsid_6617200/6617271.stm)>  
，檢視日期：2011/03/02。

BBC NEWS, “Russian youths 'hound UK envoy”,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6162033.stm>>. 檢視日期：2011/03/02。

## (三) 評論

McFaul, Michael, “Putin’s Strong Hand Is Failing Russia,”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4/09/b186693.html>>. (September 14, 2004).  
檢視日期：2011/02/20。

Rutland, Peter, “Is Putin Out to Destroy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1, Issue. 21, (May 31, 2004).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26588&tx\\_ttnews%5BbackPid%5D=175&no\\_cache=1](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26588&tx_ttnews%5BbackPid%5D=175&no_cache=1)>. 檢視日期：2011/01/29。

Hahn, Gordon, “Putin’s Stealth Authoritarianism,” *Radio Free Europe*,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344299.html>> (April 15, 22 & 29, 2004). 檢視日期：2011/01/22。